
蘇軾研究

2015 年第 1 期（总第 40 期）

（季 刊）

卷首语

鸣鸠乳燕寂无声，日射西窗泼眼①明。

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

——苏轼《春日》②

①泼眼：刺眼，耀眼。②元丰八年（1085）二月作于南都。

竹笼摇曳着春日的寂寥，与耐不住寂寞的桃树、李树比邻而居，对鸠鸟无动于衷闲逸的栖息，只有无可奈何的叹息。

被春雨洗涤得如此纯净的阳光，悠闲地涂抹着蓝天上那些寻常巷陌的剪影，和西窗里那些寂无声息的日子。

午醉像浮云一样，在春天的大地上，留下他倏忽即逝的阴影，与百无一事的从容，却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

许多欲望站在窗前无法入睡，而午醉醒来的朦胧，却在坑坑洼洼的牧歌里，欣赏和煦的阳光与翻飞的乳燕。

苏轼这一首小诗，逾越千年的时光，在2015年的春天与我们见面，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苏轼

研究 SUSHIYANJIU

2015 年第 1 期（总第 40 期）

（季 刊）



目 录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
《苏轼研究》编辑部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主 编：张志烈

□副 主 编：宋明刚 方永江

□责任编辑：刘清泉

□编 辑：袁 丁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12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l.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 03—006 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华信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 3 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苏学论坛

苏东坡的花木情怀（一） 王影聪/4

苏轼的以法治吏观 彭林泉/10

——基于《历法禁》的分析

苏轼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 林冠群/17

苏轼徐州诗文精神意蕴与密州时期之关系

李 贞 管仁福/25

“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 喻世华/29

——从表、状、书、启看苏轼在密州的政治操守与人格操守

苏轼心目中的桃花源 刘继增 萧根胜 刘彩萍/34

苏轼定州诗文的地域特色与爱民情怀 周新华/38

《定州祷雨岳庙题名》及所阙人名试补 李占才/41

道光褒城县志所载苏轼牛头寺诗考 杜学林/44

浅析道教与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陆雪卉/50

苏东坡与泡菜 刘清泉/55

赠砚亭与还砚亭 陈坚体/58

苏轼书法特质剖析 张 斌/59

□顾问：李 静 宋朝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乃昌
刘尚荣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刘川眉
刘清泉 孙开中 李景新
冷成金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周裕锴 胡先酉
涂普生 康 震 韩国强
赖正和 蔡心华 熊朝东
潘殊闲

□诗文鉴赏

读《东坡志林》(七) 徐 康/62
诗吐苦寒,书抱天真 刘川眉/66

□新书评介

襟期寥廓,风流辉映 张国文/69
——评徐康《〈东坡志林〉百篇赏析》
《苏轼知定州诗词赋全注及研究论稿》序 刘清泉/70

□本期关注

沉痛哀悼刘乃昌先生 徐玉芹等/71

□研究史话

韩国苏轼研究述略(一) [韩] 洪瑛钦/73

□苏学专家

胡先酉的三苏情缘 孙开中/75

□景苏札记

我与苏东坡的“第二次握手”(四) 李 新/78
——河南卫视《成语英雄》拍摄记

□苏学动态

会长办公扩大会在眉山举行 一 流/79
“眉山西湖”课题开题论证会近日举行 熊 莉/79
“东坡文化进校园系列公益课程”启动 王家隆/79
第十九届苏轼研究学术会议征文启事 /80

苏东坡的花木情怀（一）

王影聪

内容提要 以苏东坡吟咏竹、梅花、松、荷花、牡丹、橘橙、菊花、幽兰、柳桃梨李等的诗文为例，分类分析、揭示苏东坡的花木情怀和独特风韵。

关键词 苏东坡 花木 情怀

自古文人墨客行吟山水、歌咏花木以山川花草、江河湖海为题材，写诗作赋，填词颂唱，不亦乐乎。借以言志、抒情、拟人、喻事、说理、打趣等等，传承几千年。在北宋时期的苏东坡也不例外。在他的诗词文赋中，不仅仅是山川河流，日月云雾，还有 50 多种花木情怀之作，可谓历史上所有文人所莫及的！苏东坡的花木情怀中在吟花咏木时，还把山水怪石奇石以及当地风物、习俗融入其中，可谓风韵独特。

一、咏竹以喻高风亮节

竹子，是常绿植物，茎圆柱形，中空，有节，叶子有平行脉，嫩芽叫笋。竹的种类很多，在苏东坡的家乡天府之国的眉山这一带，可是拥有上百个品种的竹乡。眉山、青神一带，是中国竹编艺术之乡，这里的平面艺术竹编，堪称天下一绝，其它州郡县无以匹敌，被世界上的“国际竹藤协会”定为全球的培训基地，这里编织的彩色竹编艺术字画，也成为党和国家、省级政府馈赠外国政要、组织的珍贵礼品。

苏东坡一生爱竹，也吟咏竹、画竹。在他的诗文中写到竹、提及竹有 140 多处（松 130 多处，梅 120 多处），是提及吟诵最多的植物。苏东坡的这一喜好也影响了后人千年，我也是特爱竹子的一个人，对竹也特别钟爱。在苏东坡的家乡和夫人王弗、王闰之的家乡青神，就有一种专门为竹编艺术而生长的“粉箬竹”，竹节之间最长为 1.5 米，平常的竹节间隔也在 1.1~1.2 米之间，这种竹子真是高风亮节、光彩照人。我也为这种竹子吟咏过诗句：

挺立高节施粉黛，化作银丝锦绣来。

当年东坡吟雅韵，青竹神笔千秋在。

见笑了，在这里咏竹可谓班门弄斧。但是却表达了我对竹，特别是“粉箬竹”的喜爱之情。然而，苏东坡吟竹、写竹、题竹、画竹、颂竹是一种特殊

的喜爱，是达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也是他气节的体现，是他以竹的高风亮节为他的情怀抒发。

在他的老家住所，也就是他提及的南轩前后，真正是有“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1]365}的风韵。苏东坡的祖父、父亲都爱竹，总会在居所外的堂前堂后种植竹子。这是影响了他一生的，所以他在诗文中将竹子视为高风亮节、最有气质、最为圣洁的相伴之物。这在他著名的《于潜僧绿筠轩》^{[1]219}诗中写得十分明白：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由此可见，苏东坡对竹的爱好、评价是何等的高洁、神圣！这首赠于潜僧的诗篇是在 40 多岁左右时所写。其实从青年一直到老年苏东坡都是这样的。

早在他任凤翔签判时，他就写过一首《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构一茅堂，予以其所处最为深邃，故名之曰避世堂》^{[1]90}。他写吟道：

犹恨溪堂浅，更穿修竹林。

高人不畏虎，避世已无心。

隐几颓如病，忘言兀似喑。

茅茨追上古，冠盖谢当今。

晓梦猿呼觉，秋怀鸟伴吟。

暂来聊解带，屡去欲携衾。

湖上行人绝，阶前暮霭深。

应逢绿毛叟，扣户夜抽簪。

苏东坡以竹为伴作诗存念，这年他 28 岁。他还专门研究竹的雌雄。他写了《记竹雌雄》^{[1]3405}：

竹有雌雄，雌者多笋，故种竹当种雌。自根而上至梢一节二发者为雌。物无逃于阴阳，可不信哉！

短短的 37 个字，研究出了竹的雌雄特征和种雌性多得笋和竹，如何辨认雌性竹的办法和窍门，并总结出事物规律。这真让人信服敬佩。

苏东坡在他的诗句中，“徘徊竹溪月，空翠摇烟霏。”可谓充满情趣。他还专门写种竹和种竹的乐趣，这是他爱竹的一种方式。他在《次韵刘贡父西省种竹》^{[1]710}中写咏了这一种情怀：

要知西掖承平事，记取刘郎种竹初。
旧德终呼名字外，后生谁续笑谈余。
成阴障日行当见，取笋供庖计已疏。
白首林间望天上，平安时报故人书。

他还写过《次韵子由种杉竹》、《和黄鲁直食笋次韵》、《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记岭南竹》、《送竹几与谢秀才》，还吟过《竹叶酒》：“惟余竹叶在，留此千古情。”^[1]
³⁷当然，苏东坡吟竹流传最广的还是《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1]209}：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东坡在这里巧妙地把竹子、桃花、蒌蒿、芦苇等植物和鸭子、河豚融在美好春光里，充满了动感、静感和美感，给人以无限的愉悦！

不过，苏东坡也在悲愤愁怅的心境时咏竹，他在《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1]486}中也吟竹以表骨节清刚、琅然可诵的情怀：

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
低昂中音会，甲刃纷相触。
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
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
故山今何有，秋雨荒篱菊。
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

此外，苏东坡的诗词文牍中，对竹的吟咏有不少的佳句：“疏疏帘外竹，浏浏竹间雨”、“窗前修竹一尺围”、“闭门新竹自千竿”、“渐入西南风景变，道旁修竹水潺潺”、“修竹带泉石”、“世间那有千寻竹”、“风来竹自啸”；他一看见竹子就高兴、就吟诗：“修竹满山阴”、“寺藏修竹不知门”、“古寺满修竹”、“花竹秀而野”、“夜开丛竹轩”、“褰衣竹风下”、“古寺无人竹满轩”、“功客眠风竹”、“坐咏修竹林”、“柏堂南畔竹如云”、“夜静惟闻泻竹声”、“翠竹江村绕白沙”；他赞美竹子：“稚竹真可人，霜节已专车”、“瘦竹如幽人，山花如处女”、“次间扫坛竹，云此今尚尔；翠叶纷下垂，婆娑绿凤尾；风来自偃仰，昔为神物使”；在苏东坡的心中“爱竹能延客”、“神功不用淇园竹”、“普慈寺后千竿竹”、“纸窗竹屋身自暖”、“邻里亦知偏爱竹，春来相与护龙雏”；苏东坡也爱食竹笋：“好竹连山觉笋香”。也爱画竹，并且有“胸有成竹”的高论，成为后世学习经典。文同，字与可，是画竹名家，苏东坡常与之切磋，相互讨论。苏东坡评论文同画竹“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他在《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1]1534}中写道：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

在这里苏东坡的千古名句：“胸有成竹”，不仅道出了艺术与自然两大规律的有机统一，也道出了他爱竹画竹的心得所在。所以他的墨竹图、竹石图、风雨竹图等成为传世名画，为后人效仿景仰。

竹，虚心劲节，直竿凌云，可喻高风亮节，他爱竹的情怀还寄托在儿子侄儿身上，告诫：“我家六男子，朴学非时新。诗词各璀璨，老语徒周淳。愿言敦宿好，永与竹林均。”^{[1]1113}这就是苏东坡爱竹、咏竹、题竹、画竹的情怀！

二、咏梅花以喻风骨品格

苏东坡爱梅花，嘉祐五年就有诗句问世，他那年25岁，作《许州西湖》：“惟有落残梅，标格若矜爽。”在这之前，尚未查到苏东坡咏梅的作品和文字。而到了中年的苏东坡，吟咏梅花的作品甚多，有120多首。率先吟咏梅花的诗词，是1074年作的《行香子·丹阳寄述古》。其中开头两句：“携手江村，梅雪飘裙。”这是写梅花飘落似雪的场景。梅花是中原南北都有的植物，大都开花于寒冬，少量开于初春，所以梅花有傲霜斗雪之特色。在万种植物中，大都是春色满园、百花争艳，惟梅花在寒冬腊月，一枝独秀，香入肺腑。千百年来，文人雅士，常以梅品梅格颂有风骨有品格的俊杰。苏东坡也是如此，他的百多首咏梅诗词和文章以物喻人格，以梅颂品格，以梅花的精神颂风骨。这就是他的咏梅情怀。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丢了官，遭了罪，受了苦，但却成就了他一代文宗的事业，从此也奠定了他的文坛领袖、北宋文学宗师的地位。不过当时没有人敢于这么颂扬肯定，而是与他交往、以诗文交流。苏东坡也常以咏梅诗词表达思想情感。有时还画“倒梅”以抒怀。至今在黄冈还留有他画的“倒梅”石碑拓片。

在黄州贬谪之前，苏东坡曾吟过《次韵李公择梅花》诗，有“寻花不论命，爱雪长忍冻。天公非不怜，听饱即喧哄”的佳句，又有《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诗中吟了：“醉看梅雪清香过，夜棹风船骇汗流。”这些都是和韵他人诗句，并非见到梅花的吟诵。

当他从“乌台诗案”牢狱中走出来，于元丰三年（1080）正月二十日过关山（今湖北麻城）春风岭，见岭上梅花盛开，随即吟《梅花二首》^{[1]494}。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他的第一首见梅花而生情，以梅自比。第二首则是奇幻的情怀，实为感谢乡友陈慥在此迎送他这个“罪人”。苏东坡后在元丰四年（1081）为好友陈慥（绰号方山子）写过小传《方山子传》，记载了过关山、在岐亭这件事，又作《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1]516}，再次提及该事：

蕙死兰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岭头梅。
数枝残绿风吹尽，一点芳心雀啅开。
野店初尝竹叶酒，江云欲落豆蔻灰。
行当更向钗头见，病起乌云正作堆。

这是东坡赞许陈季常的人品和热情，以咏梅而赠。后又写了一首《次韵陈四雪中赏梅》^{[1]529}：

腊酒诗催熟，寒梅雪斗新。
杜陵休叹老，韦曲已先春。
独秀惊凡目，遗英卧逸民。
高歌对三白，迟暮慰安仁。

这首赠诗也是送予陈季常的，因陈慥即陈季常在家是老四，东坡与他从小就熟悉，也叫他“陈四”，后来苏东坡还写吟《红梅三首》^{[1]531}，也与陈季常共赏。这三首中更有传世佳句：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
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这是其一，以花喻君子，寄托深情，艺术价值和寓意颇深，尤其是后两句成为千古名句。苏东坡的后两首，全是步韵第一首，其情怀非同一般：

雪里开花却是迟，何如独占上春时。
也知造物含深意，故与施朱发妙姿。
细雨裊残千颗泪，轻寒瘦损一分肌。
不应便杂妖桃杏，数点微酸已著枝。——其二
幽人自恨探春迟，不见檀心未吐时。
丹鼎夺胎那是宝，玉人頰颊更多姿。
抱丛暗蕊初含子，落盏秬香已透肌。

乞与徐熙画新样，竹间璀璨出斜枝。——其三

在这一个时期，苏东坡还作了不少与友人和韵吟唱的梅花诗词篇章。如《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四时词四首》、《次韵陈四雪中赏梅》等等，均是韵梅或有韵梅诗句。如“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1]516}、“真态生香谁画得，玉如纤手嗅梅花”^{[1]525}、“寒梅雪斗新”、“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迫玉梅魂”。

苏东坡还时常以梅花诗或次韵梅花诗作以交友、赠友。如前所提《次韵李公择梅花》、《梅花二首》、《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次韵陈四雪中赏梅》、《梅花三首》之外，还有《和秦太虚梅花》、《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谢关景仁送红梅栽

二首》、《腊梅一首赠赵景贶》等。苏东坡的咏梅情怀与众不同，如他在《和秦太虚梅花》一诗中，只字未及梅花二字，而是咏出盛开的梅花中的一枝斜梅，其妙甚绝：

多情立马待黄昏，残雪消迟月出早。
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

他在《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诗中，又咏出：

“醉看梅雪清香过，夜棹风船骇汗流。”写出在船上闻梅香、赏梅的醉态。这就是潇洒情怀的苏东坡。他的这种情怀，使他一口气可咏十首、二十首梅花诗！颇有意韵，着实让朋友感到兴奋与赞美。这些诗作不乏佳句：“要与梅花作伴来”，“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剪刻多”，“绿发寻春湖畔回，万松岭上一枝开”，“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日出冰渐散水花，野梅官柳渐敲斜”，多情发与风流伴，不到双双燕语时，“肯伴老人春一醉，悬知欲落更多情”，“秬李争春犹办此，更教踏雪看梅花”^{[1]813-815}。苏东坡还在《谢关景仁送红梅栽二首》吟有：“年年芳信负红梅，江畔垂垂又欲开。珍重多情关令尹，直和根拔送春来……为君栽向南堂下，记取他年著子时。”苏东坡又有《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1]818-820}有妙语佳句：“天教桃李作舆台，故遣寒梅第一开。凭仗幽人收艾蒨，国香和雨入青苔。”“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何人会得春风意，怕见黄梅雨细时”，“寒梅似与春相避，未解无私造物情”，“北客南来岂是家，醉看参月半横斜。他年欲识吴姬面，秉烛三更对此花”。

此外，苏东坡还有题画梅花诗，也是颇有诗人情怀。《王伯扬所藏赵昌花四首》中就有梅花题诗：

南行度关山，沙水清练练。
行人已愁绝，日暮集微霰。
殷勤小梅花，仿佛吴姬面。
暗香随我去，回首惊千片。
至今开画图，老眼凄欲泣。
幽怀不可写，归梦君家倩。

在题梅花诗中可以品味到苏东坡咏梅怀乡以抒发情感之意境。不仅如此，苏东坡还常请朋友相会饮酒品茗赏梅花，并以诗相赠。他的《蜡梅一首赠赵景贶》^{[1]859}：

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
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
天工变化谁得知，我亦儿戏作小诗。
君不见万松岭上黄千叶，玉蕊檀心两奇绝。
醉中不觉度千山，夜闻梅香失醉眠。
归来却梦寻花去，梦里花仙觅奇句。……

还有《次韵赵德麟雪中惜梅且饷柑酒三首》、《次韵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次韵钱穆父、王仲至同赏田曹梅花》等等；就连妻子王闰之也了解苏东坡赏、爱梅花，以梅咏诗赠友的特点。在苏东

坡知颍州时，一天晚上，梅花盛开，月色明媚，王闰之对苏轼说：“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为何不请朋友们来梅花月下饮酒呢？”苏东坡大喜，说：“我不知道夫人也能作诗啊！夫人的一番话真是诗人之语言。”于是请朋友们在梅花月下共饮赏梅，而且即兴作词^[2]。其《减字木兰花》^{[1]1170}云：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清烟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是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此后，苏东坡再贬惠州时，也有咏梅诗词，不过其风格有变化，不仅仅是自诩骨风品格，也寄情喻人，犹比朝云。苏东坡写下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一诗；接着又写《再用前韵》，又咏梅花，前后韵梅花，足见苏东坡之情怀兴致。请看两诗各前几句：

其一的咏梅四句：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
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蜃雨愁黄昏。

其二的咏梅四句：

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
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1]966-967}

过了几日，梅花将落，苏东坡又用前两首诗韵，再咏梅花《花落复次前韵》，请看前四句：

玉妃谪堕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
人间草木非我对，奔月偶桂成幽昏。

可见苏东坡咏梅花之情怀之强烈，之热烈，令人感慨并回味无穷。后北返时，他还写《赠岭上梅》以抒怀：

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这时的咏梅心情就与惠州时不大一样。这就是苏东坡的情怀。

苏东坡晚年还填有咏梅词，我以为是为朝云而作，有《西江月·梅花》，有《阮郎归·梅词》，他用这两首词以颂朝云伴他终生的品格和意志，令我们读后感动。

这《西江月·梅花》^{[1]1153}是这样咏吟的：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再看《阮郎归·梅词》^{[1]1160}：

暗香浮动月黄昏，堂前一树春。东风何事入西邻，儿家常闭门。雪肌冷，玉容真，香腮粉未匀。折花欲寄岭头人，江南日暮春。

由此可见，性情中人的苏东坡爱梅花、咏梅花、赏梅花，赠友人梅花诗、悼故人爱妾以咏梅花词，均以梅花品格以抒情，以喻情怀，着实令人回味无穷

端。尤其是他黄州所作《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更是把月色和残梅、竹、柳、松等景物和他的酒后醉态，一表尽兴，可谓仙人之境界和傲霜之梅骨，令后人长久回味：“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结茅舍。浮浮大甑长炊玉，溜溜小槽如压蔗。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1]497}

三、咏松以喻意志品质并示子孙

苏东坡喜爱竹和梅花，也特爱松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是他的警句，文人雅士以岁寒三友——松竹梅为怀，自诩是如同松竹梅一般有坚强的意志、虚怀若谷的气节、傲霜斗雪的品格。苏东坡亦然。他爱松、植松、咏松、写松，以喻他的意志品质，还常以松为题吟写咏诵，赠予子孙以效仿。这就是苏东坡爱吟松的情怀。

在苏东坡的作品中，能查找到写松、吟松和咏松的地方有120多处，有的是专门写松咏松的，也有与竹、梅合在一起吟诵的。也就是千百年文人墨客所言称的“岁寒三友”。在上面一段的叙说苏东坡作《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一篇文章中，就有“岁寒三友”的描写，有梅花吟“残梅一枝亚”，有竹吟“竹露无声浩如泻”，也有松吟“自知醉耳爱松风”、“瘦竹枯松写残月”。那么，苏东坡咏吟松柏，特别是青松有哪些寓意情怀呢？

我也爱松，尤爱山峰上的奇松、劲松等。所以，我遐想苏东坡爱松吟咏松有如下情怀：要么是见松思乡、思亲情，要么是见松吟松以寄朋友，要么是咏松、吟松与朋友和韵抒怀，要么是咏吟松柏以喻自我的意志品格，要么以吟颂松柏以教后辈效仿学习等。

首先，苏东坡爱松，并写专门论说文章：《记松》^{[1]3411}。他在这篇仅120余字的文章中记下了他对松的特性和研究心得，表明了他对松的爱：

松之有利于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长生。其节煮之以酿酒，愈风痺，强腰足。其根、皮食之肤革香，久则香闻下风数十步外。其实食之滋血髓，研为膏，入漓酒中，则醇醪可饮。其明为烛，其烟为墨。其皮上藓为艾纳，聚诸香烟。其材产西北者至良，名黄松，坚韧冠百木。略数其用于世，凡十有一。不是闲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从这篇记松的短文中，足见苏东坡对松的养生、治病、酿酒以及各种功效的研究和欣赏，并十分认

真谦逊地述说以上心得只谈到松树益处的十分之一，尤为西北的黄松最好。正因为如此，苏东坡就实践松的功用，酿出松醪酒，还专写《中山松醪赋》^{[1]1196}：

始予宵济于衡漳，车徒涉而夜号。燧松明而识浅，散星宿于亭皋。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烂文章之纠缠，惊节解而流膏。嗟构厦其已远，尚药石而可曹。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救尔灰烬之中，免尔萤燿之劳。取通明于盘错，出肪泽于烹熬。与黍麦而皆熟，沸春声之嘈嘈。味甘余而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蒸羔。酌以瘦藤之纹樽，荐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罢儿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使夫嵇、阮之伦，与八仙之群豪。或骑麟而翳凤，争榼挈而瓢操。颠倒白纶巾，淋漓宫锦袍。追东坡而不及，归餽啜其醪糟。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

这就是潇洒、自在、快乐和超然“欲将东山松，涅尽南山竹”的苏东坡，他把这松与酒结合起来，再把这酒和文章与诗赋融为一体。还书写、题后等以酒、以赋馈赠朋友。让亲近的朋友分享他对松和酒的快乐，甚至笑谈“欲问东坡学种松”。

苏东坡眼中的松是诗、是风、是韵，而且是自己的品格和意志所在！

在他的眼中看到的是“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岁寒松柏肯惊秋”、“长松千树风萧瑟”、“依依古松学，郁郁绿毛身”、“路穷斤斧绝，松桂得干霄”、“南山孤松积雪底，抱冻不死谁复贤”、“孤松吟风细冷气”、“乔松百尺苍髯须”、“白须相映松间鹤”……他吟咏松的风范，喜听松风的韵味：“长松吟风晚雨细”、“长松怪石宜霜鬓，不用金丹苦驻颜”、“寂历疏松欹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古松攀龙蛇，怪石坐牛羊”、“夜窗骚骚闹松竹”、“更然松炬照幽深”……他用吟咏松来喻颂友人：“此老如松柏，不受霜雪槁”、“江海相忘十五年，羡公松柏蔚苍颜”、“徂来无老松，易水无良工”、“莫道长松浪得名，能教覆额两眉青”、“凜然苍松动”、“竹坞松窗”、“老居闾里自浮沉，笑问伯松何苦心”……他喜欢看到居所有松，常怀当年种松的情怀，也时常想念家乡的“短松岗”。如吟有“且看松雪媚南山”、“竹屋松扉试乞浆”、“坐看松根络断崖”、“万松谁种已攸攸”、“请公作诗寄父老，往和万壑松风哀”、“丹砂未易扫白发，赤松却欲参黄梅”、“青青一寸松，中有梁栋姿”、“结

茅穷山啖松腴”、“且要长松作土毛”、“君家长松十亩阴”。他还写了《万松亭并叙》和《戏作种松》：“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1]494-495}后来在密州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悼亡妻王弗时还追忆“明月夜，短松冈”，想念家乡“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桀几时归”。苏东坡还吟咏诗篇给晚辈子侄，以嘱咐晚辈以松的意志品质为怀。他作《次韵子由送千之侄》^{[1]681}：

江上松楠深复深，满山风雨作龙吟。
年来老干都生菌，下有孙枝欲出林。
白发未成归隐计，青衫犹有济时心。
闭门试草三千牍，仄席求人少似今。

再有苏东坡在惠州与友人一起游罗浮山道院等以后写一长诗，其子苏过也作诗和韵，他便将诗寄长子苏迈和次子苏迨。也望儿孙们有松风侠骨之意志。他写道：“断桥隔胜践，脱屣欣小揭。瘴花已繁红，官柳犹疏细。斜川二三子，悼叹吾年逝。凄凉罗浮馆，风壁颓雨砌。黄冠常苦饥，迎客羞破袂。仙山在何许，归鹤时堕毳。崎岖拾松黄，欲救齿发弊。坐令禅客笑，一梦等千岁。栖禅置晚酒，蛮果粲蕉荔。齐厨釜无羹，野饷篮有蕙。嬉游趁时节，俯仰了此世。犹当洗业障，更作临水袂。寄书阳羨儿，并语长头弟。门户各努力，先期毕租税。”^{[1]973}

这就是苏东坡松树情怀，爱松、种松、咏松等等伴伴随着他，缘由“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1]889}

哦，我品味、明白了苏东坡的松之情怀意韵！啊，真是坡仙：“醉卧松下石，扶归江上津”^{[1]1093}，妙哉！快哉！

四、咏荷花以喻品性圣洁

苏东坡是个性情中人，见物咏物，以咏抒怀。荷花藕节，是中国最古老的可观、可品、可吟、可颂的本土植物。在西周时就有记载，历代文人墨客以荷“出淤泥而不染”以喻示其圣洁，苏东坡同样不例外。如今能在苏东坡的诗词文赋中找到最早的吟咏荷藕的诗句是他年轻时出任凤翔签判的诗句，也就是他26岁前后的作品。而此前在他南行集中的《湘阴早发》诗中有一句“种藕春满湖”。不过他的第一首完整的吟咏荷花的诗作《荷叶》倒是挺有韵味：“田田抗朝阳，节节卧春水。平铺乱萍叶，屡动报鱼子。”^{[1]66}

他把种荷的方式、特征写得很明白、清晰，告知人们种荷的气候，也照应了他在《南行集》的那句“种藕春满湖”的诗句。然而，苏东坡爱荷花，喻之圣洁在心中始终珍藏着，凡看见了荷花，总要吟诵之。尤其是他在外放州府时，以表达他“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心志！他在徐州吟“飞电过隙珠

翻荷”、“涉江共采秋江荷”；他在湖州任太守时，与朋友“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以示情怀：

清风定何物，可爱不可名。
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声。
我行本无事，孤舟任斜横。
中流自偃仰，适与风相迎。
举杯属浩渺，乐此两无情。
归来两溪间，云水夜自明。^{[1]477}

也就是他吟诵观荷心志后不久，就被“乌台诗案”所累，拘禁百多天，后贬黄州。此后，他咏吟荷花的诗词仍不少，但这种直白胸臆心志的诗句要隐秘和少了些，华丽的颂扬要多一些！请读他在黄州所作的咏荷花的词。他的《少年游》^{[1]1155}：

银塘朱栏曲尘波，圆绿卷新荷。兰条荐浴，
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好将沉醉酬佳节，
十分酒、一分歌。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
宴游过。

这词中，仅“圆绿卷新荷”5个字，写出了苏东坡的心情和感激。他喻意自己获得新生，太守徐君猷善待他这个“罪臣”，也颂扬徐太守治州有方，同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风范，不落井下石，还时常携酒探望，善待苏东坡全家，充满感激情怀！

不过，苏东坡吟咏荷花荷藕的诗词是用作一个背景、环境，他善把景物如荷花荷叶等放在记事抒怀寄情的氛围和背景中，写事写物写人以抒发个人爱好、情趣和独特的感悟。写得更多的是人，如写小姑娘的手、足等。像《双荷叶》^{[1]1174}：

双溪月，清光偏照双荷叶。双荷叶，红心
未偶，绿衣偷结。背风迎雨流珠滑，轻舟
短棹先秋折。先秋折，烟鬟未上，玉杯微缺。

这首词中借咏荷叶实指他的朋友贾收字耘老的侍女。再如《减字木兰花》^{[1]1177}：

江南游女，问我何年归得去。雨细风微，
两足如霜挽纓衣。江亭夜语，喜见京华新
样舞。莲步轻飞，迁客今朝始是归。

这写的是一个莲步轻飞的舞女的足，是苏东坡在京城时所作。他的《菩萨蛮·咏足》也同样写的舞女之足。而在《满庭芳》^{[1]1149}一词中又以荷花荷藕比作舞女的手：

香鞞雕盘，寒生冰箸，画堂别是风光。主
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
新织仙裳。歌声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扬。
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
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
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象赋高唐。

这里苏东坡用“藕”的嫩比舞女的细嫩的纤手玉指，实寓藕与偶，藕丝为情丝。这是他的好友附马都尉王诜的盛情宴会上的表演，让他感动。当年

王诜曾冒死向他通风报信，虽未免遭“乌台诗案”之苦，但东坡记住这份情。再有《双荷叶》也是同样的情怀。再有《蝶恋花·过涟水赠赵晦之》^{[1]1162}也是同样咏荷的表其情怀：

自古涟漪佳绝地，绕郭荷花，欲把吴兴比。
倦客尘埃何处洗？真君堂下寒泉水。左海
门前鱼酒市，夜半潮来，月下孤舟起。倾盖相
逢拼一醉，双凫飞去人千里。

这里苏东坡用“绕郭荷花”四个字比喻湖州与涟水相似，也写在荷池中泛舟，写涟水的荷花盛景，以此赠好友立志千里，以荷为洁。

还有一首词把荷花写得很美，苏东坡赞美这荷花开过尚盈盈，充实有精气神。这就是他在杭州时作的《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1]1160}一词：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
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
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
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
人不见，数峰青。

再读苏东坡《阮郎归·初夏》^{[1]1159}同样也咏荷花在这个季节的美：

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碧纱窗下
水沈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
榴花开欲然。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

苏东坡在这首词中把初夏的各种植物昆虫、气象和人的活动与荷花巧妙融为一体，动静相融，汇成美好的夏日风景，特别是“微雨过，小荷翻”6个字，非常巧、非常美，这是荷花在初夏的绝妙点化，使荷花成为这首词的主角。

苏东坡还写了一首《菩萨蛮》^{[1]1165}，以荷藕咏美女之手，充满了情趣。

柳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柳。香汗
薄衫凉，凉衫薄汗香。手红冰碗藕，藕碗
冰红手。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

苏东坡专咏荷花词有一首，叫做《荷花媚·荷花》^{[1]1175}，据说这一词牌是苏东坡独创，而且就创于这咏吟荷花：

霞苞电荷碧，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重
重青盖下，千娇照水，好红红白白。每怅
望、明月清风夜，甚低迷不语，天邪无力。终
须放船儿去，清香深处住，看伊颜色。

苏东坡笔下、眼中、头脑中的荷花美丽，婀娜多姿，出淤泥不染，仍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他的这首咏荷花词可谓绝佳力作，无愧宋代第一词仙。苏东坡的荷花吟咏，妙语绝佳，令人神往：“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下转第16页）

苏轼的以法治吏观

——基于《厉法禁》的分析

彭林泉

内容提要 在《厉法禁》这篇重要的法律文献中，苏轼针对突出的吏治问题，提出了以法治吏的观点，主张“用法始于贵戚大臣”，反对刑不上大夫，抑制豪门权贵，解决执法不平等的问题。苏轼继承和发展了范仲淹的吏治主张，与他自身的治国论、改革思想有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苏轼 以法治吏 厉法禁 法律文献

《厉法禁》是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制科考试所献二十五篇《进论》之一。《进论》由《策略》、《策断》和《策别》三部分组成，其中策别有十七篇，分别是课百官六篇，安万民六篇，厚货财二篇，训兵旅三篇，涉及驭官、安民、丰财和治军等内容。这里的别是指类别，也就是分门别类地来谈一些政策性的建议，分为四大类和十七条。《厉法禁》是《策别课百官》六篇中的首篇，处于重要地位，是苏轼策别论中的一部分。这些策论系统地体现了苏轼的政治主张，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李泰伯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五曾经称赞这“二十五篇策，霆轰风飞，震伏天下”^{[1]43}。

从法律的角度讲，《厉法禁》不仅是应试之作，也是一篇重要的法律文献，是涉及执法问题的（政）论文，而不是有论者所说的杂议。过去，有论者从文学、写作的角度对此进行过分析、评论，如有的认为，“此篇段段有警句”，“《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疑”，“苏文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议论之杰也”^{[2]386}；也有论者从政治态度对此

进行了分析，涉及苏轼以法治吏的内容，但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问题是苏轼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以法治吏观？其主要内容是什么？渊源来自何处？与苏轼的治国论、改革思想有何关联？又有何意义？本文结合苏轼的《思治论》等政论文章，对苏轼的以法治吏的观点进行详细分析，也许对繁荣苏轼司法研究，推进公正司法有所帮助。

一、苏轼以法治吏观提出的背景

苏轼步入仕途时的北宋，正处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之中，面对突出的吏治问题。

在“重文抑武”的指导思想下，北宋广开科举、录取进士，实行“恩荫”和“进纳”制，导致官僚队伍迅速膨胀，成为北宋王朝难以卸下的沉重包袱。北宋科举正式录取儒士有“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种种，屡考不中的还可“特赐本科出身”。宋太祖时每次录取的儒士仅有二三十人，到真宗咸平三年（1000）录取的儒士竟有1800余人。仁宗朝共举行了13次科举，共录取了4000多人和诸科5000多人。比起唐代每次取士二三十人来，北宋开科69次，取士总数6100人，平均每年360人。要知道，李白、杜甫都不是进士。苏轼在《送章子平诗序》中说：“观《进士登科录》，自天圣初迄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其贵且贤，以名闻于世者，盖不可胜数。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见，宋代科举考试不惟取士名额较唐代大大增加，而且备受重视，登第成为显身的最重要的途径，尽管及第者仍是少数，但考试还是吸引了更多应试者，“举业之士”遍布天下，士人群体迅速扩大，超过任何时期。^{[3]163}

另外，靠“恩荫”入官的也不少——“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仁宗庆历七年靠“恩荫”入官的就有一千多人。恩荫入官已成为当时最大的任官来源——中央六品以上官、地方五品以上官每三年都可恩荫子孙一人，最高可恩荫六人。此外，还可以用钱粮买官做，这样的官称为“进纳”之官。包拯在仁宗朝任户部副使时，在《论冗官财用事》中做过这样的统计：“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其内。”从包拯统计数字来看，北宋中期仅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官员人数就增长了将近一倍。包拯接着说：“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县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县所任之职，素有定数，大率用吏不过五六千员则有余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岁一开贡举，每放仅千人，复有台寺之小吏、府监之杂工、荫序之官、进纳之辈，总而言之，不止于三倍。”因此，出现了一个官职常有四五个人排队等候补缺的怪现象，而且“居其官不知其取者，十常八九”，可见冗官之多。包拯感叹道：“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不窘乏哉！”^{[4]3-4}

苏轼在《课百官抑侥幸》一文中也指出北宋存在大量冗官，国家从近些年来，官吏众多而职位有限，时常是一个职位而有三个人谋求它。在职的一个人，离任无事的一个人，而等待补缺的还有一个人。这就造成一个职位却有两个人无事可做而白吃俸禄的。况且他们任职的时间不长，而赋闲的时间倒不短，凭着他在官时的薪俸收入，作为闲居时的生活费用。因此贪官污吏时常出现而屡禁不止，这是用人的一大弊端。换言之，冗官多不仅成为财政的负担，还会带来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推委了事的官场通病，也会滋生贪官污吏。苏轼在《决壅蔽》一文中对此作了描述。他说，与清明理想相比，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天下的事遇到不幸，向官府诉冤，就如同求见天子一样困难。有不得已而向官府提出要求，就好像求见鬼神一样。公卿大臣不弄清原委详情，就把事情推给下面的衙差小吏办理。所以凡是先送贿赂来的，早晨请办的事，晚上就有结果；空手不送贿赂来的，一年到头也办不成。至于按照常规应办的事，理应解决而没有疑义的事，

无不极力刁难，而等待别人来送礼请托。天下到处如此，一点点小事没有金钱就无法办成。在他看来，如今天下安定，长官大吏奉行法律，不敢徇私舞弊。然而官署办事的小吏却揽权卖法，长官大吏明知不问，习以为常。指出贪污腐败现象存在的严重性。

我国学者认为，宋代集权政治是靠一套官僚体系来实现的，因为要贯彻集权的目的，便要使官僚体系内部牵制，令任何一个主管部门不得擅权，这样就造成设官复沓的局面。然后，官员们又养成照章办事的习性，但求无过，不敢有所作为。于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在耗费巨额俸禄之余，又愈显出腐败、拖拉的弊端，几无效率可言。而北宋中期兴起的改革思潮，也首先要求整顿吏治。^{[5]323}这揭示了冗官的体制原因和种种弊端，也有维持政治平衡，供养众多的官吏，造成冗官之弊端日益突出的问题，致使苏轼这种有志报国的士大夫不堪忍受。在这种背景下，在吏治问题上，苏轼提出了以法治吏的主张。

二、苏轼以法治吏观的主要内容

从苏轼现存的文献来看，苏轼多次谈及以法治吏，而在《厉法禁》这篇法律文献上作了集中而充分的阐述。作为课百官的《厉法禁》，这里的课是指督责，厉是指严厉，法是指法令，多指刑罚、处罚之意。有的也把它译为刑法、刑罚。苏轼的以法治吏观，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提出判断执法是否公正的标准

苏轼在文中首先指出，古时候圣人制定处罚和奖赏的条令，知道天下的人乐于接受奖赏而惧怕受到处罚，于是自下而上地施行人们所乐意接受的奖赏。普通老百姓有一点善行，马上就会有奖赏随之而来，因此，广大民众中那些做了善事的人，都知道这样做了不会得不到奖赏。自上而下地施行人们所惧怕的刑罚，“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意思是公卿大臣即使有一丝一毫的罪过，马上就会有惩罚随之而来，因此，居于高位做坏事的人，也都知道做了坏事不会不得到惩罚。那时，“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圣人就拿他来向天下示众。舜诛四凶而天下服，证明圣人打击了天下不法的大族，小民就心服了，最终天下就归于大治，因此，他们制定的刑罚是用来防备而不经常

使用。这如同树立了一个标杆，提出了判断执法是否公正的标准。

（二）赞同和主张法家的“用法始于贵戚大臣”

苏轼指出，周朝衰败之后，商鞅、韩非用峻刑酷法督责天下，获得了成功。其原因是“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意思是首先对王公贵戚大臣施用刑罚，然后再推及平民百姓，故而他们的国家能称霸于诸侯。这里的“用法始于贵戚”，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苏轼对法家“用法始于贵戚”的主张和做法、成效持积极态度，在他入仕之初写的《书论》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观其改法易令，变更秦国之风俗，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黥太子之师，杀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盖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尽管他一贯蔑视法家代表商鞅、韩非。苏轼肯定用法始于贵戚大臣，然后推及一般官吏及平民的作用，认为法律禁令无法推行，违法作乱之人就不能禁绝。对于犯罪者，应一体治罪，不应因其身份不同而同罪殊罚。在他看来，“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对大臣犯法的问题，苏轼在文中指出：“今夫大吏之为不善，非特簿书米盐出入之间也。其位愈尊，则其所害愈大；其权愈重，则其下愈不敢言。”意思是如今一些高官做坏事，就不是仅仅在簿书上的米盐出入之间做文章可比的了，他的地位越高，所造成的危害就越大；他的权力越重，属下就越不敢揭发他。也就是说，如果大臣犯法，应该用法律束缚他。他列出了两条理由，“其位愈尊，则其所害愈大”，他的权力越大，不遵守法的危害就越大；对大臣绳之以法是对小臣及百姓的警告。不包庇大臣，就起到了警示作用，小官吏自会有所收敛。而当朝的情况却相反，“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举之，而诏曰勿推，此何为者也？圣人之为天下，岂容有此暧昧而不决！”在他看来，这样纵容大臣，他们就敢不严格执行政令，假公济私，贪赃枉法，如此再上行下效，政治怎会有清明的时候？当然，商鞅、韩非所用的刑法，不是舜所用的刑法，但他们用刑之术是舜的术，指打击不法的权豪贵显。后来否定商鞅、韩非峻刑酷法是对的，但庸人竟以为舜所用刑之术，与商鞅、韩

非相同，也弃而不用，致使“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

（三）批评对大臣与平民执法的不平等

苏轼批评当时执法对州县小吏严厉，而公卿犯法不敢揭发，即使揭发，处理也很轻，往往是他的罪行重大，而所受到的处罚却不能损伤毫毛。他主张用法要服人心，即使是公卿大臣，也应有罪则论，犯法则罚。指出现在州县的官员贪财枉法，受到“除名”的处分，甚至被捆绑杖捶，所受的耻辱够大的了，但士大夫中还是有人要去冒狂潮的风险，为啥呢？是这些小官吏心中不服呀！大官吏犯法，顶多降其官爵，罚金也罚得不多，总之，罪恶“暴著于天下”的，“而罚不伤其毫毛”，公卿犯法就马虎敷衍过去了，州县小吏犯法却要严厉追究，也就是说，在公卿将相之中施用刑罚如此草率，而对于州县小吏犯法却如此严厉，这当然使天下不能心服了。施用刑罚而不能使人心服，即使是刀斧锯钺摆在那里，也会有人铤而走险，更何况只是枷锁、鞭笞呢？

（四）对“刑不上大夫”内涵的理解和辩驳

苏轼指出，现在法令繁多，一不小心就会触犯，但大官吏并不害犯法，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刑不上大夫”是古人留下来的规矩，因此不能不可以在大臣身上用刑。苏轼对此辩驳说，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大夫犯了罪也不能用刑。苏轼认为，古代之所以“刑不上大夫”是人君希望大臣能自觉守法，不是指大夫以上的高官犯了罪却不受刑罚。在苏轼看来，刑不上大夫是指审讯方法，不是指制刑。所以大夫以上的官员犯了罪，只是不按照对待平民的审讯程式罢了，这就是刑不上大夫的内涵。也就是说，鉴于王公大臣，尤其是士大夫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更注重人格尊严的普遍特点，对于公卿大夫犯罪，在审理程序上，相比于对士庶人罪犯，可以有所照顾，不进行刑讯鞫问。这种认知是准确的。古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影响也大，但在“大夫”犯罪增多的情况下，为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或镇压统治者中的异己势力，法律对于犯罪的“大夫”，也并非不加惩治，只是有一些与对“庶人”不同的处置方式罢了。例如《周礼》规定：“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西汉贾谊对刑不上大夫作过详细的阐述。他说：“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秽者，则曰‘簠不饰’；淫乱、男女无别者，则曰‘惟薄不修’；罔上、不忠者，

则曰‘臣节未著’；罢软、不胜任者，则曰‘下官不职’；干国之纪者，则曰‘行事不请’。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有谴发则自冠耗续，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缚牵而加之也。其大罪者，闻命则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厂引而刑杀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是曰刑不上大夫。”这种思想，主张用“谦耻节礼”，对待统治阶级中的成员，反对以束缚、系纵及黥、劓、弃市等刑罚对待所谓“大夫”者流，反对把这些犯罪的“大夫”交付徒宫、司寇、小吏等鞭笞骂。

（五）明确主张“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

苏轼认为，古代的人君让公卿大臣担很重的责任，所以放宽了对他们的约束，而约束愈宽，大臣愈加害怕犯法，因为他们心中知道君主不怀疑自己，也就不忍心欺蒙君主了。如果大臣犯了法，那是仍然要处罚的。苏轼在文中提到爵减、罚金、首免和勿推，这不仅是段落表述的变化，而且表明他对犯了罪的公卿大臣，通过这些方式来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否定态度。如按照法律，犯了罪允许自首而免于处罚，这就为盗贼小人开启了悔过自新的道路。而如今公卿大夫犯了罪亦也可以用自首来免于处罚，这是用对待盗贼小人的方式来对待官吏。如果知道他有罪而又轻易地免除对他的处罚，那又凭什么来号令天下呢？如今大臣中犯了法的，有些已经被揭露出来了，可天子却下诏不予追究，这是为什么呢？圣人治理天下，不能容忍这样不明不白的现象存在。所以，苏轼明确主张：“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也就是，“严明法律应该从大臣入手”，明确提出公卿大臣有一丝一毫的罪过，马上就会有惩罚随之而来，那么其他官吏就不敢犯法了。这反映了他的法不阿贵的思想。

三、苏轼的以法治吏观与范仲淹的吏治主张

庆历三年三月，范仲淹被朝廷起用，为参知政事，当年九月，受仁宗皇上的责承，着手改革。随后写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6]，欧阳修等人也提出了一系列补充意见，宋仁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颁布全国，号为“庆历新政”。

《答手诏条陈十事》是新政的重要纲领，范仲淹在文中提出了十项改革方案，其中第1项至第4项为明黜陟、抑侥幸、清贡举和择官长。他提出，目前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制度客观上打击了真正为国效力的人的积极性。对于百官应根据他们的政绩升迁，不称职者撤换。改革考试制度，由重诗赋改为重策论，由死背经书改为阐述经书之义，并鼓励发挥新义。选派得力之人前往各地检察政绩。奖励能吏，罢免贪图享受、贪赃枉法的官员。这项改革方案中，改革重点明显在于吏治，吏治的重点在于地方长官的任用。范仲淹深信，贤者在位，能者在政，必可匡国救民。他检查全国监司名单，将不称职的转运使、提点刑狱一一勾掉，以便撤换。枢密副使富弼对他说：“你这一笔，要使被勾掉的一家人都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哭好啊！”^{[7]189-190}

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一时间，政局因而有所刷新，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庆历圣德颂》一诗加以颂扬，后传入西蜀。当时在乡校读书的苏轼时年8岁，不仅能够背诵这首诗，还向老师请教诗中的11人，得到耐心的解释后，对这11人中的韩琦、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名字有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对其人品和功业还缺乏深入的理解。“八岁的苏轼当时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老师所说的一切，但这四个人的名字则牢牢地记在心中，以后每当读到这些人的文章诗篇，总要特别细细地加以揣摩，所以，当父亲命他仿欧阳修《谢宣诏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试作一篇时，他能写得那么成功。”^{[5]9}

“庆历新政”对苏轼的影响远不止这些。虽然新法的执行使朝廷行政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因为触动了许多大官僚的利益，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加上北宋台谏制度本身的缺陷，庆历新政历时1年零4个月，终于失败。庆历新政是北宋统治集团为挽救危机所进行的一次革新运动，范仲淹以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反映了进步力量的要求，反映了社会大众的心声。尽管目的是为了加强宋朝的中央集权，以图本固邦宁。^{[7]189-190}可是，范仲淹的吏治主张成了苏轼吏治主张的来源之一。成年后，苏轼在政治态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范仲淹的吏治主张，诚如我国学者所说：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其政纲见于《答手诏条陈十事》，前四事为“明黜陟”、

“抑侥倖”、“清贡举”、“择官长”，皆针对吏治而发。苏轼将《课百官》列在《策别》之首，显然也是继承了前辈的改革思想。他对于吏治问题，提出了六点主张：厉法禁、抑侥倖、决壅蔽、专任使、无责难、无沮善。这里以厉法禁为首，可见他并不太忽视法制，虽然他认为“用人”比法制更为根本，但在“用人”之术上，则首先强调“用法”，并且要求“用法始于贵戚”，故他后来对“新法”中“裁减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条式”等限制贵戚大臣之特权的措施，是深表赞同的。从以法治吏的思想出发，他力图建设一支在皇权领导下事有所主、上下交通、反馈快速、富有效率的官僚队伍，故以“抑侥倖”来裁减冗官、以“决壅蔽”来排除障碍、以“专任使”来提高办事效率、以“无责难”和“无沮善”来鼓励官员有所作为的积极性。按照他的理想，行政体系犹如人身，皇帝和官员之间，应如心与手足的关系，自然协调，这才是“有道”。^{[5] 323-324}

从法律的角度讲，苏轼在提出省刑慎罚的同时，提出在执法上要严厉法禁，从朝庭大臣入手严明法律，从而以法治吏，绝不是偶然的，有其渊源。换言之，在《厉法禁》一文中提出的吏治措施，显现出苏轼继承和发展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

四、苏轼的以法治吏观与其治国论、改革思想

在《厉法禁》一文中，苏轼针对执法不平等的问题，在强调执法平等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法治吏的观点，这与他的治国论和改革思想有关，从一定程度上说为前者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人多、地广、资源少、治理难，加上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成了北宋中叶的基本实情。苏轼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治国的一系列看法和措施。基于天地万物都是在不断运动之中存在和发展的道理，苏轼认为治国不能老是守着老规矩一成不变，要破旧立新，以立为先。先定规摩，意思是谋划、筹划。治国就跟建造房子一样，也要先定规摩。那么如何定规摩呢？苏轼认为，皇帝有了立新的主意，臣子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皇帝便可以选择其中切实可行的建议，跟头脑清醒的大臣仔细、周详地研究策划，确定目标，制定实施的办法。然后大胆地推行下去，坚持

下去，努力地去实现它。苏轼认为当时需要立新的有四个方面：清中书之务，让其专心致志地研求国家治理的大计；要信用大臣，否则，即使有贤臣千万，国家还是治理不好；破除庸人之论，开放功名之门，使天下人都为国家“踊跃奔走”；深结天下之心。^{[8] 241-243}

苏轼的治国理念并非一成不变的。起初，苏轼是主张仁政的。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苏轼提出了爱民、忧民、广恩、慎刑的观点，认为应以忠厚为本，从而初步阐明了仁治的思想，即用君子长者宽厚仁爱的风度对待天下百姓，使天下的人争着效法君子长者之道。随着实践、认识的深化，他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融合了仁政，“元祐更化”后期，他却主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要求推进“宽猛相资”的政策。^{[9] 23}

而且，苏轼对北宋中叶的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策略一》中苏轼指出：“臣闻天下治乱，皆有常势。是以天下虽乱，而圣人以为无难者，其应之有术也。”认为政治运行有规律可循，治天下有术，救弊有方，可以讲究。然后指出：“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意思是说从表面上看社会是太平的，实际上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从表面上看没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实际上百姓不能安生，心存怨愤；从表面上没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实际上财政收入常常不够用；从表面上看没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实际上君臣不亲、上下之间没有交情；从表面上看没有外族侵略、边境不宁之灾，实际上中国（指北宋）惶惶不安，常有外忧。也就是说，其所谓可忧者，大致有四，民生不安、财用不足、上下不通、边患不息。苏轼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当时社会“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潜在性危机。在以后写的《思治论》中，苏轼还把社会危机归纳为三患，患无财、患无兵和患无吏（没有好的官吏）。换句话说，国家负担太重，缺钱用；国家养了许多兵，但真正能打仗的兵没有多少；国家有不少官，但真正有用的官吏太少。尽管北宋王朝几十年来采取不少措施解决这“三患”，但都没有成效。苏轼提出要以犯其至难而图其远的勇气，决心革除“三患”。“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而后论所以为立之要云”。这里表明了他的基

本政治态度，是要求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含有更新之意。策略第三至第五篇，讲内政，在第三篇中通论内政之弊有二“立法之弊与任人之失”，而苏轼认定，当今之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所以，他主张法不须大变，要有所树立的话，应该在“用人”上讲究。^{[5]322}

苏轼主张渐变的政治变革，似乎想在激烈的改革派与顽固派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始终固执地坚持他的温和的改革思想。这体现了苏轼独立的政治人格，尽管遭受命运的悲剧性。

他主张“人与法并用”。他说：“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法简而人重，其弊也，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不贤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但是，苏轼认为任人和任法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掌握，不能生搬硬套。

在“用人”上讲究，并不否定法的作用，特别是在吏治方面。因为吏治问题是以法治吏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是多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对此，苏轼提出厉法禁、抑侥幸、专任使、决壅蔽、教战守、厚货财等变革主张。他把吏治问题和民生问题放在主要地位，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在过去，贪污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包括贿赂、贪赃枉法等在内。苏轼的以法治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反贪腐，是基于冗官、冗吏和贿赂等认识的产物。这与苏轼的治国理论和苏轼式的改革或者改革思想有关，不能仅仅把厉法禁作为敦教化的内容。

五、苏轼以法治吏观的意义

以上分析了苏轼以法治吏观的背景、内容、来源和与治国论，改革思想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来源和理论依据，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苏轼提出以法治吏不是偶然的，不是一时冲动的产物，恰恰相反，是深入思考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经过了“深思极虑”。

吏治问题在宋之前已经存在，只是至苏轼应试前，已较为突出。范仲淹、王安石、苏洵等都对吏治问题发表过意见，提出过自己的改革措施。苏轼更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主张。对此，有论者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比如，公卿大臣如若犯法，蠹害无穷，更应严责。如果对此类犯罪疏于制裁，却对州县小吏严加苛责，势必难以服众。因此应当厉法禁自大

臣始，则小臣不犯矣。正是基于这一观点，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对王安石新政当中的“裁减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条式”的做法十分赞同。由此看来，在苏轼的法律思想当中，已经显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朦胧意识。^[10]对当时存在执法不平等的现象，苏轼发现不单是当时的朝廷贯彻政策法规的问题，还是我国实行人治的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理想的人治是大家都严格依据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职责办事，现实的人治却是不可能不伴随着多数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办事，按照自己的好恶、个人的判断来办事。^{[11]216}如前所说，这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反响。

也对后人产生着影响。苏轼的“厉法禁自大臣始，小臣不犯矣”，常被后人引用。有论者认为，课百官就是吏治，是对官员的监督、管理和使用。而六条措施中的厉法禁，对谁厉？对高官，就是严厉惩治贪腐的高级官员。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而是要大打老虎。老虎一打，则狼啊、狐狸啊就不在话下了，更何况苍蝇，吓都吓死了。老虎一打，民心大顺，社会安定。厉法禁是治标，是一剂猛药，用了会起很大作用。^[12]谢晖教授在《重罚与信罚》一文中指出，如何能够唤起国民对法律的敬意？苏轼曾云“厉法禁自大臣始，小臣不犯矣”；古人还讲“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这两句话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一个道理，当政府不尊重法律时，不仅法律是无效的，而且以执法为使命的政府也是失信的。^[13]实际上，近年来，一些单位在廉政建设中，注意总结苏轼的廉政思想，比如提倡用制度管理干部队伍。他所提出的“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专任使”、“无责难”、“无沮善”等观点，可以作为开展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参考。

这涉及到反腐、制度反腐、相信和信任法律等内容。从法治的角度讲，法治之要在吏治。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治权，本质是治官（吏）。法治是建立在良法和善法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其基本信条是法律至上和人人平等。法治的主要目标不是“治民”，而是“治官”。当然，老百姓也要守法，但是对于法治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官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去行使手中的权力。一言以蔽之，法治的要旨是“治官限权”。^[14]苏轼的以法治吏观涉及的对象、方式和理由，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具有借鉴意义。

应当看到，这是篇应试之作，作于仁宗嘉祐六年（1061），虽然经过了深入的考虑，提出了厉法禁的看法，作为督责官员的措施，特别是以法治吏，但是由于阅历、教育等原因，对一些具体的观点和论证还存在不足，如苏轼既蔑视法家的刻薄寡恩，又喜欢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严格执法，他的建议对于改良人治的弊端很有帮助，但是不容易落到实处。^{[11][217]}有论者认为，“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举之，而诏曰勿推伪数句，必其事之至小与可矜疑者而释之，所以存政体也。何议之有？”但总体上讲，瑕不掩玉，苏轼的以法治吏仍然不失其光辉。

注释

[1] 刘乃昌、高洪奎：《苏轼散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 曾枣庄主编：《苏文汇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

[3]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 赖正和：《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

[5]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6]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四部丛刊。

[7] 齐涛主编：《中国清官的归宿》，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

[8] 赖正和：《苏东坡的革新政治主张》，《漫话苏东坡》，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

[9] 朱靖华：《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苏轼新论》，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

[10] 秦文：《因法便民 为民自重——苏轼人本法律理念的现代解读》，《理论月刊》2009年第1期。参见<http://www.docin.com/p-829468156.html>

[11] 刘燕飞：《苏轼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12] 参见<http://blog.163.com/jiang979%40126/blog/static/86670578201211123612520/>，访问时间2014年10月20日。

[13] 参见<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Detail.asp?ArticleID=30481>，访问时间2014年10月20日。

[14] 参见<http://blog.ifeng.com/article/34295269.html?Touping>，访问时间2014年10月24日。

（彭林泉，眉山市人民检察院专委、高级检察官）

（上接第9页）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犹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永遇乐》^{[1][1162]}）他的咏荷莲佳句还有：“渐如濯濯出水莲”、“水精池产红莲花”、“无主荷花到处开”、“荷花夜开风露香”、“故遣双莲一夜开”、“剑潭桥畔秋荷老”、“清风乱荷叶”、“四面垂杨十里荷”、“菊暗荷枯一夜霜”、“秋水静芙蕖”等等。苏东坡的咏吟荷花的诗词不及梅、竹、松多，但不少是传世佳作，同样与岁寒之友一般，抒发了他的圣洁情怀。

（未完待续）

注释

[1] 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2] 赵令畤：《侯鯖录》，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王影聪，眉山市政协主席、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湛江市遂溪县河头镇双村村赠砚亭

苏轼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

林冠群

内容提要 以苏轼诗文为例，论证苏轼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

关键词 苏轼 政治家 思想家 哲学家

若说苏轼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自古及今没有异议；若说苏轼是个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恐怕很多人会心存疑惑。但是，人们似乎也还没有提出过较为具体、充分的理由。那么，苏轼为何不能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呢？

所以看来，具体问题还须具体分析。

一、苏轼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系统的政治纲领、完整坚定而一以贯之的治国理念、丰富的政治实践与政绩

什么叫政治家？判定政治家的标准是什么？

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家都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对其作出各自的解释。而就辞源来说，在中国的典籍中，“政治”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毕命》：“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其次《周礼·地官·遂人》：“掌其政治禁令。”很明显，这里的“政”与“治”是分开的。政者，正也，以公正、正确之道对社会实行治理，如《论语·为政》“道之以正，齐之以刑”，就是这个意思。“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1]339}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对于“政治”一词的准确诠释。根据这一诠释，可以得出自汉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所谓“政治家”的基本概念。即深刻理解儒家的政治理念，有系统的治国方略，能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能左右政治局势使社会稳定、发展、进步，有突出的政绩，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以这样的“政治家”标准对历代帝王将相、名公巨卿进行扫描，今天的学者们得出了自汉唐以来一连串的政治家名单：刘邦、萧何、刘彻、霍光、光武帝、曹操、杨坚、杨广、李世民、房玄龄、赵匡胤、范仲淹、司马光……且不论这些名单是否完备以及其是否都合乎标准，只要有了这些具体的标

杆，就等于有了可以比较的参照系。其中尤以北宋的赵匡胤、范仲淹、司马光三位与苏轼更有可比性。

苏轼自小便有大志。七八岁开始读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2]63}，年少入乡校，读《庆历圣德诗》，即向乡先生打听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政界名人的情况，并表示了向慕追攀的志气。十岁听母亲读《后汉书·范滂传》便立志要做范滂那样的人，问母亲“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母亲回答他“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从此，母亲常对家人说：“二子必不负吾志”（二子，指苏轼与苏辙）^{[3]1280}他十八岁时，在《上韩太尉书》中也坦言：“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这就是说，苏轼自青少年时期起即留心历代国家盛衰治乱的政治事件，并能就此发表看法，提出观点，著为文章。

这种胸怀大志，留心历代兴亡盛衰并能以文字表达见解的本领使苏轼在科举仕途上占得了先机。

二十二岁，苏轼赴礼部试，著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极言儒家“仁爱为治”的本旨。其中申述“疑罪从无”，“刑以助教化”的人性化法治思想，直到今天仍是我们所应该汲取的政治法则之一。欧阳修等阅其文，“以为异人”，说明苏轼对于儒家治道深有感悟，认识深刻，异于流辈。欧阳修作为主考官，本拟以苏轼为第一名，后疑为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避嫌而定为第二，而接下来的《春秋对义》考试，苏轼又取得了第一名。这都充分说明青少年时期的苏轼对于政治的识见已经远远超出同时期的诸生。

苏轼二十六岁时与弟弟苏辙由应制科（即制举）考试，这是宋时仕途上最高等级的任职资格考试。苏轼入三等（宋代制科试，一、二等皆空缺）。此次制科考试前后，苏轼就历史上的政治得失以及当前国事的现实问题，分别进论、进策达数十篇，又在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廷试中回答种种“策问”，表

示了对历史问题及现实问题的真知灼见及应对策略。其中如《王者不治夷狄论》，强调对于少数民族，中央王朝应充分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与传统文化，提出“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的辩证观点。这就是他晚年谪居儋州时期与儿子过所提出的实行民族自治的政治主张。这也是古代政治家们从未涉及的话题，为苏氏所首倡，而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为我们所切实施行。在《形势不如德论》中，苏轼强调了“要以仁义为本”的儒家德治思想，指出“大封诸侯、错置亲贤，以示天下形势”的“以人为形势”以及“有以地为形势者，秦汉之建都是也。秦汉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不管是以人为形势还是以地为形势，只要德政不施，人心解体，君臣相悖，最后都会导致亡国的危险。儒家德治的要义就在于为政而得人心，所以苏轼后来在《上皇帝万言书》中对神宗皇帝的第一建议就是要“结人心”，而在他以后四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他都一以贯之，将人民的利益、百姓的安危放在从政的第一要务上，践行不废。而他的《上皇帝万言书》一直到清代还得到康熙、乾隆等政治家的赞许。

在应制科考试期间，苏轼针对当时的社会积弊，所上的应对之策以及回答仁宗皇帝的“策问”中，提出了要求改革弊政，督察百官，厉行法纪，体察民情，节省费用，保障边防，注重选才，以至于一国之相所需要考虑的“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4]325}等当今要务，苏轼都对宋仁宗作了详尽的回答。难怪宋仁宗事后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两宰相指苏轼兄弟）^{[5]10812}可惜的是，还未等到苏轼兄弟被重用之日，宋仁宗就驾崩了。接下来的英宗皇帝本也欲重用苏轼，却被宰相韩琦以年轻、未经基层锻炼为借口加以阻挠。一直到神宗朝，虽然宋神宗赵顼也一直看重苏轼的才华，常有“人才难得”之叹，但他根本不能接受苏轼的政治主张（即实施社会改革须“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以爱民富民为本，实行渐进式的改革，整肃吏治与军队，整军备战示敌以不败而不是轻启边衅）。他一心只想富国强军，抗击夏，洗雪前耻。这一动机让王安石窥探得十分清楚，立即迎合上意，提出“以收利权”^{[6]327}为本的改革目标，向天下百姓放债取息、与民争利，而谓之“理财”。所以后世若以王安石为“政治家”，那他这个“政治家”是宋神宗给的，同样，若神宗

看好苏轼的变革主张，付与宰执雄权，能说他不是政治家么？差别仅在于宋神宗并不接受苏轼的政治主张而已。而宋神宗坚信王安石却不接受苏轼，正是北宋走向衰亡的开始。

到了宋哲宗朝，苏轼便纯然成了党派斗争的出气筒，政治生命从此了结。

但除了《上皇帝万言书》之外，苏轼在朝期间，如元祐更化时期，他虽不能执掌宰相大权，却提出了许多连当朝宰相也见解不到的正确的政治主张。如他作为礼部尚书，在其职权范围内，反对开除太学生马澈。因为马澈发现当时礼部颁行的《礼部韵略》尚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上书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却遭来被国子监开除学籍的处分。苏轼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堵塞言路，使朝廷听不到正确意见的错误处分。他说：“投献书启文字，求知公卿，此正举人常事。……若论列朝政得失，使其言当理，固人主所欲闻也；若不当理，亦人主所当容也。”目的就是要“达聪明，防壅蔽”^{[7]1011}。这件事正好反映出元祐末年，政局混乱，下情不能上达的昏庸状态。此时的苏轼正受到各路小人的嫉妒攻击，所以如此正确的意见竟然被淹没在无休无止的党派恶斗中。又如，在礼部尚书任上，苏轼反对向高丽使者出售皇家典藏的图书。他认为，高丽使者提出购买这些图籍，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这些图籍中存在可涉及国家机密的资料，可供敌国利用，对国防不利。可是昏庸的北宋当权者并不理会苏轼的再三警告，最后还是允许高丽使者带走了大量图书。苏轼还在奏疏中指出：“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许馈遗外，并无丝毫之得而有五害……”^{[7]994}这是涉及外交事务的重大事项，可是当时的当政者却对此麻木不仁，完全不考虑其中的得失，任由贪浊官吏为一己之私祸害国家。至元祐八年，宋哲宗亲政，更昏庸地将苏轼逐出朝廷，出任定州知州。苏轼临行前，哲宗甚至不按惯例接见他，而苏轼却忍受委屈向昏庸的宋哲宗提出忠告。其中有言：“臣闻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于近臣，不能自达。……上下不交，则虽有朝廷、君臣，而亡国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7]1018}苏轼去世后不过三十多年，北宋便灭亡了，而这样的亡国之痛完全可以从苏轼当年的种种正确见解中找到其致病根由。能说苏轼不是

一个具有杰出见解的政治家？

苏轼不仅具有卓越的政治见解，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政治实践与骄人的政绩。苏轼从政四十多年，除了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六七年外，包括被流放的十多年，一直在基层工作。而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首先深入了解群众的疾苦及地方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自王安石变法开始，东南一带农村因各种税赋太多，农民欠下朝廷的债务相当沉重。元祐七年，苏轼在赴扬州知州任途中，为了解群众拖欠朝廷税赋情况，特地孤身一人，深入村落，不要随从，微服私访。结果情况令他大为吃惊。他说：“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7]959}为此，他再三向朝廷奏请免除百姓所欠的债负并大声疾呼：“孔子曰‘苛政猛如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7]959}如此认真负责的政治态度，如此为民请命的果敢精神，不要说被后人捧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司马光之流没有做到，即如苏轼所一直敬仰的范仲淹也无如此从政记录。苏轼在杭州任上，主持修浚即将湮塞的西湖。动工前，广集民意，听取专家建议；动工时，以工代赈，救济灾民，结果不数月大功告成，成为千古传颂的德政。反观王安石之流治理黄河，听信几个不谙治水工程的太监及小人李公义等，搞出什么“浚川耙”、“铁龙爪”之类的愚蠢玩意，结果“积以数年，靡费百十万之钱谷，漂没百十万之丁夫，迄无成功”^{[8]927}。如此作为，被明代杨慎讥为“愚且戆”。以此为例，说王安石是“政治家”反而贬抑苏轼，认为他不是政治家，能说过去吗？更让人惋惜的是，苏轼在徐州任上，面临洪水威胁，不顾个人安危，禁止富人逃跑，誓与全城百姓共存亡，三过家门而不入，坚守在最危险的地方，与兵士、百姓抵御洪水，最后“全城以闻”，获得宋神宗的嘉奖的同时，苏轼还特别就徐州的战略地位写了《徐州上皇帝书》，提出了一整套十分正确而有远见的防御策略，文章最后说“今臣于无事之时，屡以盗贼为言。其私忧过计，亦已甚矣。陛下纵能容之，必为议者所笑。使天下无事而臣获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图之，则已晚矣”^{[7]762}，然而，神宗虽知道嘉奖苏轼，却将他的正确建议置诸脑后，不予理睬。直到三十多年后，金兵铁蹄踏破北宋帝都时，

朝臣们才知道苏轼建议防御徐州城的无比正确，然而，“则已晚矣”！

宋神宗不忘嘉奖苏轼抗洪救灾的功劳，因为这在北宋一百多年的治绩中是十分罕见的政府官员的典型。可是，他立即又背过身来，容许一班无耻小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苏轼打入死牢，差点送命，“赏罚不明，罚有过当”，这难道是一个“明君”的作为么？苏轼在如此昏庸的权力操弄中失去了实现个人政治理想的机会，绝不能说他是一个失败者！从今天的角度看，苏轼当年为北宋朝廷开出的种种政治策略，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法、外交等方面，都是匡时济世的良方！苏轼实不愧为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

有人说，苏轼在政治上是失败的，那么苏轼政治上的失败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假如说苏轼没能登上相位，不能像王安石那样推行变法，算是“失败”，那么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不也以失败告终么？范文正公是政治家，苏文忠公又何以不能成为政治家？也有人认为，苏轼“在权术方面其实是个低能儿，换言之，他缺乏政治家的八面玲珑和见风转舵，不懂处理人际关系”。这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把政治家与八面玲珑见风转舵、阴险毒辣不择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弄权术不讲道义等等不顾人类道德良知的奸恶行为联系起来，这样定义的决不是政治家而是政客，是一个贬义的称谓。

二、苏轼具有深邃的思想意识，有着过人的洞察思辨能力，有极高的智慧与幽默感，有着深刻的人文精神与社会良知

考察苏轼作品的思想性即可以见出苏轼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魅力。其思想性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概括：

（一）唯物辩证性

在苏轼的思想意识中，唯物辩证思维是他思想中最具活力的能超越时代局限的科学进步意识。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二程唯心天命观打着诠释《大学》、《中庸》论的招牌在学术界大行其道。他们鼓吹“天命”、“性理”之说，以一个虚无缥缈的“天的意志”来主宰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行为。这种玄而又玄的荒诞说教，受到年仅二十六岁的苏轼的勇敢挑战。他说：“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不可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也。后之儒者，

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7]60}而苏轼否定了这种唯心的“天命”观，将《中庸》解释为是圣人教导人们的一种进行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论与终极境界：诚。因此，苏轼不仅在一般文章中多次批评庸俗的“性命”说，将被二程唯心化了的《中庸》论拉回唯物的范畴，而且就在递呈神宗皇帝的《议学校贡举状》中，他也直截了当地说：“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7]725}公开反对唯心的“性命”说。

苏轼反对唯心的“天命”观，认为“仁义礼智信”这类纯出于人性的道德修养范畴的东西不可能是上天赋予人的，而是由人的情感演进而来。他举“礼”为例：“昔者，上古之世，盖尝有巢居穴处，汙樽抔饮，燔黍捭豚，蕡桴土鼓而以为是，足以养生送死而无以加之者矣。及至后世，圣人以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宫室，新之以簋豆鼎俎之器，以济天下之所不足，而尽去其太古之法。”^{[7]57}以为上古时期的“礼”，决非今天的礼，随着时代的不断进化，“礼”也会不断改进。这就是明显的唯物进化史观。

又如他晚年谪居海南时曾发感慨：“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谁不在岛者？”^{[7]2549}这是从现实的地理环境中认识到天地自然之间物质世界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唯心地揣测不可知论的创世纪的神话。又如在儋州时所书《书海南风土》一文，谈到“僮耳颇有老人，年百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但他没有把这长寿的现象归结于“性命”等唯心天命观，而是以为“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7]2275}，强调只要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就可以改变人自身的适应性，获得长寿。

（二）唯心感悟性

在苏轼的思想体系中，青少年时期，唯物的成份较多，而进入中老年以后，随着对佛老思想的进一步吸纳与体验，加上自身的坎坷遭遇而寻求自我解脱的精神需求，唯心的成份也渐见丰沛。这种情

形也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

苏轼年青时，对佛教采取排斥的态度。如在《中和胜相院记》中，他就坦白地表露出对佛教的不恭：“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湍淶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途。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7]384}然而，进入老年以后，他在谪居惠州期间，则又表示了向往佛学，愿究心其间的愿望：“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于无所待故而得者。”^{[7]390}这种愿望产生于政治失意，遭受打击之后的一种心灵追求。早在被贬黄州时就产生了。那时的苏轼刚脱命于缙绶之中，庆幸于重生之时，反思既往以身许国而壮志未酬却几陷灭顶之灾的突然变故，他对于人生对于生命总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于是思想到冥冥之中的所谓“道”。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是这样写的：“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7]391}完全属于以佛道疗伤，救治心灵的自我认知。而且，似乎他很快也渐入佳境，有所顿悟。在《上清储祥宫碑》^{[7]502}中，他将儒学与黄老二家宗旨熔于一炉，阐述道：“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则韶濩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礼，不能以致刑措。”认为儒家的仁与道家的学说本就相通之处。如此解说“仁”，真可谓见解非凡，锐意独创，连与他在学术上有不同观点的程颐也十分佩服，认为这是“古今论仁，最为妙理”^{[9]237}。他又把学佛与儒学的进德修养联系起来，认为学佛之人“方其迷乱颠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万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为山九仞之后，毫厘差失，千劫不复”^{[7]393}。这就是说，学佛的要旨在于“一念正真”，若在某一点上失了真与善的诚实，都不

会有收获。所以他把这引申到儒家的圣人之“道”上：“道固如是也，岂独佛乎？子思子曰‘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是二法者，相反而相为用。儒与释皆然。”

^{[7]393}这就是说，在某些极端的问题上，平凡的匹夫匹妇能做得到的，虽圣人也不一定能做到。这种现象，儒学与佛学都是一致的。如此辩证思维，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苏轼对于佛理的辩证思维，常常使他的作品充满奇思妙想，意蕴贯通，又能博辩无碍，自圆其说。这种本领，连一直视他为异类、痛加贬抑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10]620}如他写《成都大悲阁记》^{[7]394}，以千手千眼佛破题，开头就说：“大悲者，观世音之变也。观世音由闻而觉，始于闻而能无所闻，始于无所闻而能无所不闻。”将闻与不闻，无所闻与无所不闻的辩证关系先来一番辩解，进而递进到身与手的关系：“能无所闻，虽无身可也，能无所不闻，虽千万亿身可也。”又是一番辩证的推衍。由此而层层递进，说明千手千眼功能的无所不及、无所不能。所以“心虽不起，而物无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运，虽未可得见，而理则具矣。”最后以“颂”的形式自我圆场，表示“佛虽无心应物”，却是“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虑”，即有求必应，不讲任何条件。“随其所当应，无不得其当”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应世功德。为此，多方诋毁东坡的朱熹也似扬实贬地说：“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10]620}

（三）理趣思辩性

苏轼有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有人认为这不是一首诗，而是参照《楞严经》“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的说法文字生发出来的谈禅说佛的所谓“偈语”。这样的批评固然有他的道理，然而就算是一首偈颂，这种题材本身也是一种韵文，与诗歌同类，尤其诗中以琴、指、匣、声等意象构成一个意境，传达一种理趣，让人明白、回味事物之间相辅相成可以达到的妙境，也可让人省悟出孤芳自赏、孤掌难鸣的孤立、孤独之短。诚如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所言：“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11]4}从它“深

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这一点上看，这便是一首理趣诗，是一首轻松地让人获得思索兴味的好诗，是一首具有创造意义的说理诗。尽管不能用传统的诗歌标准去衡量它，但它的客观存在也会以自己独特的形象保留于人们的记忆里。

他的另一首《和子由澠池怀旧》，开头数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记东西。”说尽了永恒的世界与短暂人生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个人漂泊在世间，他个人的踪迹就像雪地上的爪痕，虽有点不堪回首的伤悲，也有点无须顾恋的旷达，全在于你自己的体验与感念。这种超越了个人情感体验的艺术构成显然形成了能耸动心灵的久远艺术存在，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乐道。

又如他那首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若只从字句上看，这首诗毫无特别起眼之处，作者也几乎是冲口而出，不计工拙，并不想在炼字炼句上下功夫，可是它带给读者的却是非常直接的哲理启示，让人立即从眼前的诗意中进入一种深邃而有趣的思考探寻中。并且现实的生活场景让读者非常容易进入联想，将自己的生活体验观照诗歌所展示的诗意画面而生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正是这首诗能流传千古，传颂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它太生活化了，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形象化地溶入人们的阅历经验当中，成了任何时代都可以援引的生活化了的警句名言。这是称雄百代的唐诗也未曾达到过的理趣巅峰。

除了诗歌，苏轼在其他文体中所表现出来的理趣与思辩能力也随处可见。他在《超然台记》中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他在《凌虚台记》中说：“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他在《黠鼠赋》中说：“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他在《论封建》中说：“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能不失时而已。”他在《论周东迁》中说：“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这句话竟成为北宋灭亡的预言）他在《论始皇汉宣李斯》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想方设法防止动乱还不如从根本上消除能引起动乱的原因）他在《滟滪堆赋》中说：“嗟夫，物固有以安

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他在《后杞菊赋》中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他在《上皇帝万言书》中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他在《日喻》中说：“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像苏轼这样，留下这么多凝结着思想精华的文学作品供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欣赏咀嚼；留下这么多闪烁着思想智慧的华丽篇章充实着中华的文学宝库。苏轼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与优点就是它的思想性。他在《上曾丞相书》中说：“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7]1379}主张客观地探寻万物之理，而不能以一己之私作片面的经不起推敲的虚假之文。正因为这样不昧心不欺人的无私作风才能成就一个伟大作家的品格。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轼的思想智慧还不仅仅表现在文学方面。对于社会人生，对于国家的兴衰成败，对于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他都无时无刻不在作深入细致的思考并将其形诸文字流传后世，成为华夏民族思想智慧的精华。

一个思想家，始终都以追求真理为己任，苏轼以“无私而通万物之理”为个人求学进修的途径，正是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一个思想家又总是以人民群众的生存作为自己思考和关怀的主观动力，苏轼的一生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一生虽贵为帝师官封三品，出入侍从，可清贫至老，临去世之日也无处可归而寓居友人的屋宇之下，可他曾捐出自己仅有的五十两黄金设置免费救济贫病百姓的安乐坊，如此高风亮节，谁可比肩？一个思想家不会迎合权贵、附和世俗、结党营私，这一点正是苏轼在他那个时代处处碰壁，时时为小人所诬蔑排挤的主要原因。一个思想家，他的精神是高贵的，不畏权势，敢于直言，宠辱不惊，苏轼的一生正好完整地诠释了这一点。他一生三次遭贬谪，最后被流放到海南

儋州，却也安之若素，做着“余生欲老海南村”的最后打算，决不向权奸屈服。

思想家的思维是超越时空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我们的历史时空里固然闪耀着像孔子、孟子、老子、孙子、王充等著名的思想家，但同时也有人将李贽、王守仁、顾炎武、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也捧为“思想家”，甚至连当代银行家周小川、网络明星韩寒等也可称为“思想家”的时候，却不承认苏轼为思想家，这样的观点正确吗？记得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苏学专家朱靖华先生曾援引英国某研究所列出的中国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时，仅排出秦始皇、康熙、毛泽东、苏轼四个名单，不管外国人的看法如何（如周小川、韩寒等，也是外国某机构所列出的），可以肯定的是，苏轼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早已为世界所共知。

三、苏轼一生有《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哲学著作，还有大量或专门或涉及哲学的话题，充分体现出他的哲学素养

苏轼算不算一个杰出的哲学家？有学者认为，“哲学家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哲学范式有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与哲学体系的哲学学人。有没有自己的哲学范式和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是哲学家与一般的哲学学者的根本区别。”我们就根据这一原则并参照中国已经获得定评的一些哲学家（比如朱熹）去分析一下，苏轼够不够得上这一标准。

苏轼的哲学基础源于其父亲苏洵，此外没有发现他有其他的师承关系。苏洵靠自学成才，青年时期发奋攻读，几乎读遍了先秦以来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了僻居西蜀一隅的饱学之士。饱学之余，又能以文而达其意，发扬其见解，均可见诸《嘉祐集》中。苏洵著有《易传》未完而歿，临终时嘱咐苏轼继续写完。清纪昀在《东坡易传》一书“提要”中称：“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为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12]而苏辙在为苏轼所作的《墓志铭》中说：“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顺逆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3]1422}总之，三苏父子的学术基础纯出于自学，毫不依傍，故其言论常被朱熹等辈讥为“杂学”，视为“纵横家言”，以示不屑。然而这正好证明，三苏父子兄弟实具有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相比之

下，如朱熹，师承北宋二程之学，为程门的“四传弟子”，因此南宋时，林栗曾批评他：“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13]233}

三苏哲学的基础理论以研究《易》《书》《礼》为基础，并且以自己的研究所得形成以现实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体系。苏洵在《易论》中说：“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不耕而不饥，不蚕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而圣人者独为之君臣，而使天下贵役贱；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为之兄弟，而使天下长役幼；蚕而后衣，耕而后食，率天下而劳之。”

^[14]苏轼在《书论》中说：“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议及于百姓，以观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听也，则又反复而论之，以穷极其说，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亲而爱之。”

^{[7]55}苏辙在《礼论》中说：“夫古之人何其知礼而行之不劳也。当此之时，天下之人惟其习惯而无疑。……至于后世，风俗变易，更数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异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记录三代礼乐之名，……甚矣，夫后世之好古也！”^{[3]1422}以上引论，说明三苏哲学的着眼点全在于探求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分明有别于朱熹所继承的二程“性理”之学。故纪昀指出《东坡易传》“多切于人事，其文辞博辩，足资启发”^[12]。反观朱熹等的“性理”之学，“认为‘理’是第一性的东西，是物质世界存在的基础。认为天地万物以至于君臣、父子等等封建秩序，都有它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本身是绝对不变的，它先于事物而存在，并且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和基础。……这种宿命论的说教，目的很明显，就是把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说成先天注定的。”^{[15]263}以一种空想出来的虚无的“理”来建立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与三苏哲学完全不同。可以说，苏轼《东坡易传》是在三苏原创的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中的哲学成果。其余《书传》《论语说》二书也莫不如此，都以切人事、求治道为宗旨，并非如朱熹之流冥想自一个虚无的先天而存在的“理”来相互衍绎，得出“三纲五常”“君权神授”之类的唯心命题。

朱熹依傍二程以及周敦颐等辈所建立起来的哲学基础而并非他自己的原创，此外他提出的“格物致知”似在认识论上有所发明与创造，但这“格物致知”的结果非并如今天我们所要求的认知自然规律、客观规律，而是为了“穷天理，明人伦，讲

圣言，通世故”，最终还是归结于明“理”，并不能越出二程的“天理性命”之说。既然他并没有自己原创的哲学基础，也没有建立起独特的哲学体系，为什么他却能顺应封建统治体制的需要而高居中国哲学家的榜单呢？而像三苏这样既有自己原创的哲学基础又有一套独立的哲学体系反而不被中国哲学界所看好，湮没无闻呢？似乎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朱熹哲学完全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它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几百年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不是偶然的。”^[15]特别是明清两代，他的“性理”之学已经成了帝王代天创造一切的“纲常”之学，他的“理”成了上帝的代名词。他曾说：“帝是理为主”^{[10]4}把理称为“天地之心”，“天地生物之心”，因此强调人们一定要在这“天理”的笼罩下，按帝王的意志行事，不得以自己的人欲之私坏了帝王所定的规矩。这当然深得帝王之心，奉为独尊而排斥其他。而朱熹毕生却以排斥三苏学说为己任，自然在性理之学大行其道时看不到苏轼学说的影子了。然而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学者都买朱熹的账。如南宋李衡作《周易义海撮要》，宋末元初丁易东作《周易象义》，元代董真卿作《周易会通》都曾采用苏轼的观点。二是苏轼生前身后文名盖世，文学上的成就深受追捧，加上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因此掩盖了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包括哲学，都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然而，就朱熹在批评苏轼《易传》的《杂学辨》中所言，可以见出二人在哲学范式方面的差异。

苏轼《易传》卷一：“彖曰：大哉乾元！万物之始，乃统天。”苏轼对这句经文的解释是：“此论元也。元之为德不可见也。所可见者，万物资始而已。元之德不可胜言也，惟是为能统之。”苏轼认为，《易经》在这里解释“元”的概念，是以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现象来表示的。因为“元”作为一种概念，不可能指某一具体事物，所以才能将万物生生不息的现象统称为“元”。这里所谓“元之为德”、“元之德”的“德”不是指“道德”的“德”，而是《管子·心术上》中所言：“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者；谓其所以然也。”^{[16]220-221}也就是说，“元”作为一种概念来表示“德”，也就是上天让万物获得的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性。既然是一种自然规律，当然是看不见的，所见的只是各种各样的生物生生不息的现象。但是朱熹却对此批评道：“四德

之元，犹四时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发育之端，万物所丛出，故曰‘万物资始’，言取其始于也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间，体段昭然，未尝不可见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识之，是以苏氏未之见耳。不知病此，顾以己之不见为当然，而谓真不可见之理，不亦惑之甚矣。”显然，朱熹在这里的驳论是先从他的“天理性命”说入手，以先天而存在的“理”来解释“元”，将“元”作为四德之首（春夏秋冬，仁义礼智信），比喻为春，比喻为仁，统统纳入他的“性命道德”中的“德”中表示“元”居于首位，居于发端之意。然而，不管是春还是仁，也都是一种概念，谁见过春为何物？仁为何物？这证明朱熹根本就不懂抽象、概括的理性思维，由概念到概念，以并非具体事物的春与并非具体事物的仁比喻为“元”。若以其逻辑关系而言，岂不是说春为元，仁为元，所以“春就是仁”么？或换句话说：你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就是你么？

苏轼从朴素的客观唯物论入手，而朱熹从客观唯心论入手，这其实反映了哲学范式中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所派生出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的对立。从今天科学的角度看，苏轼观点的进步意义显然超乎朱熹之上。宋代哲学仍然以儒学占上风，但儒学到了宋代却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势头，犹以二程对《大学》《中庸》的整理发掘为标志。但二程的“性理”之学同时又将古老儒学中强调的人本思想扭向了“天命”论，而到了朱熹的手里便完全成了帝王的统治术，开始走向反动。所以苏轼的观点虽未能占上风甚至被埋没，却正好证明了中国儒学哲学属性的落后与衰退，被同时期从神学中挣扎出来的西方哲学所超越。另外，苏轼主张古老的儒学应吸纳道家与佛学的有益成份，如上述所言《上清储祥宫碑》中所论述的，就是典型的一例。可是，朱熹之流却极力反对，视这种学风为离经叛道之举，是驳杂不纯的邪门歪道。然而，作为哲学的本义来说，哲学需要创造的是一种思想能力而不是某种知识。儒学也好，道学也好，佛学也好，若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也只是提供了一种思维能力，因此三者之间必有可通之处，必有可供借鉴的妙法，即思考使各种知识艺术地配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知识体系。由此可见出苏轼哲学思想的进步意义。其超出朱熹辈的狭隘观点已经不啻千里之遥。说朱熹等辈为哲学家而否定苏轼为哲学家，显然也是一种十分狭隘的偏见。

当然，苏轼的哲学观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与唯心倾向。如他的《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与《和陶神释》三首诗，有所谓“细察我与汝，相因以成兹”（形赠影），“君如火上烟，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影答形）“二子本无我，其初因物著。岂唯老变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得长托附”（神释），即明显主张“形灭神存”论，近乎张载的“神化”说。另外，苏轼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常抱有迷信思想。他喜欢记录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的神怪故事，并表示出思想上的某种迷茫不解。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科学家的身上，值得研究探讨。

注释

- [1] 韩非子：《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2] 林冠群点校：《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
- [3] 苏辙：《栞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4] 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
- [5]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6] 冯琦原：《宋史记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7]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8] 杨慎：《升庵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9] 邵博：《闻见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10] 朱熹：《朱子性理语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11] 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 [12] 苏轼：《东坡易传·纪昀〈提要〉》，四库全书本。
- [13] 白寿彝、启功、郭预衡、李修生主编：《文史精华·学案卷·晦庵学案》，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
- [14] 苏洵：《嘉祐集》，四库全书本。
- [15]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 [16] 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林冠群，海南日报原总编助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苏轼徐州诗文精神意蕴与密州时期之关系

李 贞 管仁福

内容提要 苏轼徐州诗文精神意蕴承自密州，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和深化了密州期间的精神意蕴。表现在诗文上能从激愤张扬的情绪中有所收敛，更加专注于实际作为。“勤政爱民、以道事君；吾生如寄，寓意审美”思想便是在“超然”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生态度的深层美学思考。

关键词 苏轼 徐州诗文 密州时期 以道事君 “寓意于物”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艺术全才，诗文、书法、绘画样样精通，其作品的精神意蕴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精神意蕴是指作品中渗透出来的理性精神及内涵。徐州作为苏轼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其作品精神意蕴与密州时期一脉相承。从苏轼徐州诗文中探析其丰富的精神意蕴，可以看出苏轼徐州诗文精神意蕴从以下两个方面与他在密州时期的思想精神有着直接的沿承关系。

一、勤政爱民，以道事君

勤政爱民，以道事君，这是苏轼一生坚持并践行的为政理念。熙宁七年（1074）苏轼从杭州通判任上移知密州，这是他一生外任知八州的第一州。这里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文化氛围都不能与“灯火钱塘”（《蝶恋花·密州上元》^{[5]129}）同日而语。在这“寂寞山城”苏轼没有停止对现实的关注，他在《寄刘孝叔》诗中针砭时政，直指新法：“保甲联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1]1275}，点名批判新法的“保甲法”、“手实法”，可谓大胆直言。苏轼从杭州赴密州途中寄苏辙所作词《沁园春》（孤馆灯青）^{[5]125}，抚今追昔，感叹年少时“致君尧舜”的满腔壮志，而如今来到这座“寂寞山城”，半废半用。但苏轼自己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认为“用舍由时，行藏在

我”，主动权还是在他自己手里，不妨在此养精蓄锐，以期重用。政治上的挫折反而磨练了苏轼的意志，所以才有了《江城子·密州出猎》^{[5]136}狂放的报国之情，他把“鬓微霜”、与新党之矛盾都抛在一旁，借出猎的豪兴，以少年英雄孙权自比，将深深隐藏在心中的夙愿托出。可以看出密州时期苏轼虽因遭受政治打击的现状心中有所苦闷，但是天下社稷更重于个人荣辱得失。此时的苏轼从杭州通判成为密州知州，职权加大，责任也加重，这一方面有利于职权的行使，方便更全面地为百姓办一些实事。密州的蝗灾、旱灾苏轼都亲自下田了解实际情况，积极寻找水源解救旱灾，整顿社会秩序，收治弃婴，他的政治才干得到全面的施展。他积极上书皇帝，为民请命，请求减免赋税，得到了首肯。这些是他杭州期间职权不能够达到的。另一方面，他在深入实践中，也发现新法的部分条例是便民的，不能够全盘否定。可见他对新法的态度并不是盲目的，对新法的批判也是清醒的。这种沉着的理智正是苏轼一个重要的优秀品格。苏轼更专注于便民的现实事业中，在苦难磨砺中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所在，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就感。这些都是苏轼能够在密州后期自我解放，发出超然物外哲思的内部原因。

苏轼徐州时期以道事君、以文干政的精神意蕴与密州时期相沿承。熙宁九年（1076）年底，苏轼奉诏离开密州，被派往山西西南端的河中府任职。当苏轼赴任河中府到达京城附近的陈桥驿附近时，他被通知改任知徐州。紧接着发生了一件让苏轼意想不到的又十分费解的事情，即苏轼抵达京师，门吏告诉他不许入京，却又没有合理的解释。这其中的原因无疑与苏轼反对变法有关。这样的政治打击让苏轼猝不及防，他对宋神宗一片耿耿忠心，却受到如此冷遇，这难免让他感受到世事难料、政治险恶的丝丝寒意。他意识到自己身处政治的漩涡，发言论

事有所收敛,不再像密州期间那么张扬直白。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化用典故、委婉叙事的手法,但是还是为以后的“乌台诗案”埋下了隐患。苏轼在徐州的创作,社会政治诗大大深化了在密州期间的内容。他在徐州的政治实践,表现出勤政爱民的进取精神。他带领徐州军民抗击洪水,住宿城头,亲临抗洪第一线,终于取得了抗洪的胜利,使徐州古城免于一次水患的灭顶之灾。他关心民生,岁旱祈雨雪,开掘煤炭等等。苏轼在积极有为的同时,还对现实政治人生多了几层深沉、复杂、矛盾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期间对皇帝更表现出一种以道事君的态度。苏轼在为张方平所作的《乐全先生文集叙》中,阐述了孔子之“大臣以道事君”,为人臣人品以及士的人格定位。“虽对人主,必同而后言。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乐全先生文集叙》,徐州赴湖州途中作)。苏轼正是像他敬重的张方平一样严格要求自己,以道事君,行正大之言。苏轼所谓的道是“以天下之重自任”的大爱,将道融于文章,以文干政,面对权势与道德的选择时能“行正大之言”,做到有自己的原则,不左右摇摆而坚守立场。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2]2976}末尾言:“今臣于无事之时,屡以盗贼为言,其私忧过计,亦已甚矣。陛下纵能容之,必为议者所笑。使天下无事而臣获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图之,则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短短四句话,苏轼都是诚惶诚恐进言皇帝,宁愿因夸大其实获罪也要言明实情。在自身处境与社稷天下的安危之间,苏轼以一种舍生取义的精神阐明心中之“道”。正是他对“道”的坚守,使他能不媚君,不趋炎附势,敢于对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大胆批评,指责弊端,以文干政。他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的“乌台诗案”差点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苏轼在徐州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为文有所收敛但还是被新党所诟病,其深层原因应该是他在密州、徐州两地的勤政爱民、积极有为、深得民心的政绩引起了新党的警惕和不安。

二、“吾生如寄”,“寓意”审美

“吾生如寄”的思想是苏轼在徐州的诗作中首次明确提出,并在以后诗文中多次出现。此作为苏轼的一个重要思想和人生态度,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编》中有言:“苏文

忠公诗文,少重复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数处用。”^{[3]1835}在苏轼看来,生命的本质在于“寄寓”,即由于生命的有限性,人的肉体 and 性情不能长居,只能是短暂的“寄寓”。苏轼“吾生如寄”思想的提出可以说完成了从青年感喟到中年忧患与超越之人生思考的重要蜕变。苏轼青年时随父兄出川赴京途中所作的一系列诗文,就能表现出他对世事、功名、富贵、人生的思考。苏轼诗集开篇《郭纶》^{[1]1}云:“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此诗作于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轼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初次出川赴京应考,途经嘉州(今四川乐山市)时作。此时苏轼还未入仕途竟然能够发出英雄失路的感叹,表露出浓重的人生悲凉气息。《屈原塔》^{[1]41}云:“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在对屈原的吊念中反思人生。“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用”(《南行集叙》^[2])可见苏轼的秉性中就带有一种忧生之嗟的意识,这种意识在他外任密州及徐州期间都是一以贯之的,并逐渐在矛盾挣扎中把这种忧生之嗟转化为精神动力,通过一系列的审美范畴体现出来。承接苏轼在密州《超然台记》“游于物外”之超然,“吾生如寄”、“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思想在这一时期更加成熟,内容也更加丰富。

“超然台”的命名苏辙在其《超然台赋》中作了交代,“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3]331}苏轼作《超然台记》^{[4]1104}阐发了自己对超然的理解,超然就是“游于物外”,“无所往而不乐”。然而苏轼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终究只是在现实中,苏轼登超然台四望,感怀超然物外的隐士、建功立业的功臣、不得善终的良将,实际上超然并不等于完全洒脱,其中饱含遗憾、期望、辛酸和矛盾,所以说超然也只是一种审美理想。尤其是对王安石新法批判的执着,更说明苏轼是不能脱离现实政治成为单纯游山玩水的诗人,“超然”思想只是对现实忧患的一种审美超越。

苏轼在徐州“吾生如寄”与“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并举,承密州之超然,矛盾中力求超越的精神与儒家入世的精神表现更为突出。苏轼从自请外任到杭、密期间政绩卓然,杭州通判到密州知州官职上也是有所升迁。然而被拒入京门的打击是他人生经历了自外任以来最大的政治打击,也正因为此,苏轼在徐州的整个精神面貌与密州时期相比

是有微妙变化的。比之密州，苏轼在政治打击之下对“致君尧舜”的理想更加表现为以“以道事君”自任。思想上“吾生如寄”矛盾的状态，兼有老庄和儒家的思想，表现出来的即是一种“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在矛盾中求超越自我的精神更突出。此时他不再是密州“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孤馆灯青》）的等待和“遣冯唐”（《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期待。苏轼在徐州一方面勤政爱民，针对徐州的具体实际情况奏报皇帝，体现了一种有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苏轼为了根治徐州边界时有盗贼出没扰民的现实，上皇帝书“愿复三年守徐”且保证“必有以自效”（《徐州上皇帝书》^{[2]2976}）。但是另一方面，苏轼又不时地流露出一些消极的情绪。如熙宁十年，苏轼在苏辙的陪同下到徐州不久，苏轼因公务繁忙不能陪兄弟，心里难过之时写下了《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其四）^{[1]1516}云：

君虽为我此迟留，别后凄凉我已忧。
不见便同千里远，退归终作十年游。
恨无扬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
闻道鹄鹑满台阁，网罗应不到沙鸥。

苏轼心生归去之意，认为朝廷不缺他兄弟二人效劳。这种情绪在苏辙写的《逍遥堂会宿二首》^[3]的诗前引言中得到印证：“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苏轼当年仅四十出头，正当壮年，以他的“奋厉有当世之志”抱负，有归去之意实是一种无奈和矛盾的心情。还有很多类似“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春菜》^{[1]1626}）的诗句将“归去”、“归计”作为期待。在书信《与眉守黎希声三首》（其二）^{[4]5858}中，表达更为直白，“某久去坟墓，贪禄忘家，念之辄面热，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择尔，何时复得一笑为乐”，流露出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种矛盾还体现在苏轼对徐州的感情上，苏轼在徐州一方面干了许多实事、善事，交了很多朋友，可以说对徐州充满了感情和激情。但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又竭力地想离开徐州，在他的书信往来中，至少八处反映了他的这种情绪。书信是一种极其私人化的写作品体，往往能更真实地流露作者的情感与态度。《与范子丰八首》两处“愿乞江浙一郡”，并希望范子丰托人帮忙；《答秦太虚七首》其一“尚

未知后任所在，意欲东南一郡尔”等等。

不过苏轼的精神在矛盾中始终有一个主旋律，那就是超然的审美精神。这一点，苏轼在密州的《超然台记》中将超然解释为“无所往而不乐”，“游于物之外”，显然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而在徐州提出的“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是在《超然台记》^{[2]1104}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注意到了“寓意”与“留意”的辩证关系，内在的逻辑性自成体系，可见苏轼这一超然思想的成熟。徐州时期的超然不仅是一种超然物外审美精神，而且是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审美态度。

《宝绘堂记》^{[4]1122}中“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所以作为君子应该忘掉利害得失，用“寓意于物”的眼光去看待万物，一定要超然于物外，保持一种超脱独立的精神。《宝绘堂记》充分表现了苏轼对待人生超然旷达的襟怀，这种豁然的心境在苏轼身上上升为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这一点在苏轼所写的《放鹤亭记》中反映的更为明显。放鹤亭坐落在徐州“冈岭怀抱”、“草木际天”的云龙山上，由放鹤人张天骥所建。苏轼的《放鹤亭记》^{[4]1136}不是写“亭”，也不是写“鹤”，而是赞扬放鹤亭的主人超然物外的生存状态和独立精神。特别是文章末尾的放鹤招鹤之歌，更是画龙点睛之笔：“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婉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里把招鹤归来之实与人的归隐融为一体，堪称妙绝。对于这篇文章的主旨，一般认为抒发了作者思归欲隐的情怀。其实苏轼羡慕张山人豁达的心胸和不羁的精神，同时他也清醒地明白像卫懿公那样忽略自己身份和职责沉迷个人兴趣是有害的，所以他是不会归隐的，只是心向往之。所以说苏轼是极向往自由却也是极其理性的典范，是其超然精神的具体实践。此超然不同于庄子之全无挂碍的逍遥游，辩证之中体现的精神意蕴更具有现实意义。

苏轼在《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5]194}中云：“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

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表现了一种人生仕途上进与退的矛盾，既想早日归隐山林又想建功立业。雅致本在林泉修养心性，以享兄弟亲友相从之乐。而现在功业未就，人生的社会责任还没有完全履行，因而不能去追求个人的享受。可见在苏轼的思想中儒家思想还是占据了主要地位。苏轼的牢骚、埋怨和无奈终是消融在建功立业的志向中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苏轼情感上的脆弱与政治作为的果敢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张力，更显出苏轼平凡中的不平凡之处。

苏轼在徐州写了六篇祭文，祭文颇能反映苏轼对生死的看法。身边亲友的离世使苏轼悲痛不已，近距离审视生死问题。文与可与苏轼志趣相投，又是姻亲的关系，过往甚密。文与可去世时，苏轼在徐州任，写下了《祭文与可文》^{[4]6984}，“念有生之归尽，虽百年其必至。惟有文为不朽，与有子为不死。虽富贵寿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意思是说即使再长寿的人也终有一死。只要托于文章才能不朽，只要有后代儿孙就可代代相传。一方面，将人的价值与是否富贵长寿分割开来，不追求所谓的富贵寿考。“惟有文为不朽”就是指人的思想、精神蕴含在文章中流传下来，即为不朽，暗含儒家提倡立德、立功、立言来实现生命不朽的传统价值观。这样将死的忧伤化为对生命的珍惜，从消极转化为积极的建功立业。

总之，苏轼的这种超然精神终究是不能脱离现实的人生体验的，是带有人情味的，不是玄幻缥缈的。因为现实中真正的“忘我”“无我”境界是不存在的。但是苏轼从生活中的矛盾趋于审美活动的超然，这其中努力本身就是一种超然。

苏轼在徐州任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约321篇诗文，是他外任期间的一个丰收期，他的天赋和才气也于此可见一斑。苏轼徐州诗文表现出的精神意蕴承接密州时期，影响黄州及以后时期。苏轼在徐州提出了“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审美精神，与外物保持恰当距离，关注到现实而又不因现实的打击而颓废。可以说是苏轼徐州精神意蕴的一条主线。正是他“寓意”精神在徐州能务实地做一些实事，与密州时期的政治激情、浪漫情思有所不同，诗文内容也以政治现实为主，或言与民同苦乐，或发表对现实的言论，始终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不留意”的审美精神是他密州超然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不留意”以“寓意”为前提，

既有高风绝尘的追求，也有勤政爱民、以道事君的政治实践，辩证地处理好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当然苏轼心理上的矛盾在徐州时期的诗文中也十分突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在“吾生如寄”这一复杂思想上，对个体人生的思考引发的忧生之嗟，复杂政治现实下“致君尧舜”的理想与唯恐老之将至而无所作为之间的矛盾都直观地呈现在诗文中。这时期虽然在诗文表现上能从激愤张扬的情绪中有所收敛，但内心矛盾中挣扎的心理状态比密州时期更激烈、深沉，这也是苏轼徐州时期诗文的独特精神意蕴。苏轼密州时期形成的“超然”精神，进而在徐州时期形成的“寓意于物”审美超越的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也为他后来种种人生不如意积蓄了重要的精神超越力量。

注释

- [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东坡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2]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 [3]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 [4]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东坡全集校注》（文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5]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东坡全集校注》（词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李 贞，中国矿业大学文艺系教师、文学硕士；管仁福，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

“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

——从表、状、书、启看苏轼在密州的政治操守与人格操守

喻世华

内容提要 苏轼在密州留下的表、状、书、启，由于文艺性不强往往被研究者忽视，但比诗、词、文艺性散文更能反映作者的真实想法和实际作为，其核心是“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这种朴实无华的表白包含多方面含义：无愧于皇帝（国家、江山、社稷）、无愧于职责、无愧于百姓、无愧于自己；反映了苏轼对国家、对职责、对苍生、对自己的负责精神，再现了苏轼在密州的政治操守与人格操守。这在当时、在今天、在今后都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苏轼 密州 苏轼的表、状、书、启 苏轼操守

苏轼在密州度过了整整两年知州生涯。关于苏轼在密州的情况，学界已经进行了非常充分的研究：李增坡主编的《苏轼在密州》对于苏轼在密州的方方面面情况作了系统的梳理^[1]；而查“中国知网”，在“主题”栏，输入“苏轼密州”共有12篇（条）论文；在“篇名”栏，输入“苏轼密州”共有10篇（条）论文；在“关键词”栏，输入“苏轼”“密州”共有87篇（条）论文^[2]。在这样一个已有众多研究成果的领域，想有新的发见实在很难，但通过分析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从苏轼在密州留下的诗、词、文以及文化遗迹角度展开分析，而专门从表、状、书、启等应用文角度分析苏轼在密州的政治操守与人格操守的文章还比较少见，因此不揣冒昧由此角度切入，或许能有一点新意。

一、苏轼在密州留下的表、状、书、启

表、状、书、启作为应用性文字，由于文艺性

不强往往被研究者忽视，但比诗、词、文艺性散文更能反映作者的真实想法和实际作为。苏轼在密州留下的代表性表、状、书、启等应用性文章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写给皇帝的表、状。这以写于熙宁七年十二月的《密州谢上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为代表。这类文章由于双方身份限制，不能完全排除虚应故事的成分，但其中也保留了部分历史真实。

二是写给上级的书、启。这以写于熙宁七年十二月的《密州到任谢执政启》《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以及写于熙宁八年十月的《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为代表。这类文章同样由于双方的身份限制，也不能完全排除虚应故事的成分，但其中史料价值相对更为真实、充分。

三是写给亲朋好友的信函。如与滕达道（《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二至六）、鲜于子骏（《与鲜于子骏三首》）、石幼安（《与石幼安二首》其二）、程彝仲（《与程彝仲六首》其一、二）、王庆源（《与王庆源十三首》其一、二）、文与可（《与文与可十一首》其一、二）等的书信，以及写于后来的《与朱鄂州书》等等。这类文章属于亲朋好友的私人通信，虚应故事成分相对较少，其真实性更值得重视。

四是苏轼在密州写下的为民请命的求雨祭文。如《祭常山祝文五首》、《祭常山神祝文》等，就今天的角度看，也许不尽科学并显得荒诞和虚妄，但在当时却是极为重要的仪式，从中可以窥见密州的严重灾情及苏轼的心情。

二、从表、状、书、启看苏轼治密的“未尝敢行所愧”

苏轼在密州留下的表、状、书、启等文章，可以真实还原苏轼在密州的各方面情况，比如苏轼的处境、操守。其中最能反映苏轼治密实际情况的，在《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一）》中苏轼自己概括得最为准确：“岁凶民贫，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3] 1559}这是理解苏轼在密州处境、操守的关键。“岁凶民贫，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概括了当时的治理环境——旱蝗相继的天灾、新法扰民的人祸、盗贼渐炽的隐患；而“未尝敢行所愧也”，则反映了苏轼的政治操守和人格操守，包含多方面含义：无愧于皇帝（国家、江山、社稷）、无愧于职责、无愧于百姓、无愧于自己。

（一）无愧于皇帝：对国家、江山、社稷负责

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意味着效忠皇帝实际上是士人的义务与责任。“忠、孝、节、义”也好，“三纲五常”也好，首先且必须的是对皇帝效忠。效忠皇帝，实际上也代表效忠国家、江山、社稷。苏轼治密“未尝敢行所愧”，首先也必然是无愧于皇帝（国家、江山、社稷），这从他给皇帝的《密州谢上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可以看出。

苏轼治密期间与神宗皇帝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力主推行新法的神宗皇帝对公然批评新法的苏轼无疑存在明显的成见，故而苏轼有“论不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3] 651}的自嘲，有“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4] 134-135}的故作超然。

但自嘲也好，超然也好，都只是表象。虽然明知“论不时”，但苏轼还是要向皇帝进言；虽然想“袖手何妨闲处看”“优游卒岁”，但早年“致君尧舜”的理想并没有泯灭，这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表露得特别明显。可以说，《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是苏轼治密时无愧于皇帝（国家、江山、社稷）的最真实记录。

面对“岁凶民贫”的严峻现实，苏轼始终关注国家的内忧外患，特别是关注河北京东盗贼这个现实而严峻的影响大局稳定的问题，苏轼熙宁七年十二月一到任就向皇帝提出了解决河北京东盗贼的治本和治标办法。

解决河北京东盗贼的治本之法，关键是改变检放灾伤办法、反对官营榷盐，给老百姓以生路，避免良民无以维生为盗。苏轼针对密州的特殊情况，

向皇帝提出改变“寻常检放灾伤”办法，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寻常检放灾伤，依法须是检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数。今来二麦元不曾种，即无根苗可检，官吏守法，无缘直放。若夏税一例不放，则人户必至逃移。寻常逃移，犹有逐熟去处，今数千里无麦，去将安往？但恐良民举为盗矣。且天上无雨，地下无麦，有眼者共见，有耳者共闻。决非欺罔朝廷，岂可坐观不放。”^{[3] 754}其目的很明确，只有解决老百姓基本生存问题，才能避免“良民为盗”，这种思想贯穿在反对官营榷盐上，苏轼针对神宗急于理财的思想，分析官营榷盐的利害得失：“臣勘会密州盐税，去年一年，比祖额增二万贯，却支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其余未获贼人尚多，以此较之，利害得失，断可见矣。”^{[3] 755}苏轼反对做与民争利、逼民为盗的劳民伤财、无益且无效的所谓改革：“旧时孤贫无业，惟务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稀少……今盐课浩大，告讦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3] 755}苏轼的分析是比较中肯的。

解决河北京东盗贼的治标之法则是反对“按问减等灾伤免死之人”：“勘会诸处盗贼，大半是按问减等灾伤免死之人，走还旧处，挟恨报讎，为害最甚。”苏轼认为应该坚持法治，避免“侥幸废刑”“灾伤挠法”，使“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于捕告”。

^{[3] 756-757}

苏轼治理河北京东盗贼的思路是明确的，一方面解决民生问题——消除滋生盗贼的土壤，另一方面信赏必罚、严明法纪：“臣所谓‘衣食之门一开，骨髓之恩皆遍，然后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者，为此也。”^{[3] 757}治本和治标结合，表现了苏轼能吏的风采，表现了对国家、江山、社稷的强烈责任感。

这种对国家、江山、社稷的责任感，还表现在对边患的担忧和关注：“安南代北骚然，愚智共忧，而吾徒独在闲处，虽知天幸，然忧愧深矣。”^{[3] 2441}熙宁九年在与文与可的通信中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国家大事“安南代北骚然”表现出深深的“忧愧”，因而才有“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4] 145}的落寞与感慨。

这种对国家、江山、社稷的责任感，还表现在

对当时的新法如常平法等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

“而近年以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今流离饥馑，议者不过欲散卖常平之粟，劝诱蓄积之家。盗贼纵横，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捕之法。皆未见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经赈发，所存无几矣，而饥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费丘山。蓄积之家，例皆困乏，贫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灾。”

[3] 754

从政治角度说，勇于暴露当时存在的问题的确“论不时”，苏轼最聪明的自保之法是少说为佳，但苏轼没有明哲保身，无论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还是职责范围外的事情勇于向皇帝进言：“越职献言，不敢自外，伏望圣慈察其区区之意，赦其狂僭之诛。”^{[3] 757}苏轼“越职献言”主要是为了“未尝敢行所愧”：“臣敢不仰酬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3] 651}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贯穿了苏轼一生。

（二）无愧于职责：恪尽职守的责任感

忠于职守是苏轼治密“未尝敢行所愧”的第二方面。这在《密州到任谢执政启》《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二至六）有充分的反映。

作为密州的地方官，面对“岁凶民贫”的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大致牵涉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解决燃眉之急——应付蝗旱相继的天灾。

当时密州的旱灾、蝗灾非常严重，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二）中对官吏处理蝗灾的颀颀、绳文多有揭露：“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果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3] 1396}“东武今岁蝗灾尤甚，而官吏多方绳以微文，蠲放绝少。自到任，不住有人户告诉，既非检覆之时，已奏乞体量减放，仍已申闻去讫，或更得明公一言，尤幸也。”^{[3] 1475}

苏轼治密抗旱灭蝗的情况在他的诗歌中多有反映，如“遗蝗入地应千尺”（《雪后书北台壁二首》^{[5] 605}）、“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县前已窖八千斛，（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余斛。）率以一升完一亩”（《次韵章传道喜雨》^{[5] 623}）、“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屹。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5] 685}）等，其中取得的

成果及付出的辛劳多有反映。

二是“因法以便民”——对付新法扰民的人祸。新法当时已经成为基本国策，反对新法无异以卵击石，对此苏轼是清楚的，在《密州到任谢执政启》有过明确表述：“如轼者，天与愚忠，家传朴学。议论止于污俗，交游谓之陈人……虽仅脱网罗之患，然卒无毫发之称……虽无望于功名，庶少逃于罪戾。”^{[3] 1327-1328}虽然如此，苏轼对扰民的新法还是进行了抵制和批评，特别是对榷盐法的与民争利以及手实法的败坏民风进行了抵制和批评。

榷盐法的实质是改民营为国营，不但与民争利，造成官民矛盾，而且效率极低，逼民造反。苏轼在上皇帝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从财政、社会成本对榷盐法进行了认真分析，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进一步用亲身经历分析其危害：“轼在钱塘，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自到京东，见官不卖盐，狱中无盐囚，道上无迁乡配流之民，私窃喜幸。近者复得漕檄，令相度所谓王伯瑜者欲变京东、河北盐法置市易盐务利害，不觉慨然太息也。”^{[3] 1397}熙宁八年十月，苏轼在《上文侍中论榷盐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今东北循海皆盐也，其欲笼而取之，正与淮南、两浙无异。轼在余杭时，见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奸民以兵仗护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数百人为辈，特不为他盗，故上下通知，而不以闻耳。东北之人，悍于淮、浙远甚，平居椎剽之奸，常甲于他路，一旦榷盐，则其祸未易以一二数也。由此观之，祖宗以来，独不榷河北盐者，正事之适宜耳。何名为误哉！……以有限之钱，买无穷之盐，灶户有朝夕薪米之忧，而官钱在期月之后，则其利必归于私贩无疑……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况民财两失者乎？”^{[3] 1400-1401}

手实法是由吕惠卿主导的新法，《宋史·食货志上》载：“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随价自占。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据此以确定役钱。这本来也算是所谓改革，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流弊横生：百姓自报财产以定户等，这为政策实施留下了漏洞；而为防止有人少报而奖赏告发，这样悬赏奖励告密者必然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苏轼为此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极力反对：“今又行手实之法……然大抵恃告讦耳。昔之为天下者，恶告讦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

者，十常八九。夫告讦之人，未有非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3] 1396}苏轼的分析切中要害，“未几，朝廷亦知手实之害，罢之。密人私以为幸。”^{[6] 栾城后集卷二十}

对方田均税法，苏轼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批评其“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3] 1396}的急于求成。苏轼对于新法的态度，在《寄刘孝叔》中有形象的全面表露：“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诏书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平生学问止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5] 634-635}对保甲法、方田均税法、手实法提出全面批评。

如果就此认为苏轼是为反对新法而反对新法，那是误解了苏轼。苏轼对于免役法的态度就耐人寻味。熙宁七年十二月《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对于免役法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凡为此者，欲以均出役钱耳。免役之法，其经久利病，轼所不敢言也。”^{[3] 1396}但在元丰八年十二月《论给田募役状》中，则反对废除给田募役法：“臣伏见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如退摊户绝没纳之类。及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臣闻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它用，故更相驳难，遂不果行。臣谓此法行之，盖有五利……独有二弊……而先帝之法，决不可废。”^{[3] 768-769}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反对新法，主要是从对职责和对民众负责角度考虑：“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6] 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保守与改革的两分法思维定式，寻找到新的答案。

三是维持社会稳定——应付盗贼渐炽的隐患与现实。保一方平安，维护社会稳定，既是古代也是现代地方大员的首要任务。密州当时的治安情况相当糟糕，苏轼一到任就向皇帝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提出了治标治本的办法，熙宁八年十月《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反对削减缉捕强盗的赏钱：“自轼至此，明立购赏，随获随给，人用竞劝，盗亦敛迹。”^{[3] 1398}在与表弟石幼安的书信中也曾不无自得地说：“凶岁之余，流殍盗贼无虚日，凡百劳心。近颇肃静，吏民稍见信，渐向无事，幸不忧及。”^{[3] 2453}密州的治安情况明显好转。

综上，尽管在密州的治理环境中面临诸多挑战——“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但苏轼不尸位素餐，在其位谋其政，尽忠职守，显示了能吏的风采。

（三）无愧于百姓：对苍生负责

无愧于百姓是苏轼治密“未尝敢行所愧”的第三方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面对“岁凶民贫”的现实，苏轼治密时特别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反对败坏民风民俗，尽显对苍生负责的仁者情怀。这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中有集中披露：“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5] 646-647}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灭蝗祈雨。从“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看，苏轼为灭蝗付出了大量心血。至于祈雨，在现代人看来多少显得虚妄和无奈——“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但透过苏轼的祈祷文字，我们能够切实感受到苏轼的殷殷爱民之心。这在《祭常山祝文五首》中有淋漓尽致的反映：“凡吏之可以请于朝者，既不敢不尽；则神之可以谒于帝者，宜无所不为。”^{[3] 1917}“饥羸之民，将转于沟壑，其可不救之。渎神之罚，吏其敢辞。”^{[3] 1918}在《祭常山神祝文》中亦更有虔诚的许愿：“我州之民，比岁饥殍凋残之余，不复堪命。若又不熟，则流离之祸，其莫知所止矣。神之聪明，其忍以吏不称职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欤？今夏麦垂登，而秋谷将槁，若时赐霈泽，驱攘虫灾，以完我西成之资，岁秋九月，当与吏民复走庙下。”^{[3] 1932-1933}

二是保一方平安，安定社会秩序。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消除产生盗贼的土壤，如向皇帝提议免税放盐，“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目的是使“小民不致大段失所”^{[3] 755}，向宰相韩绛、侍中文彦博、知青州滕元发如实反映灾区情况，争取对抗旱灭蝗的支持；另一方面，坚决清除匪患，“磨刀入谷追穷寇”形象再现了苏轼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作的努力。保持社会安定，正是对苍生负责的表现。

三是建立慈善机构，收养弃婴。“洒涕循城拾弃孩”形象再现了苏轼收养弃婴的情况，与《与朱鄂州书》中对此有更全面的追忆：“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十人。”^{[3] 1416}这种仁者情怀千载之后还让人们动容。

四是坚决反对败坏民风民俗的手实法。前已

论述，不赘言。

（四）无愧于自己：苦闷中的超越

无愧于自己是苏轼治密“未尝敢行所愧”的第四方面。笔者曾在《苦闷与超然——论苏轼在密州的处境、心态与选择》中对苏轼在密州的处境、心态与选择做过较为深入的分析。总括起来说，苏轼无愧于自己表现在“大我”和“超我”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大我”上——不以个人进退介怀，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笔者在分析苏轼密州的政治处境时认为，“新党的排挤，皇帝的猜疑、不信任，使苏轼在政治上看不到曙光”^[7]，但苏轼并不因个人的政治境遇而消极怠工、明哲保身，不但恪尽职守，而且劝文彦博尽心国事：“轼一郡守也，犹以为职之所当忧，而冒闻于左右，明公其得已乎？”^{[3]1402}苏轼明知“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

其次表现在“超我”上——将个人的苦闷升华为超越、超然的情怀。“苏轼在密州的处境是困难的，心态是苦闷的，苏轼把‘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转化为创作和工作的动力，通过创作的白日梦和忘我投入工作既舒缓了内心的紧张和无奈，也成就了苏轼的文学以及能吏的名声，实现了苦闷中的超越与超然。”^[7]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做出的不朽贡献和在实际工作中留下的不朽业绩，人们多有论述，不赘言。

综上所述，苏轼在密州留下的表、状、书、启，真实再现了苏轼在密州的处境、操守与作为，其核心是“在己者未尝敢行所愧也”。这质朴的语言反映了苏轼对皇帝（国家、江山、社稷）、职责、百姓、自己的负责精神。这在当时、在今天、在今后都具有启示意义。

注释

[1] 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2] 中国知网. 苏轼密州 [DB/OL]. 2013-08-06 <http://acad.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3]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5]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 苏辙：《栟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 喻世华：《苦闷与超然——论苏轼在密州的处境、心态与选择》，《乐山师范学院学报》（乐山）2012年第8期。

（喻世华，江苏科技大学副教授、副编审，《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书名：重编三苏《南行集》

编注：张忠全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年10月第1版

开本：大32开

页数：315页

定价：48元

苏轼心目中的桃花源

刘继增 萧根胜 刘彩萍

内容提要 苏轼《后杞菊赋》中的“南阳之寿”典出何处、苏轼心目中的“南阳郦县甘谷”、“南阳郦县甘谷”究竟在哪里，以亚文化为视域，运用历史地理学、古典文献学、三苏文献学、地方文献学的学科方法作探究和梳理，提出了“南阳之寿”的典故发生地是苏轼心目中的桃花源这一见解。

关键词 苏轼 后杞菊赋 南阳之寿 考辨

《后杞菊赋》是苏轼熙宁八年（1075）秋作于密州任上的传世名篇。文末有云：“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现就“南阳之寿”究竟典出何处、苏轼对“南阳之寿”如何评价、“南阳之寿”在今河南南阳何处，试考辨之，以就教于方家。

一、“南阳之寿”究竟典出何处

苏轼文中“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中的“南阳之寿”典出何处？学界对此形成两说，一是典出东晋葛洪《抱朴子》。阎旭生在《南都学坛》1990年第2期发表《典故：南阳之寿》认为：“南阳之寿”原出东晋葛洪《抱朴子·仙药》：“南阳郦县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菊花。菊花堕水中，历时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无不老寿，高者百四五十，下者亦不下八九十，无夭年人。”

^[1]¹⁰⁷⁻¹⁰⁸ 张志烈、周裕锴附之^[2]²³⁸；蒋宗许在《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发表《“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考辨》，认为“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中的“‘南阳’引《抱朴子》没错”，^[3]¹⁰⁵ 金诤再附之。^[4]¹⁷二是典出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牛宝彤在《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中云：“‘南阳之寿’典出唐代欧

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一。”^[5]¹¹⁵³

查文渊阁四库全书，却发现一个“众书共指”的现象：

《风俗通》曰：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有大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余，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天。菊华轻身益气，故也。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尉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痹，皆得瘳。——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一^[6]

应劭《风俗通》曰：南阳郦县有甘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余，下七、八十者名大天。菊花轻身益气，令人坚疆故也。——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七^[7]

《风俗通》曰：南阳郦县有甘谷，谷中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余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年，中百余下，七十、八十名之为天。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三十斛，用饮食澡浴终，然无益。——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六百卉^[8]

《风俗通》曰：南阳郦县有甘泉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菊花。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余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者一百二十，中者百余岁。——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十四谷^[8]

应劭《风俗通》曰：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

上寿百二、三十，中百余，下七、八十者。考之本草：菊花轻身益气故也。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尉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酃县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痹，皆得愈。——宋史铸《百菊集谱》卷三^[9]

南阳郡酃县有甘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落，水从山下流，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年亦七、八十（应劭《风俗通》）。——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九^[10]

菊水滋液：南阳酃县有甘谷，谷中水甘美。其上有大菊，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二十余家仰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其中百余岁，七十、八十则谓之夭（《风俗通》）。——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三十九^[11]

甘谷菊水，南阳酃县有甘谷，水甘美。其山上有大菊落水，从山下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其中，年七十、八十者为夭，菊花轻身益气令人坚强故也（出应劭《风俗通》）。——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八^[12]

依据四库文渊阁本所收以上七种唐、宋典籍，似可梳理出以下几点初步结论：

1. “南阳之寿”应典出《风俗通义》。《艺文类聚》卷八十一在引文中注明源于《风俗通》，“典出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说与“典出《风俗通义》”说，应视为为同义；七种典籍虽所引文字有异，且长短不一，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源自《风俗通》；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二·仙药的“南阳酃县甘谷”条显然为后出，乃袭用东汉《风俗通义》“南阳酃县甘谷”之文^{[13]598}。

2. 《风俗通义》和《风俗通》实乃同一书。《风俗通义》之称《风俗通》，《四库提要》云：“不知何以删去‘义’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通义》之称《白虎通》，史家因之欤”。

3. 史上发现“南阳酃县甘谷”第一人——当是东汉应劭。应劭（约153~196年），字仲远，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劭少年时专心好学，博览多闻。灵帝时（168~188年）被举为孝廉。中平六年（189）至兴平元年（194）任泰山郡太守，后依袁绍，卒于邳。有《汉官仪》、《风俗通义》传世。《后汉书》卷九十八有传。

二、苏轼对“南阳之寿”的评说

继《后祀菊赋》之后，苏轼在《和陶桃花源并引》中，对南阳酃县甘谷做出如此评价：“桃源盖此比也欤！”它即是苏轼心目中的桃花源。文曰：

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14]2196}

“桃源盖此比也欤！”苏轼一反唐人桃花源是神仙居住的世界的陈见，提出“南阳之寿”典故的发生地——“南阳酃县甘谷”是长期饮用菊水的寿者居住的太平世界，它是苏轼心目中的桃花源。这在中原地域文化史上堪称一件振聋发聩的大事。

《和陶桃花源并引》文末有云：“录所作赠卓契顺并跋：绍圣三年，岁在丙子，清和月，眉山苏轼录于惠州白鹤峰所居思无邪斋，以遗卓契顺。”^{[14]2561}可见苏轼对南阳酃县甘谷做出如此评价时间在绍圣三年，地点在惠州。

绍圣元年（1094）四月十一日，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以左朝奉郎知英州（《宋大诏令集》卷二百六《苏轼落职降官知英州制》^[14]）；十三日，复降左承议郎，仍知英州（长编拾补卷九本日记事）；闰四月三日，罢定州任，责知英州^{[14]714}；六月初五，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15]774}（《宋大诏令集》卷二百六《苏轼散官惠州安置制》）。

宁远军治所在容州，辖普宁、陆川、北流三县。在宋代，节度使是正任武官的最高官阶，为正三品或从二品。他的“恩数与执政同”，即等级、封号、待遇与宰相同样。因为是荣衔，所以《宋史》说：“不轻授。”节度副使是散官，是十等散官中之最高，为从八品。如果是贬降官，只给半薪。苏轼被“安置”于惠州。“苏轼惠州白鹤峰所居”，张友仁《惠州西湖志》：“白鹤峰在归善县治后（今惠州市桥东，市卫生学校内），高五丈，周一里。”^{[16]29}“东坡故居，在白鹤峰上，苏轼谪惠卜居于此。有思无邪斋、娱江亭、悠然亭，及珠池墨沼，又有东坡井。”^[17]

苏轼惠州白鹤峰所居之处有小圃，植有甘菊、枸杞，有《小圃五咏》中有咏甘菊、枸杞的诗各一

首。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七十四灵散飞方：“君曰：服此药者，可以不老。十日服之，三年不食。服之五年，可寿二千六百二十四岁。傳非一人皆得真道，保成神仙。”^{[18]462}

《云笈七签》卷七十四枸杞煎丸：“枸杞根三十斤，取皮别著，九蒸九曝，捣粉。取根骨煎之，水可三石，后并煎之如稀饧。即入前粉和丸，如梧桐子大。服之一剂，寿加百年。”^{[18]461}《云笈七签》是择要辑录《大宋天宫宝藏》内容的一部大型道教类书。北宋天禧三年（1019），当时任著作佐郎的张君房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后，又择其精要万余条，于天圣三年至七年（1025~1029）间辑成本书进献仁宗皇帝。由此可证苏轼提出其心目中的桃花源，以及对《后祀菊赋》中杞、菊认识和深化立论的思想基础。

三、“南阳之寿”究竟在今河南南阳何处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的“南阳酃县有甘谷”，苏轼《和陶桃花源并引》的“旧说南阳有菊水”。酃县、菊水这两个历史地理实体的方位，本不应成为学术问题，由于各种文献记载的紊乱，当应加以澄清之。

酃县在何处？汉代南阳郡有南酃、北酃两县。龚胜生先生曾作了专门考证：秦及西汉所设酃县在洧水支流潁水南，为“北酃”。《水经·洧水注》云：“洧水导源，东流经酃县故城北。郭仲产曰酃县故城在支离山东南，酃，旧县也。三仓曰樊、邓、酃。酃有二城，北酃也，汉祖入关下浙、酃即此县也。”东汉所设酃国在湍水支流菊水南八里（见《续汉书·郡国志》注《水经·湍水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为“南酃”，故《水经·湍水注》当如朱本作湍水“东南流经南酃县故城东”。另外，汉祖入关为西汉初年之事，所下酃县为“北酃”，《水经·湍水注》所述是正确的，“南酃”之设在东汉，《水经·湍水注》所云“《史记》所谓下酃析也”是错误的。^{[19]84}据《河南通志》卷五十二载：“酃县城：在内乡县东，汉县，属南阳郡，晋因之。隋改菊潭县，今有南酃、北酃二城。”^[20]

菊水在何处？“菊水，在内乡县西北五十里，亦名菊潭，隋以此名县”^[21]。菊潭故城，在内乡县西北，唐开元二十四年析新城置，初属邓州。《括地志》云：菊潭城在新城县北四十里。《元和志》：

菊潭县东南至邓州一百五十里。按师古云：菊潭即酃县，此谓隋之菊潭也。唐菊潭本武陶戍之地，开元间分临湍三千户置，非酃县故城也，其故址在今内乡县北六十里菊潭保，五代、周省入^[21]。

查康熙《内乡县志》卷一：菊潭，一名菊水，在县西北五十里。北魏酃道元《水经注》云：“菊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盖溪涧之异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涧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长年。”内乡“八景”之首即“菊潭秋月”。^[22]

《辞源》：“酃县，古地名，楚酃邑，秦置。北魏分置南酃、北酃二县，此为南酃，亦称下酃。北周复合为一县，隋改为菊潭县，五代周省，在今河南省内乡县东北。”又据《辞源》“菊潭”说：“地名，汉酃县，县西北有鞠水、亦称菊潭，其水甘芳，隋开皇初更名菊潭，在今河南省内乡一县北。唐徙置今内乡县西北，五代周省。”

至此，似可确定“南阳之寿”典故发生地为内乡县。阎旭生在《南都学坛》1990年第2期发表《典故：南阳之寿》认为：“内乡今属南阳市辖，古属南阳郡、南阳府。说‘南阳之寿’而不云‘酃县之寿’、‘菊潭之寿’，是以显代微、以大代小，修辞上谓之借代。”龚胜生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3期上发表《中国古代长寿点区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背景的初步研究》云：内乡县菊潭村在南阳盆地西北菊水河畔。菊河是湍水的一条支流，以河流两岸盛产甘菊而得名。这里是一个长寿点，隋唐时期曾在这里设置了菊潭县。汉代时这里30多户居民直接饮用菊河水而获得长寿，高寿可达120~130岁，中寿可达100余岁，70~80岁去世还被认为夭折，南阳城里许多官吏饮用此水不仅治好了风眩等病，而且也获得了长寿。一直到明代这里的菊花还是朝廷贡品。无疑，菊潭村成为长寿点与菊花滋润过的菊水有直接关系，《神农本草经》说菊花具有“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的保健作用，所以菊花（*Chrysanthemum morifolium*）又名“博延年”。《证类本草》则说“菊花水甘温无毒，除风补衰，久服不老，令人好颜色”。^{[23]227-251}

其实，早在1949年12月，南阳辖县区划变动，将内乡划为内乡、西峡两县。原属内乡管辖的酃县故城遗址、菊潭，成为西峡县一部分，酃县故城遗址和菊潭位于今西峡县南之丹水镇。^{[24]30}

《南阳日报》记者时卫红2007年10月踏勘

菊潭后有文云：丹水镇位于西峡县城东南 25 公里，内乡县城西北 25 公里，西南与淅川县接壤，是内、西、淅三县交接的中心。“距丹水镇 1.5 公里的菊花山（石涧山今名）。这是一座海拔仅 318 米的小山，山体虽小，却极其精致玲珑。山体西南，青山连绵，云遮雾绕，呈现出北方山水雄浑大气的自然风格；山的北面则是悬崖断壁，山脚下的丹水河波光粼粼，逶迤缠绕，恰似南方山水般秀丽可人。丹水古镇建于菊花山北麓脚下，有丹水河自西向东沿镇北拐向南流，镇以河名。丹水河出丹水镇后，自北向南直冲菊花山北底，依照山势，急转 90 度向东流去。水澜波撞，久而久之，在菊花山下冲成一个大水潭，潭深而水清，这就是古人所称的菊潭。”“不管在菊花山上俯瞰，还是临潭平观，都能看到‘鱼儿在树上游，鸟儿在水中飞’的倒映奇观。尤其是每年的农历八、九、十月份，菊花山上，漫山金菊环抱一池秋水，菊香潭碧，鸟鸣鱼欢，飞泉流瀑，相映成趣，交织成一幅令人神往的山水画卷。”“菊花村有 600 多人常年饮用菊潭泉水，该村目前有 60 岁以上老人 70 人，70 岁以上老人 37 人，80 岁以上老人 13 人，90 岁以上老人 2 人，长寿老人的数量明显多于周边其他村。”“站在菊花山北侧，记者看到，如今的菊潭虽然已没有当年诗文中所描绘的风采，但潭形犹在，潭水尚有。潭水、丹水、菊花交相辉映，美景雏形凸现。迎着习习山风，闻着悠悠菊香，我们对菊潭的前景充满了希望”。^[25]

注释

- [1] 阎旭生：《南阳之寿》，《南都学坛》，1990 年第 2 期。
- [2] 李增坡、邹金祥主编：《苏轼在密州》，济南：齐鲁书社，1995 年。
- [3] 蒋宗许：《“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考辨》，《文学遗产》，2006 年第 5 期。
- [4]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
- [5] 吕静飞、牛宝彤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年。
- [6]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 [7] 唐徐坚：《初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 [8] 宋李昉：《太平御览》（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 [9] 宋史铸：《百菊集谱》（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 [10]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 [11] 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 [12] 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 [13]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 [14]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 [15] 司仪祖点校：《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 [16] 张友仁、麦涛点校：《惠州西湖志》，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年。
- [17] 《惠州府志》（光绪版），惠州市史志办藏本。
- [18] 宋张君芳纂辑，蒋力生等校注：《云笈七签》，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年。
- [19] 龚胜生：《“南邳、北邳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 年第 2 期。
- [20] 《河南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 [21] 《大清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 [22] 《内乡县志》（康熙版），内乡县史志办藏本。
- [23] 龚胜生：《中国古代长寿点区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背景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 年第 3 期。
- [24] 西峡县志编纂委员会：《西峡县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25] 时卫红、袁欣：《畅饮菊潭餐菊蕊，悠悠丹水唱新韵》，《南阳日报》，2007 年 10 月 26 日 B1 版。

（刘继增，郏县苏轼研究会副会长；萧根胜，郏县苏轼研究会会长）

苏东坡定州诗文的地域特色与爱民情怀

周新华

内容提要 苏东坡出知定州虽只有六、七个月的时间,却留下了多达百余篇的诗词文章。这些诗文创作既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又表现出热诚的爱民情怀,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苏东坡 定州诗文 地域特色 爱民情怀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近花甲的苏东坡以双学士衔出知边防重镇定州。从是年九月离京到任,至翌年闰四月罢黜离职,苏东坡驻足定州只有六、七个月的时间,但其诗、词、文章多达一百一十余篇,包括诗三十三首、词五首、赋一篇、文七十余篇(指广义之文,含表、奏议、尺牍等)。其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且不乏佳篇名作。统而观之,其诗文创作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表现出浓厚的燕赵情结,又有为民请命的热诚,表现出一以贯之的爱民情怀。

一、鲜明的地域特色,浓厚的燕赵情结

“燕南异事真堪纪”,这是东坡在《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1]2014}一诗中的由衷感叹。定州属于“燕南赵北,昔为百战之场;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谢监司礼启》^{[2]1337})。这里有“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雪浪石》^{[1]1998})之形胜;也有“蒸土为城铁作门”(《送将官梁左藏赴莫州》^{[1]846})之防守。有用于历代帝王祭祀北岳恒神之神的北岳庙(《乞降度牒修北岳庙状》),也有作为我国古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瓷窑厂。他夸赞“定州花瓷琢红玉”(《试院煎茶》^{[1]370}),认为定瓷光泽品相具佳,所谓“小甌短瓶良具足”(《寄榴合刷瓶与子由》

^{[1]2010}),可与“稚儿娇女共燔煨”。这里的松树,经风雪之吹打锻造,“其木理坚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其“凜然孤清”,实乃“北方之精”、“霜中之英”,尤其“北岳松膏”,食之可以健体养生(《偃松屏赞并引》^{[2]616}),有“药石”之功用。用这里的松枝酿酒,甜中微苦,口味独特,胜过玉液琼浆。饮用之后,可以“愈风扶衰”,益寿延年,“流芳不待龟巢叶,扫白聊烦鹤踏枝”(《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进》^{[1]2017}),还可以生出飘然欲仙的快感。即便只是“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中山松醪赋》^{[2]12})。东坡还于“中山后圃”发现了一块奇石。此石黑质白脉,中涵若隐若现的水纹,如蜀地著名画家“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雪浪斋铭并引》^{[2]574}),“激水其上”,似雪浪翻飞。苏轼赏爱不已,为其取名“雪浪石”,又派人从曲阳运来汉白玉石,琢成芙蓉盆以盛之,置斋名曰“雪浪斋”。为此,苏轼写下古、律两首《雪浪石》,并作《雪浪斋铭》铭于盆唇,还邀请苏辙、李之仪、秦观、张耒、晁补之、参寥子等和之,诚为文坛佳话。

定州的环境气候四季分明,与“春夏多雨,秋冬少霜雪,冬无苦寒,夏无酷暑”(《眉山县志》)的四川眉山,有极大的差别。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冲风振河朔,飞雾失太行。相逢不相识,下马须眉黄”(《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1]1992})。“边城岁暮多风雪”,“玉帐夜谈霜月苦,铁骑晓出冰河裂。断蓬飞叶卷黄沙,只有千林蒙松花”(《送曾仲锡通判如京师》^{[1]2011})。真是“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偃松屏赞》^{[2]616})。即便到了上元节,仍是“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上元夜》^{[1]2098})。待到春风

袭来,则又是另一番景象:“零露沾月蕊,温风散晴葩。春工了不睡,连夜开此花。”众春园中的多叶杏,“天质自清华”,色彩素淡,丽质天成,“自从此花开,玉肌洗尘沙。坐令游侠窟,化作温柔家”(《三月二十日多叶杏盛开》^{[1]2021})。初夏季节遇上晴天,“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临城道中作并引》^{[1]2024}),令人分外神清气爽。东坡笔下的太行山纵贯南北,绵延数百里,山势雄伟,奇峰竞峭,野花遍野,绮丽壮美。

如此津津乐道燕赵的地理风物,既反映出北方大地带给苏轼的新鲜与惊奇,也展现出他能够随处发现生活之美的情趣,以及很浓的燕赵情结。其父苏洵曾作《苏氏族谱》,认为“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即追宗赵郡栾城之苏味道为眉山苏氏之祖。胞弟苏辙自称“赵郡苏氏”,并称其文集为《栾城集》。苏轼更是始终不忘自己是“赵郡”人,并引以为荣。因此,他有时在诗歌题目中自称“赵郡苏某”,如《李伯时作老子新沐图遗道士蹇拱辰赵郡苏某见而赞之》;有时文后署名“赵郡苏某”,或“赵郡苏轼”,如《与僧隆贤二首(之一)》、《书鲜于子骏楚词后》、《油水颂》、《自书〈大方广元觉修多罗了义经〉》等文。在为结发爱妻王弗所作的墓志铭中,开篇即是:“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亡妻王氏墓志铭》^{[2]472})心情沉痛,笔调肃穆,行文极为庄重;在为乳母任采莲所作的墓志中,也郑重冠之“赵郡苏轼子瞻之乳母”(《乳母任氏墓志铭》^{[2]473}),以示真诚的尊重与缅怀。众所周知,苏轼平生很少写行状墓碑,却为王子立、宝月大师两位赵郡人撰写了碑铭。即便离任定州之后,仍然渴望“醉眠中山酒,梦结南柯姻”(《用前韵再和孙志举》^{[1]2440})。并书录在定州创作的《中山松醪赋》,呈送身为惠州提点刑狱的表兄程正辅。贬居惠州的上元夜,回想“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感慨“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上元夜》^{[1]2098}),在今昔对比中,流露出对“中山”生活的深情追怀。

可以说,燕赵雄奇壮丽的山川,历史悠久的胜迹,给苏东坡提供了诗歌创作的营养,而

他的诗歌又为这些山川胜迹增添了绮丽的光彩。

二、为民请命的热诚,爱民济世的情怀

出知定州时,苏轼已年近花甲、饱经忧患,深感“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东府雨中别子由》),但他仍以“忘身忧国之心”(《朝辞赴定州论事状》^{[2]1020})和“国恩未报敢不勤”(《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1]2015})的使命感,“勤恤民劳,密修边备”(《定州谢到任表》^{[2]704}),实实在在地为百姓谋福祉,兢兢业业地守境安民。

他大刀阔斧地整饬军纪,惩恶布新,“部勒战法,众皆畏服”(《宋史·苏轼传》)。看到士卒冻馁,能够“恤其有无,同其苦乐”,认为“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2]1022})他尽心组建、整顿民间武装组织“弓箭社”,动员各村寨的青壮年,“带弓而锄,佩剑而樵”,使“虏甚畏之”(《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2]1025})。他两上奏议,反复书函(《与孙知损运使书》、《与刘仲冯》等),关注保境防盗问题,以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他急民所急,想民所想,不断地为民请命、替民祈祷。当年河北诸路均遇灾荒,百姓陷入缺粮困境,苏轼一方面禁止苛捐杂税,免税五谷;一方面两次奏请朝廷减价出卖常平米赈济百姓。而且写了七篇祝文,祈祷天地神灵保佑风调雨顺,民无饥谨。经详加考察,苏轼认为传统赈济方式是“不问人户高下,愿与不愿借请,一例散贷”,而到纳还之时又出现“愚民心生侥幸,每有借贷,例不肯及时还纳,多是拖欠,指望倚阁放免”之现象,由此造成“既烦鞭撻追呼,使吏卒因缘为奸,毕竟又不免失陷官物”之双重弊端。对此苏轼提出“依条将常平斛斗依价出粜”之建议,认为可以使“境内百姓,人人受赐”(《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2]1034}),从而公私两便。又“访闻民间阙乏,少得见钱籴买,尚有饥困之人”,便于二月上《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2]1036},提出将仓中陈米贷与无钱买粮的百姓,让民户“候丰年以新还官”。既解决饥民之需,又使官府所

存陈损白米不致浪费，亦可谓公私两便。两封奏状语言平实，陈述详尽，尽显苏轼勤政爱民、务求实效之风范。

当发现在灾民救济中治下有官吏玩忽职守，使百姓遭难之事发生时，苏轼甚为愧疚，即令属官“速为根究”《与滕兴公三首》其三^[2]²⁴⁸²），查访原因。他愿意倾听人民的心声，了解人民的情感和意愿，经常微服出巡，访民疾苦。当得知“望都民”刘丑厮生活无着、孤独无依时，便收作小吏，以期培养成人；巡视城西北黑龙泉附近的村庄，看到当地农民插秧劳作十分辛苦，听到稻农们边劳动边哼小曲，便将曲辞记录下来，整理编写成悦耳动听的歌谣，教农民边插秧边习唱，以减轻劳作之苦。这些努力和一系列的举措，安定了局势，改善了民生，出现了“牛健民声喜”（《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1]²⁰¹²）的欢乐场面，也使苏轼获得了一种“实无负吏民”（《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的自慰与自豪。

苏轼的爱民思想不仅继承了先秦儒家仁者爱人、民为邦本的思想，又是他发自内心的自觉追求。他“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其二^[1]²⁷⁵）。步入仕途之后，更以真挚的悲悯之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提出了很多改善民生的建议。在历次地方官任上，也每每不顾个人得失为百姓请命。每遇灾荒，他就上书朝廷如实禀报灾情，请求免赋税，免“积欠”，赈济灾伤，并减价粜常平米，支散义仓积谷救济饥民。或者“多做膳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宋史·苏轼传》）。打开苏轼作品集，无数封为民请命的奏书，大量心系民生疾苦的诗文作品，无不昭示着伟大的良知和强烈的责任感，让人为之动情。

定州时期苏轼的爱民思想既是他济世情怀的进一步延展，又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因为，他“越来越表现出对官场政争的厌倦”，对退隐乡里的渴望，“为民请命已成为定州时期的苏轼留在仕途的唯一理由，除了那些亟待赈济的百姓”，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维系他的政治热情”^[3]⁴⁰⁵了。国是将变、家道不宁的背景，年近花甲、饱经忧患的经历，以及燕南赵北、出镇边帅的际遇，使他更深入地走向民间，更深切地

体验了人世冷暖与生活甘苦，与下层贫苦百姓建立了极深厚的感情。所以，他的仁爱之心与悲悯之情接近杜甫，其亲民爱民的思想与实践“是他发自内心灵魂的咏叹，是他生命本体的体现，因而这也正是他处处受到人民群众爱戴和敬仰的根本原因。”^[4]

苏东坡定州时期的诗文创作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甚至有评家认为这一时期苏轼没有创作出有影响的作品。事实上无论从情感内容还是情感的表达上，他的创作都体现出了新的变化。他对定州一带自然山川、人文景观的描写，集中体现了燕赵文化的精神风貌和地域特征，他惜民、爱民的人文情怀和人格风范，在百姓心目中竖起了永远不倒的丰碑。可以说，苏东坡出知定州时期的诗文创作，既展示出他思想、创作及命运的转折变化，又为燕赵文化精神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

注释

[1]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3]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朱靖华：《苏轼新论》，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

（周新华，保定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定州祷雨岳庙题名》及所阙人名试补

李占才

内容提要 顾炎武所著《顾氏求古录》中，有一篇《宋苏轼题名》的石刻记录，原文中用两个“□”代替的人名不知是谁。本文对其题写的背景、石刻的发现和所阙的人名，小做解释与试补。

关键词 《定州祷雨岳庙题名》 所阙人名 解释 试补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所著金石学著作《顾氏求古录》（上海埭叶山房藏版）中，有一篇《宋苏轼题名》的石刻记录，石刻文字内容是：“苏轼祷雨岳庙，同李之仪、李士龙、鄮长卿、孙敏行、□□、贾温之。”自顾氏之后，后世学人在编苏东坡文集时，大都收录了此文，只是有的题目改成了《定州祷雨岳庙题名》（如毛德富等主编《苏东坡全集·题跋》，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但顾氏原文中用两个“□”代替的人名却一直延续下来，不知所代何字。本文对该题名的题写背景、刻有该题名的石刻的发现、以及石刻中所阙人名小做解释与试补。

苏东坡祷雨题名背景

宋神宗初年，王安石推行变法，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主张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之争。苏东坡属于旧党，受到新党的排挤，并因此离开京师被贬谪地方长达九年。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同月，八岁的宋哲宗即位，因年幼暂由高太后临朝。高太后属于旧党，又特别赏识苏东坡，同年十二月便从地方把苏东坡调回朝廷，之后连连加官进爵，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至元祐八年（1093），苏东坡厄运来临。这一年先是爱妻王闰之逝世，紧接着保护神高太后亦逝世。一直亲近新党的宋哲宗开始亲自主政，做为旧党的苏东坡立即被冷落，新党也趁机排挤他。苏东坡知趣，赶紧主动要求外派到地方任职。这正中哲宗下怀，便乘机把他打发到了当时处于边地的定州。同年十月，已经五十八岁且半边手脚麻痹的苏东坡，怀着丧妻之痛，以及政治上的失意，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总管、定州知州的身份到了定州任所。

到任后，他针对定州官骄兵惰，政殆治散的现状，对州衙和驻军机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作为一州之首，苏东坡还把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疾苦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他通过视察发现，元祐八年（1093）年定州水灾严重，减产五成。过年后（1094），定州部分县便出现春荒，他赶紧上书皇帝用低价出售国库粮的办法救济灾民，后调查发现灾民根本无钱购买，又上书建议把已快损坏的军粮让富户担保借给饥民。救灾正在进行中，定州又遇到了严重春旱。

在那个时代，由于生产力、思想认识和科技知识水平的局限，一遇天灾，地方主官们除去申请皇帝救济，其他就是搞封建迷信，逢旱祷雨，遇雨祈晴。官民都以虔诚的态度，向他们心中的诸位神灵求救。求神禳灾是那时官员们的一个重要职责，苏东坡也不例外。苏东坡先是在定州城内各庙宇祈求神灵，然后为了保险，他决定祈求更重要的神灵，即到五十里外的曲阳县北岳庙进香祈祷。

北岳庙原名“北岳安天元圣庙”，简称“北岳庙”，是历代帝王祭祀北岳山神的场所。在

人们心中，北岳山神安天元圣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神灵，因为他掌管北方地面，定州就在它的管辖之内，自然求它管用。元祐九年（1094）四月初一日，苏东坡带领定州军、地主要班子成员，包括李之仪、孙敏行、李士龙、鄯长卿、贾温之等军地官员，很早出发来到北岳庙。苏东坡非常虔诚的向神灵献上了祭礼，然后宣读了事先写好的《北岳祈雨祝文》^{[1]1926}。

在祝文中，他写到了定州的旱情，以及他急迫的心情：“都城以北，燕蓟之南，既徂岁而不登，又历时而未雨。公私并竭，农末皆伤。麦将稿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盗不止。丰凶之决，近在浹辰；沟壑之忧，上贻当宁。”甚至还以为为了百姓他甘愿受责罚的态度说：“轼以短才，谬膺重寄。倘有罪以致旱，宁降罚于微躬。”可见虔诚至极。

祷雨仪式过后，按照当时风俗，苏东坡还应邀题名，当即写下了同来祷雨的定州军、地领导官员的名字。题名之后，便由当地官员或寺庙住持收下，然后刻石以记。苏东坡此次题名何时和在什么情况下做成石刻已不可考。

苏东坡题名石刻的发现

最早发现苏东坡这通石刻的人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早年因屡试不中，便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其主要精力转而用在了潜心研究史乘、志书、金石、文辞上面。后成为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由于政治上顾炎武坚持抗清复明，与满清始终处于一种不合作状态，导致他远离清朝官场，甚至居无定所。他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生辗转，颠沛流离，尝尽艰辛，足迹几遍天下。沿途考察风土人情、地理山川、金石碑刻，竟至“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亭林文集·与潘次耕书》）。

为了辅正经史，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他在搜集金石碑刻方面用力最著。周游期间，每见铭刻，必潜心研究，然后抄录。其抄录的原则是：“其高文大篇已见于方志者不录，碑刻之摹拓而传于世者不录，近代词人之所多有文

集者不录。在乎阐幽表微，备史乘之遗，存前古之制。”（《颜氏求古录·自序》）即不做重复劳动，这就具有了发现和补遗之功，其价值愈显珍贵。

他从南方出发来北方考察是顺治十四年（1657），期间朋友送给他二马二骡载书，并雇一从役步行跟随。一路上他上马看书，下马考察。先入京师，又至古北口，回昌平，再折而南行，奔直隶新乐县，原计划从新乐县径直向西经井陘去山西考察。可是他又突然改变计划转而再北返去了直隶曲阳县。他到达曲阳县时是康熙元年（1662）六月初。

他为何突然决定要到曲阳一趟？这与当时北岳祭祀地之变有关。明弘治中吏部尚书马文升疏请改祭北岳由曲阳移至浑源，他认为马文升的建议没有根据。但要反驳他的观点，需要实地看一看，所以他才决定亲自到曲阳做一番考察。到曲阳后，没想到他还有了另外的收获，发现这里有众多的碑刻。也就是这次行程中，他发现了宋、元、明三代史志典籍都不载的苏东坡《定州祷雨岳庙题名》石刻。

关于发现此石刻的事，在后来他所著《顾氏求古录》一书中有这样的注释：“右小石刻旧在岳庙，今移县治宾馆。”说明他是在曲阳宾馆内偶然看到了这块石刻，很有可能为此又走访了当地知情者或耆老，进而知道了这块石刻的移动情况，即原来是放置在岳庙内，后来才被搬到了宾馆。本来是在岳庙题的名，为何不让其置于岳庙，而搬到了宾馆？顾炎武书中没有说，看来他未能了解到原因。

而且从《顾氏求古录》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石刻做得很简陋。顾炎武在书中对碑刻分为了三类，即碑、石刻、小石刻。碑的形制一般比较正式，体量也大，都有碑首、碑身、碑座，有的碑座还做成龟趺形状。石刻就简单多了，仅是一块长方形的石条而已，无首无座。至于小石刻，就仅仅是一块不大的石头了。《定州祷雨岳庙题名》顾炎武在书中列入“小石刻”一类，说明这块石头很不起眼。

苏东坡是北宋文坛著名领袖，又是一州太守，为何当地官员或岳庙住持将这石刻做的这样小？这与苏东坡当时的政治变故有关——苏东坡于四月初一来曲阳祷雨并提名后，只过了

一个月，即被贬官离开了定州。苏轼已是朝廷的罪官，地方官或北岳庙住持，不会没有担心引祸的因素，临时随便找块不大的石头，草刻上，也在情理之中了。

顾炎武在写《顾氏求古录》时，凡是碑刻字迹剥泐或模糊不清无法辨认者，于缺字处或用小字注“缺”字，或根据所缺字数以“□”代替，缺损几字就标出几个“□”形符号。为的是“阙文泐字，空格跳行，皆以原碑为准，勾心斗角，毫发无遗”。《定州祷雨岳庙题名》至清初时，虽然石刻还在，无奈已经过去近600年，因风化导致有两字无法辨认，只有用两个“□”代替了。

题名中的阙字是谁

苏东坡此次去曲阳祷雨，所去之人大都是定州军、地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显然这是为了体现对神灵的重视。题名中提到的李之仪是定州签判，该职负责州衙诸案文移事务、签书公事、掌机宜文字，相当现在的政府秘书长；孙敏行是定州掌书记，管朝觐、慰荐、祈祝、祭祀的文字及组织事宜，相当现在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李士龙是军职防御使，管作战；郦长卿是团练使，管训练和民兵；贾温之是走马承受，为军队的监军。

那么用“□□”代替的人名是谁呢？查《定县志·职官表》，宋哲宗朝定州军、地领导班子内两字人名者有云翼指挥使孙贵、学正吕通、司马李夔、供事官石异。其中孙贵因犯勒索罪已在苏东坡到定州后将其法办（《乞降度牒定州禁军营房状》）。吕通是否苏东坡在时任职不明，即使有此人亦应因是教育职责及级别原因不会让他外出参加祷雨。司马李夔为唐朝时人，应为志书误记（《郑子春祀北岳文》）。石异职务亦非“供事官”，准确职务名称应为“准备勾当供奉官”（《乞降度牒定州禁军营房状》），此为军队后勤财务职，级别也偏低，亦不会随苏东坡外出。

《定县志·职官表》所记人名并不完全。例如，苏东坡在定州期间的班子内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没有入表，此人就是定州路“安抚司管勾”刘焘。苏东坡在自己的诗文中称他为“抚

勾”，即“安抚司管勾”的简称。从此人的来历、职务和他与苏东坡的关系来看，《定州祷雨岳庙题名》中所缺的两字人名有极大可能就是他。

刘焘，字无言，浙江长兴人（一说吴兴）。少有才，哲宗元祐初十七岁入太学，有“俊杰才”之声。元祐三年（1088）三月，苏东坡主持当年会试，发现考生中有一名叫刘焘的学生，看过他的试卷，苏东坡大为赏识。《嘉泰吴兴志》载：“东坡知元祐三年举，读其文，曰：‘必岩谷间苦学者。’中第三人，廷对又中甲科。”可见苏东坡对他有提携之恩，二人亦形成师徒之谊。

苏东坡被下派定州时，刘焘正在瀛洲（今河北河间）为知州曾布幕客。曾布原任翰林学士、户部尚书，因支持变法，高太后和司马光将其以龙图阁学士下派瀛洲任知州。他虽然与苏东坡在政治上不是一派，但二人私交很好。苏东坡出发前要带些“自己人”到定州，其中就想到了刘焘。老师邀请，刘焘必然欣然前往，这其中曾布也一定给与了慷慨支持。

此时刘焘还很年轻，大约也就是二十多岁。来到定州，苏东坡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安抚使司管勾。此职相当军队办公厅的负责人兼秘书，成为苏东坡的重要助手，且时刻跟随。由于刘焘属于晚辈，又是自己的门生，苏东坡大可放心使用。刘焘也必是跑前跑后，尽心尽力。二人虽然年龄相差不小，但都是文人，很有共同语言，常有诗词往来。

比如有一次，刘焘老家的人从江南捎来了一些蜜渍荔枝到定州，刘焘赶紧给苏东坡送去一些，还附上了一首诗。苏东坡收下荔枝和诗，当即和了一首《次韵刘焘抚勾蜜渍荔枝》^{[2]2010}：

时新满座闻名字，别久何人记色香。

叶似杨梅蒸雾雨，花如卢桔傲风霜。

每怜莼菜下盐豉，肯与葡萄压酒浆。

回首惊尘卷飞雪，诗情真合与君尝。

此诗借对蜜渍荔枝的赞颂，暗含对自己身世处境的怨愤，以及自己不改其志的决心，还传达了与刘焘相处的欣然之情。

（下转第49页）

道光褒城县志所载苏轼牛头寺诗考

杜学林

内容提要 道光《褒城县志》所载苏轼牛头寺诗各种苏轼诗集皆未收录，这一记载渊源有自，明清相关方志可为佐证，此诗题目当为《赠牛头寺明上人》；苏轼至少两次经过褒城，具备创作此诗的条件和可能，且此诗深层意蕴与熙宁元年苏轼除父丧还朝时心境若合符契；牛头寺诗存在并未收入苏轼诗集，仅在褒城地区长期流传的可能，诗作本身也没有任何有意作伪痕迹。因此，我们认为这首牛头寺诗为苏轼佚诗当无可疑，应当据以补遗。

关键词 《褒城县志》 苏轼 牛头寺诗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文坛巨擘，生平著述极为宏富。南宋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苏轼诗歌的搜集整理，历经前辈时贤不断努力，以孔凡礼整理的《苏轼诗集》^[1]、傅璇琮等主编的《全宋诗·苏轼诗集》^[2]搜罗较为完备。近年来四川大学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等经过二十余年不懈耕耘，最终编撰出版了《苏轼全集校注》^[3]，这是迄今为止收录苏轼作品最多最全的苏轼全集，堪称苏轼文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苏轼研究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厥功甚伟。尽管如此，关于苏轼诗歌的搜集补遗工作并未完全结束，最近我们查阅道光《褒城县志》，发现一首署名苏轼的诗歌，该书卷六《城署志》云：

宋苏轼常寓牛头寺，有赠明上诗曰：“一轴金刚一炷香，雪眉双鬓任苍苍。去传熊耳西来印，归葺牛头旧住房。风静水声喧竹坞，夜深云气湿龙床。迷途尽欲僧开悟，何事年来厌上堂。”^{[4]246}

《褒城县志》所载这首“牛头寺诗”，孔凡礼整理《苏轼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全宋诗》、《全宋诗订补》及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皆未收录，近年的苏诗补遗文章亦未提及，或为苏轼佚诗。但此诗是否确为苏轼所作，还

需要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辨析：其一，道光《褒城县志》关于苏轼创作牛头寺诗的记载是否可信；其二，苏轼是否具备创作这首牛头寺诗的条件；其三，这首牛头寺诗是否存在并未收入苏轼诗集，仅在褒城地区长期流传的可能，以及此诗是否存在有人故意作伪痕迹。

—

首先，我们从文献角度考察，辨析道光《褒城县志》关于苏轼牛头寺诗的记载是否可信。毋庸讳言，我们所见记载这首牛头寺诗的《褒城县志》为清代道光间抄本，苏轼为北宋时人，二者年代相隔绝远，以此数百年后的一条记载断定此诗即为苏轼所作确嫌武断。况且此记载除所引诗句之外，其它文字颇为扞格难通：“苏轼常寓牛头寺”^{[4]246}，“常”者，经常，说明苏轼经常寓居牛头寺，但从传世文献看，除此记载外，并无任何文献涉及苏轼寓居牛头寺的记载；“有诗赠明上曰”^{[4]246}，“明上”究竟何指，也令人难以理解。因此，仅凭道光《褒城县志》这条似通非通的记载，虽将此诗明确归于苏轼名下，却不足以取信于人。但是，我们知道明清方志一般都是在前代志书基础上修撰而成，关于前代的相关记载往往是承袭旧志而来，并非凭空捏造。同样，记载苏轼牛头寺诗的《褒城县志》，也是在旧志基础上编撰而成，据光朝魁《褒城县志叙》，此志主要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萧兴会、欧阳文学所辑县志抄本基础上，参考府志并以撰者所识忆者“刊其谬、补其漏”^{[4]1}整理修撰而成，其中记载上有所承，并非完全仅为道光间人凭空修撰。从《叙》中“刊其谬、补其漏”等语来看，光朝魁修撰此志态度尚属认真，并非一般的例行公事，秉承这种态度修撰的方志当不至将没有任何根据的记

载入其中。这样来看,道光《褒城县志》的相关记载当有前代志书根据,关于苏轼牛头寺诗这条记载也应具有相关的文献依据,从这个角度考虑,这条记载具有一定可信度。但事实是否确实如此,还需进一步考察。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道光《褒城县志》之外,同样发现了有关苏轼牛头寺诗的记载: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八十六《汉中府·寺观·崇庆寺》条:“崇庆寺,在褒城西南二十五里,俗呼牛头寺,唐建。宋苏轼有赠牛头寺明上人诗。”^{[5]241}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八《汉中府·寺观·崇庆寺》条与之完全相同,此记载承袭乾隆《大清一统志》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被公认是清《一统志》中质量最好的一部,其原因在于纂修官学风严谨,考订精审……内容较前两志丰富而且准确”^{[6]145},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完全承袭乾隆《大清一统志》关于苏轼牛头寺诗的记载,至少说明当时编者认为乾隆《大清一统志》关于牛头寺诗这条记载可以相信。据此,我们可将道光《褒城县志》关于苏轼牛头寺诗的记载上溯至乾嘉时期。

尽管乾隆、嘉庆两《一统志》没有收录牛头寺诗的具体内容,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获得不少信息:首先,通过两部志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牛头寺即崇庆寺之俗称,具体位置在“褒城西南二十五里”^{[5]241},建筑时间远在唐代;其次,我们可据此对道光《褒城县志》关于苏轼牛头寺诗这则文献进行校补,如前所述,《褒城县志》中“苏轼常寓牛头寺”^{[4]246}句不合苏轼行迹,“有赠明上诗曰”^{[4]246}之“明上”究竟何指令人费解,整条记载显得扞格难通。现在我们知道牛头寺即褒城西南二十五里之崇庆寺,据现有文献,苏轼并未长期寓居褒城,更加不可能经常留宿褒城西南二十五里的牛头寺,因此,我们认为这则文献中“苏轼常寓牛头寺”之“常”当为“尝”字同音而讹;从乾隆、嘉庆两部《大清一统志》“宋苏轼有赠牛头寺明上人诗”句,可知《褒城县志》中“有赠明上诗曰”之“上”字下当脱“人”字。如此,道光《褒城县志》关于苏轼牛头寺诗的准确表述即为“苏轼尝寓牛头寺,有赠明上人诗曰”,并无任何扞格之处。再次,通过两部《一统志》的记载,我们可以对这首牛头寺诗的题目进行推测:从“宋苏轼有赠牛头寺明上人诗”句来看,此诗题目或为《赠牛头寺明上人》。

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清代文献之外,我们还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成书的《陕西通志》卷三十六《民物·寺观》“牛头寺”条发现一则关于这首牛头寺诗的更为珍贵的文献:“牛头寺在褒城县西二十五里牛头山。东坡有诗云:‘去传熊耳西来印,归葺牛头旧住房’即此。”^{[7]1923①}这则文献提到牛头寺“在褒城县西二十五里牛头山”,具体方位虽与乾隆、嘉庆两《一统志》记载的“在褒城西南二十五里”略有差异,但一以寺言,一以山言,所记皆为褒城牛头寺当无可疑。这里明确记载“东坡‘去传熊耳西来印,归葺牛头旧住房’即此”^{[7]1923},说明苏轼这两句诗中写到的“牛头”即指褒城县西二十五里牛头山上之牛头寺,且其中所引“去传熊耳西来印,归葺牛头旧住房”一联与道光《褒城县志》所载苏轼诗句完全一致。嘉靖《陕西通志》由时任陕西巡抚的赵廷瑞发起,关中著名学者马理主持实际编纂工作,马理的学术水平当然毋庸置疑,且他在编纂此书过程中具有突出的存史意识,广泛征集采撮各类文献多达130余种^{[8]42-47},编纂态度极为认真。当时及后世学者皆对这部方志评价甚高,发起修纂的赵廷瑞称其:“考索之精,虽史传宿讹,亦多是正。”^{[7]1},参与纂修的周文翰称其:“搜采人物,阅极经史及古今诸志、名士之集,虽断碣残碑,罔敢轻弃,其隐德幽贞,或遗于文人辞士之外者,又率得于先生之见闻,取善可谓广矣;纪述事类,则凡旧志讹且漏者,皆考订增入,纲举目张,纪事可谓详矣。”^{[7]2051}以上二人与此书关系密切,其评价或有主观溢美之嫌,但现代学者同样认为在成化《陕西志》、嘉靖《雍大记》和嘉靖《陕西通志》三部方志中“嘉靖《陕西通志》,无论体例之严谨,或记事之详确,皆远在前两志之上”^{[9]4},这一评价应无任何主观感情因素,当为客观求实之论。古今学者同时对这部方志给予高度评价,尤其对其考索精到、记事详确一致肯定,说明这部方志确实值得信据。因此,我们相信嘉靖《陕西通志》关于苏轼牛头寺诗的记载绝非凭空虚构,目前我们虽然尚未追溯到这则文献的明确史源,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史料价值。根据这条记载,我们至迟可将苏轼牛头寺诗的文献依据上溯至明代嘉靖年间。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道光《褒城县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嘉靖《陕西通志》都曾提及苏轼此诗,尤其嘉靖《陕西通志》所引诗句与道光《褒城县志》完全一

致,该志向以考索精到、记事详确为古今学者称道,我们相信其中关于苏轼牛头寺诗的记载必有所据。目前我们虽然尚未找到苏轼牛头寺诗的更早文献,但明清方志不约而同地提及苏轼牛头寺诗绝非偶然,光朝魁《褒城县志》记载“苏轼常(尝)宿牛头寺,有诗赠明上(人)”当非向壁虚造。因此,从文献角度考察,我们认为道光《褒城县志》关于苏轼牛头寺的记载应当可信。

二

其次,我们从苏轼行迹进行考察,看他是否具备创作这首牛头寺诗的条件和可能。据道光《褒城县志》,此诗为苏轼寓居牛头寺所作,乾隆嘉庆两《一统志》、嘉靖《陕西通志》亦将之系于牛头寺下,说明这首牛头寺诗并非依题悬拟之作,即作者当实际到过牛头寺。因此,要判断此诗是否苏轼所作,首先需要考察苏轼是否到过牛头寺。翻检苏轼诗文,可以发现苏轼《次前韵再送周正儒》一诗有“牛头与兜率,云木蔚堆堊”^{[1]1586}之句,且诗中“牛头”确指“牛头寺”,据此可知苏轼的确到过“牛头寺”,这样问题似乎很容易得到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唐宋间称牛头寺者甚多,苏轼《次前韵再送周正儒》诗中的“牛头(寺)”指梓州郪县西牛头山牛头寺,道光《褒城县志》等记载苏轼创作牛头寺诗的牛头寺却在汉中褒城附近,即褒城西南二十五里之崇庆寺,二者并非一地。因此,尽管《次前韵再送周正儒》一诗提到“牛头(寺)”,只能说明苏轼到过梓州牛头寺,并不能说明苏轼到过褒城牛头寺,更不能据此断定苏轼尝寓褒城牛头寺且赠明上人诗。

就现有资料来看,除道光《褒城县志》等明清方志之外,并无其它文献提及苏轼到过褒城牛头寺,传世苏轼诗文亦未见涉及褒城牛头寺的任何文字,苏轼究竟是否到过褒城牛头寺,并无直接而明确的文献依据,这样我们也就不能据之判断苏轼是否可能创作这首牛头寺诗。但是,如果我们不过分追求所谓直接的文献依据,通过考察褒城牛头寺的地理位置以及苏轼的相关行迹,可以断言,苏轼绝对不止一次经过褒城,并且极有可能寓居牛头寺。

褒城地处褒斜道南段,这段驿道仅此一线,出口即在褒水入汉水处之褒城县,因此,褒城为蜀中到关中之咽喉要道,无论是出蜀入关还是由关

入蜀,皆须经过褒城。牛头寺位于褒城西南方向,由蜀入关之褒斜道,经过褒城之前,正位于褒城正西略微偏南方向,即牛头寺正处由蜀入关之褒斜道经过褒城之前的驿道附近。^{[10]②}北宋建都汴梁(今开封),由蜀至汴主要有水陆两道,水路沿长江东下,至荆州附近再换陆路北;陆路北出汉中,到达关中后再出关东行,其间必经褒斜道。苏轼一生凡三次出蜀,两次返乡,数次来往蜀中与汴京之间,每次所行路线皆可勾稽而得,是否行经褒斜道亦可约略推及: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离蜀进京,“发成都,过剑门,经凤翔府郿县横渠镇,游崇寿院,经扶风,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至澠池。”^{[11]43}“五六月间,抵京师。”^{[11]44}父子三人出蜀路线当为陆路,必经褒斜道,必过褒城。嘉祐二年(1057)“四月七日,母程氏卒。讣至,父子仓惶返蜀。”^{[11]60}返蜀具体路线不详,是否经过褒城不得而知,可置勿论。嘉祐四年七八月,免丧。十月,“苏轼兄弟侍父洵离眉州,赴京师。”^{[11]65}“约于十三日,初发嘉州”^{[11]68}“泊南井口”^{[11]70}“过渝州、涪州,经明月峡,至忠州丰都县”^{[11]71},此次出蜀所行为水路,不可能经过褒城。治平三年(1066)“四月二十五日,父洵卒”^{[11]142},六月,“与弟辙舟载父洵之柩归蜀。过泗州、洪泽。”^{[11]145}此行亦为水路,同样不可能经过褒城。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除丧”^{[11]153},十月十一月间,“将离眉山”^{[11]155}“过益昌”^{[11]155}“至凤翔”^{[11]156}“至长安”^{[11]155},此次出蜀具体行程不详,但可以肯定,所行亦为陆路,必经褒斜道,必过褒城。此后苏轼再未入蜀,不可能再行褒斜道,亦无缘再至褒城。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苏轼至少两次行经褒斜道,即至少两次经过褒城:一为嘉祐元年四五月间父子三人初次离蜀入京,一为熙宁元年十一月间兄弟二人除父丧后出蜀还朝。考察苏轼行迹时,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即苏轼其人一向热衷游赏佛寺、交往僧人,传世苏集涉及佛寺、僧人的诗作极其丰富,遇佛寺而不入简直不合其一贯行为。因此,我们认为苏轼行经褒斜道时,在到达褒城之前,寓居驿道附近的牛头寺不足为奇,且道光《褒城县志》明确记载其事,这一记载渊源有自,并非空穴来风,苏轼到过褒城牛头寺当无可疑,其间创作牛头寺诗赠给牛头寺僧亦合乎情理。

然如上所言,苏轼至少两次行经褒斜道,两次皆有可能到褒城附近的牛头寺,究竟其中哪一次寓

居牛头寺创作此诗，我们还需略作分析。道光《褒城县志》录牛头寺诗尾联为“迷途尽欲僧开悟，何事年来厌上堂”，“迷途”句既可指世人皆处“迷途”之中以待僧人开智悟理，同时亦可指作者身处“迷途”等待僧人开解度化，从诗作语气来看，此句本意指前者，但如从创作心理和深层动机来分析，诗人既然写出“迷途尽欲僧开悟”之句，在深层意识中未必没有对自身前途的茫然和忧虑。如这一分析无误，且此诗确为苏轼之作，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其具体创作时间：嘉祐元年父子三人离蜀赴京，苏轼时年二十一岁，正当青春年少，至成都时，张方平尚以六科勉励兄弟二人，此行似不应有前途未卜的“迷途”之忧；熙宁元年苏轼与弟辙除丧还朝，但在二人居丧期间，朝廷之中正进行着剧烈的更新换代，“早在治平三年（1066）苏轼离京之际，宰相韩琦、参政欧阳修已经为了‘濮议’之事而与知谏院司马光、御史吕晦、范纯仁（范仲淹子）、吕大防以及侍读吕公著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除司马光外，吕晦以下全被贬逐。但不久，宋英宗崩，太子赵顼即位，就是以变法闻名的宋神宗。即位的当年（治平四年，1067），韩琦、富弼、欧阳修都解去宰相、枢密、参政之权，出任地方官。熙宁元年（1068）翰林学士王安石被召见，力陈变法大计，甚得神宗之意。”^{[12]68-69}这些朝廷变故苏轼当有耳闻，苏氏父子早在嘉祐八年乃至更早即与王安石交恶^{[12]67}，对神宗召王安石入对苏轼不可能无动于衷，王安石变法开始之后，苏轼果然被“卷入这场巨大的政治风波，自此起直到他离世，其政治、学术和文艺创作，都与王安石的‘新法’及其变法理论‘新学’密切相关。”^{[12]69}从王安石应召入对苏轼或许已经预感到自己政治前途的暗淡和渺茫。加上数年之间，父母双亡，爱妻早逝，这些家庭变故亦当对其产生一定影响。从仕途前景和家庭变故两方面分析，苏轼此次入朝之心境不难推测，以此心境途中寓居牛头寺写出“迷途尽欲僧开悟”之句自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们认为《褒城县志》所载牛头寺诗当为熙宁元年十一二月间，苏轼与弟辙除父丧后还朝途中行经褒斜道，寓居褒城附近的牛头寺时所作。

通过考察苏轼行迹，我们认为苏轼至少两次行经褒斜道，两次皆有可能寓居褒城牛头寺，具备创作这首牛头寺诗的条件。熙宁元年兄弟二人除父丧还朝之时，朝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韩琦、富弼、

欧阳修解职，王安石应召入对，得到宋神宗重用，由于苏、王交恶，苏轼当可从王安石入对预感到自己政治前途的暗淡和渺茫，加上父母双亡、爱妻早逝，其心境可想而知，这种心境与牛头寺诗“迷途尽欲僧开悟，何事年来厌上堂”一联深层意蕴中对前途的迷茫和忧虑若合符契，这首牛头寺诗或即此年十一二月间苏轼除父丧还朝途中的寓居牛头寺而作。因此，从苏轼行迹考察，我们认为道光《褒城县志》所载苏轼牛头寺诗亦为可信。

三

再次，我们从编次流传和文献辨伪角度考察，看这首牛头寺诗是否存在从未收入苏轼诗集，仅在褒城地区长期流传的可能，并分析此诗是否存在有意作伪痕迹。苏轼《答刘沔都漕书》中云：“轼平生以文字言语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瘖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亦谓随手云散鸟没矣。不知足下默随其后，掇拾编缀，略无遗者，览之惭汗，可为多言之戒。”^{[13]1429}苏轼虽感慨刘沔掇拾编缀自己诗文不遗余力，但从“亦谓随手云散鸟没矣”一句来看，其本人对自己诗文的收集保存并不重视，随写随散，并未刻意进行编次。因此，苏轼的一些诗作未能收入个人别集并非偶然，尤其某些写作地点较为偏僻、书写方式较为特殊的作品，作者本人及当事者如不着意留存诗稿，其他人根本无缘知晓，当然更加不可能编入别集。有些作品早在苏轼生前已经亡佚，如苏辙《栾城集》卷一《怀涪池寄子瞻兄》自注：“辙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老僧奉闲之壁”^{[14]12}，诗中有“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之句，可见兄弟二人皆有题作，然从苏轼《和子由涪池怀旧》“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1]97}句来看，苏辙再过涪池时，已难以看到兄弟二人的题壁之作，我们现在见到传世的苏轼诗集、苏辙诗集亦未见收录二人的题壁诗，如果不是苏轼、苏辙自表其事，我们亦无缘知道二人在涪池某寺尚有题壁诗。假设涪池寺僧将苏轼、苏辙题壁之作抄录下来，后人采入方志，一直流传下来，这两首题壁之作自然不能否认是苏轼、苏辙的作品。以此类彼，如苏轼确有宿牛头寺赠明上人诗，赠诗之后本人并未留下底稿，亦从未向人提及，编辑苏轼诗集者自然无从收录，然牛头

寺僧或其他知情者却将此诗乃至其创作情况记录下来。后人编纂地方志时，一些认真负责的学者搜罗材料中或发现这些文献，于是将之采入方志之中，但并未引起更多学者注意，仅在褒城地区长期流传。从兄弟二人浣池题壁诗流传来看，这种推测并非绝无可能，只是浣池题壁在宋代早已亡佚，牛头寺诗却在褒城地区一直流传下来，到清代道光年间的《褒城县志》还有完整记录而已。因此，我们认为从编次流传角度考察，这首牛头寺诗确实存在从未编入苏轼诗集，仅在褒城地区长期流传的可能。

不可否认，由于苏轼名声过大，托名依傍者甚多。苏轼晚年自己也感到“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又多为俗子所改窜，读之使人不平”^{[13]1429}，但他本人并未能亲手编定个人文集。苏轼死后不久，又入元祐党籍，崇宁二年（1103）“四月丁巳（初九日），诏毁《东坡集》并《后集》印板”^{[15]1435}，宣和五年（1123）“七月十三日，令开封府，四川路、福建路毁苏轼文集之板”^{[11]1437}。但实际情况却是禁而不止，“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之八十万。禁愈严而其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颂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15]21}在这种“以多相夸”心理驱动下，出现一些伪造依托之作更加不足为奇。南宋之后，苏轼诗文常盛不衰，即使在明代普遍否定宋诗的情况下，苏轼名声依然如日中天，苏轼诗集多次刊刻^{[16]145-146}。梁启超曾言：“有名人的作品，赝品很多，名气愈大，假得越厉害。”“盛名之下，最易盗窃，传抄的人，辗转加入，于是愈假愈多，愈多愈假”。^{[17]5014}苏轼正是这样一位具有“盛名”的诗人，对于署名“苏轼”的作品自然应该慎之又慎。近年来苏诗辑佚固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刘尚荣^{[18]45-51}、马德富^{[19]52-56}、胡建升^{[20]98-100}等多位学者已分别撰文探讨，我们在苏诗辑佚过程中自然应该引以为戒。

从文献辨伪角度看，这首署名苏轼的牛头寺诗是否存在作伪痕迹呢？依据文献作伪的一般规律，无论以任何目的、依托哪位名人，这些伪托作品能够流传开来为人所知都是实现作伪目的的基本前提，任何一个正常的作伪者都绝不会将自己伪造的作品秘不示人，仅仅用来自我欣赏，或将之藏至极为偏僻的所在，而不希望任何人看到。按照作伪的不同目的，伪造出来的作品亦当有不同特点，通过

伪造作品说明被依托者的某些情况，伪造作品一般需要涉及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依托名人以自重，作品中的人事能与被依托者关系密切，最好是众所周知的人物最为理想。但这首署名苏轼的牛头寺诗仅见于道光《褒城县志》，乾隆、嘉庆两《一统志》及嘉靖《陕西通志》等方志之中，而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这说明此诗并非有人故意作伪，而是自然保存于当地文献之中。从诗歌内容来看，全诗只是对牛头寺僧的简单描写和问候，深层意蕴中或许包含一些作者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和无助，此外并无任何特殊之处。道光《褒城县志》，乾隆、嘉庆《一统志》中提及牛头寺诗中的“明上人”与苏轼交往极为有限：苏轼《南华寺》诗中虽有“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1]2061}之句，然此“明上座”显然指的是追赶六祖惠能之“惠明”，与牛头寺“明上人”无涉；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有明上人者，作诗甚艰，求捷法于东坡，东坡作两颂以与之……”^{[21]348}此“明上人”是否即牛头寺“明上人”，别无旁证，但牛头寺诗中有“雪眉双鬓任苍苍”、“何事年来厌上堂”等语，知赠诗之时牛头寺之明上人已相当衰老，其年龄当远远大于苏轼，似与问诗东坡之“明上人”并非一人。除此牛头寺诗外，亦无其他文献涉及苏轼与牛头寺僧交往问题，即使有意作伪，恐怕亦不至选择如此偏僻罕见人物为之。因此，从文献辨伪角度考察，这首牛头寺并不存在有意作伪痕迹。

通过考察苏集编次流传，并从文献辨伪角度分析，我们认为苏轼本人对其诗文搜集编次并不重视，《褒城县志》所载牛头寺诗确实存在从未收入苏轼诗集，仅在褒城地区长期流传的可能；这首牛头寺诗长期以来仅流传于褒城地区，内容并无任何特殊之处，且其中所涉牛头寺明上人偏僻罕见，这不符合文献作伪的一般规律。因此，我们认为从苏集编次流传和文献辨伪角度考察，同样不能否认道光《褒城县志》所载牛头寺诗为苏轼所作。

综上所述，从文献记载角度考察，道光《褒城县志》关于苏轼牛头寺诗的记载渊源有自，乾隆、嘉庆两《一统志》、嘉靖《陕西通志》皆可佐证，并知此诗题目或为《赠牛头寺明上人》；从苏轼行迹考察，苏轼确实到过褒城，且极有可能寓居牛头寺，具备创作此诗的条件，具体时间当为熙宁元年苏轼与弟辙处理父丧还朝途中，苏轼当时心境与诗歌内容十分契合；从苏集编次流传和文献辨伪角度

考察,此诗确实存在并未收入苏轼诗集,仅在褒城地区长期流传的可能,且并无明显有意作伪痕迹。因此,我们认为道光《褒城县志》所载牛头寺诗为苏轼佚作当无可疑,应当据以补遗。

注释

① “去传熊耳西来印”之“印”,点校本《陕西通志》作“叩”字,影印本嘉靖《陕西通志》亦确似“叩”字,然版刻书籍“印”、“叩”二字字形极为接近,当属形近而讹。

② 关于褒斜道路线及行程、驿路等主要参考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严氏所考虽为唐代交通,但褒斜道在唐宋间变化不大,具体路线基本相同,当可据之考察苏轼行迹。

[1]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 傅璇琮等:《全宋诗·苏轼诗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4] 光朝魁:《中国方志丛书第36册·褒城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道光十一年抄本。

[5] 和珅等:《大清一统志》,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6] 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7] 赵廷瑞等纂、董健桥等校注:《陕西通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8] 张世氏:《关学大师马理及其〈陕西通志〉》,《陕西史志》,1995年第2期。

[9] 邵国秀:《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前言》,《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

[10]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1985年。

[11] 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12]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4] 苏辙:《栟城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15] 朱弁:《风月堂诗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6] 刘尚荣:《苏诗版本考述》,《文史》,2002年第4

期。

[17]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18] 刘尚荣:《苏诗佚诗真伪辨——关于苏轼的补编诗互见诗及其真伪的研究与评介》,《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19] 马德富:《苏轼佚诗辨证》,《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20] 胡建升:《苏轼佚诗辨伪》,《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6期。

[21] 何文煊:《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杜学林,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接第43页)

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五日,苏东坡罢定州任,责知英州远行。尚留在定州的刘焘对恩师深怀挂念,曾驰函问候。苏东坡收到信,立即写了一封复函《答刘无言》^{[1]1804}: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份绝欲,守此四言,行之终身,庶保余年得还田亩,但未知有无后命尔。

虽然简短,但属胸臆。大意是,此次被贬我只有感谢皇恩、承认罪过、省察自身、淡绝欲望,只有坚守这四句话,且终生以此行事,或可保得残年去官回乡,只是不知有无这样的命了。可见这都是对要好的人说的心理话,也可证明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根据这些情况,刘焘作为贴身秘书,职务又这样重要,与苏东坡关系又如此不一般,苏东坡外出带军、地班子成员去曲阳祷雨,让刘焘跟随那是必然的。这个历经近六百年风化掉的石刻上的二字姓名,怕是刘焘无疑了。

注释

[1]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李占才,河北省保定市政府退休干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浅析道教与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陆雪卉

内容提要 作为我国宋代的文坛巨匠，苏轼一生深受道教与道家思想的影响，并将之深刻贯穿于其政治生涯、文学创作和生活起居。本文首先介绍了苏轼与道家的渊源，然后分别从政治、词作两个方面探讨苏轼的待世理念及生活情怀。因养生方面，前学者探究已深，故本文不再赘述。

关键词 道教 道家思想 苏轼 文学创作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书法家。他曾创作文学作品无数，其风格洒脱豪放、超然旷达，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虽颠沛流离、起伏不定，但他至始至终都保持着一颗清净淡泊、安之若素的心。他喜山水、爱自然、善交友，他勤学道、好美食、乐养生。纵观苏轼一生，不难看出，道教清新寡欲、自然无为的思想观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苏轼的文学创作及生活格调，同时，也让他在政治失意、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依旧不断进取。可以说，苏轼之所以在我国宋代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与道家思想对其影响是息息相关的。本文首先介绍苏轼与道教的渊源，然后分别从政治、词作和养生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苏轼的道家情愫。

一、幼年拜师兼修道，结缘道法在心中——苏轼结缘道教溯源

苏轼出生于北宋后期，正值道教蓬勃发展的时代，由于道教深受当时宋太宗的推崇，全国上下无不弥漫着浓浓的求道之风。而当时的四川又是道教的发源盛行之地，因此，其家庭也难免深受影响。据记载，他的祖父苏序是颇有文化见识、大度豁达、乐善好施的农民，信道学，被世人称为“端正道人”^{[1]4-5}。因此，早在苏轼的启蒙时期，便受到了道教

的熏陶^{[2]28}，据《陈太初尸解》记：“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3]2322}又《众妙堂记》云：“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3]361}此外，当苏轼晚年被贬于惠州之时，他还曾在写给刘易翁的书信中提及：“轼韶髫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遁。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3]1415}可见，苏轼年幼便喜好道学，本不欲结婚入仕的，但由于父兄所强，不得不走入仕途。而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也曾记载道：“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4]从苏轼八岁时随同道士张易简读书时的感悟，不难看出，当年的他也许对道教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感性认识上，但毕竟也对《道德经》以及老子产生了好感。可见，苏轼在年幼时期便对道家经典有所体悟，对道教的崇信不仅影响了其文学创作及修身养心，同时也使他将道家思想运用于其为官治国的理念之中。

二、行道施义为政事，利国益民济天下——苏轼的道家治国理念

年轻的苏轼刚刚步入官场之时，踌躇满志，他积极入世，立志安邦治国。在政治上，苏轼主张以儒家的仁政来治国，他还曾向皇帝上书，提出了“以至仁为德”的治国观念。而事实上，这“仁”字的背后也融合渗透了诸多道教思想。

（一）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老子》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5]57}，又“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

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5]55}在老子看来，懂得用“道”来辅佐君主的人，是不会仗恃武力来强取天下的，试图通过人为手段来得到某样东西，必然也会以失败告终。而苏轼在为政治国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在《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代吕申公》中曾提到：“祸莫逆于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狱，灾莫深于兴土功，毒莫深于夺民利。”^{[5]133}可见，苏轼是反对以人为的手段来强行天下之事的。

在道家看来，天地对待万物是一视同仁的，圣人亦是如此，“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5]10}这里的天地、万物之所以以百姓为刍狗，并非指他们“不仁”。相反，他们无所偏爱，不随意对外物加以干涉，也恰恰体现了他们的“一视同仁”。这样的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轼，在他看来：“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5]133}唯有依从百姓的意愿行天下之事，方可治天下于不乱。

（二）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在老子看来，暴政是不可能实现百姓的安宁与天下的太平的，正所谓“民不畏威，则大威至”^{[5]132}，“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5]134}。当百姓不畏惧执政者的威逼时，他们对死亦无所畏惧，因此，更大的祸患就要来临。这样的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轼。比如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他曾提到：“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3]3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用刀锯作刑具，只能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而对不受这种刑的人则是不起作用的。

不难看出，苏轼与老子的治国思想不谋而合。同样道理：“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3]34}因此，苏轼认为，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同样，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因此，他提出：“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3]34}苏轼坚持认为，当赏罚出现问题时，则应当以仁爱之心对待，他反对以强行制裁的手段使百姓归顺于君，而主张以柔克刚、以弱制强的仁政手段。

可见，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苏轼并不拘泥于具体的奖惩措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超出具体的奖惩界限，以仁爱之心待天下之人，才能使百姓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苏轼在此篇文章中提到的“仁”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流露了道家顺应百姓、以柔克刚的政治思想主张。

（三）清静不争，虚明应物；方士奇技，不可轻为

道家至始至终都是以“清静无为”的思想来治理国家的。在《老子》中有这样的表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5]5}“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5]7}深受道家影响，苏轼曾向皇帝上书：“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皇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3]503}此处的“清静”即是指人应当内心洁净，不要受外物的影响，苏轼主张无为而治、顺应万物才是治国之关键，唯有时保持内心的清静，方可治民于不乱。

而对于那些方士之言，乃至丹药奇技，苏轼本人虽对之颇有兴趣，但他却不支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朝廷政事，在他看来：“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号，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天皇、太一、紫极、北极之祀，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篆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皇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则韶濩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礼，不能以致刑措。”^{[3]503}又“为申、商之学者，则曰：‘人主不可以不学术数’；人主，天下之父也，为人父而用术于其子，可乎？为庄、老之学者，则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欲穷兵黩武，则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国’；欲烦刑多杀，则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敛，则曰：

‘吾以强兵革而诛暴乱，虽若不仁而卒归于仁。’此皆亡国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尝用之矣，皆以经术附会其说。”^{[3]503}

由此可见，苏轼反对以复杂多样的五色巫术治国待民，在他看来，治国应当一切从简，恰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在这段话里，老子阐述了物欲的危害性，他反对纵情声色之娱。他认为人若在物欲横流的环境里，不能抵制住对物质的贪欲，则会变得内心空虚并且误入歧途。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道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可谓深深地影响了苏轼的治国理念。他才华横溢，立志安邦治国。在这雄心壮志的气度之中，他依旧保持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也正如他在《上清储祥宫碑》中所提及：“检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战而胜。虚心以观世，故不察而明。”^{[3]504}此处，苏轼不仅强调了自我修身的重要性，同时也认为，圣人只有效法天地之道，即无私无欲，谦恭退让，摒弃私心，顺应天道，方可治百姓于安乐，安天下于太平。

三、点点笔墨浩然气，一泄千里快哉风——苏轼笔下的道风仙气

从艺术的角度看，道家作品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宗教宝典、思想宝库，同时它也是一部风格迥异、独具特色的艺术宝库。全部的道家著作可谓构成了一个宏大的浪漫主义体系，它陶冶了苏轼的思想与气质，升华了他的艺术创造力，丰富了他的创作方法与技巧，同时也涵养了属于他自己的艺术风格^{[6]81}。如此丰富又多情的艺术熏陶，不仅影响了苏轼的为人处事及待世情怀，同时也让他将其文学创作挥洒得淋漓尽致。

（一）超然物我，洒脱自如；仙风道骨，羽化登天

诸多道家思想都饱含着丰富的神幻色彩，它主张人们积善成德、修性成仙。

作为道家典型代表人物之一的庄子，他虽生活贫困，默默无闻，但其一生都在追求着“至人无己”

的精神境界。他崇尚自由，淡泊名利，其代表作品《逍遥游》、《齐物论》等也展现了他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洒脱情愫。

庄子豪迈洒脱的别家风情让苏轼在年幼时便对之倾心神往，苏轼被贬于黄州之时，还曾在写给上官彝的诗中提到：“伏观书辞，博雅纯健，有味其言；次观古律诗，周思深妙，有意于古作者；卒读《庄子论》，笔势浩然，所寄深矣，非浅学所能到。”^{[3]1713}道家逍遥自在的洒脱情怀不仅为苏轼抚平了失意时的伤口，同时，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了屡屡豪迈之风。

在《后赤壁赋》一文中，苏轼描绘了一只仙鹤横江而来，而后化为道士，并与之对话的一副场景：“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3]8}寥寥几字不仅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一幅神秘奇幻的梦幻场景，同时也突显了苏轼丰富的想象力。

而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中，苏轼写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7]200}此词作于元丰五年，即是苏轼被贬于黄州的第三年，也恰是他面对朝廷动荡之时。面对仕途坎坷，饱经风霜的他依旧宠辱不惊，潇洒自如，他借酒消愁，夜饮雪堂；他融身于自然，寄情于江海，扁舟一叶，清风一缕，昔日的点滴惆怅瞬间消逝于无穷无尽的天地自然之间。寥寥几字，便可看出，苏轼的诗词创作散发出了浓郁的道风之影。

（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巧含哲理，善辩思论

道家思想不仅主张以“清静无为，自然不争”的情怀待世，同时它也倾向于用辩证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如《道德经》第二章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5]5}在老子看来，一切事物都是不停地运动，永不止息的，世间万物都是在不停的变化之中。道家注重事物变化过程中的相对性，这样的思想也很

大程度地影响了苏轼。

在《超然台记》中，他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饔飧啜菽皆可醉，果蔬草木皆可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3]351}苏轼于此处悟到，事物的善与恶，好与坏，都是相对的，人们之所以烦恼与忧愁的原因则恰恰在于我们用区别的眼光看待事物。若能不拘泥于事物的表象，明白事物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超乎其外，那么，何时不乐，何事可忧呢？也正如他自己所言：“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3]352}而《醉白堂记》中：“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3]344}字里行间里无不流露了道家寄情山水、飘逸洒脱的畅然之风。

道家思想为苏轼的创作增添了神秘色彩，除此之外，它还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思辨元素。老子曾说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5]77}这里的无形、无象本为虚物，但在老子看来，真正至善至美的事物可以达到了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因此反而给人一种无音无象的感觉，这可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和谐圆润之美。深受此观念的影响，苏轼的诸多文学作品中也饱含这种辩证统一的色彩。

他在《评韩柳诗》中曾有这样的论述：“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3]2109-2110}这里的“枯澹”传达了一种虚实相生的意境，它不是简单地排斥绚烂、绮丽，也不是刻意地去制造“枯”的效果，而是在熟练地掌握各种技巧的基础之上，逐渐地抹去作品中繁琐的法度、华丽的修饰、精炼的语言和绚丽的色彩，这是一种蕴含着无限韵味的美学范畴，是“绚烂之极”而成的平淡^{[9]24}。这种深邃悠远的表达风格与老子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5]67}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题柳子厚诗二首》中：“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3]2109}“故”与“新”、“俗”与“雅”，本意相对，而作诗如若寻求新意，则应当学会吐故纳新，抛弃“俗”与“雅”之间的相斥性，在二者寻求一个平衡性的支点。这也体现了老子的辩证相对学说。此外，苏轼还在《书柳子

厚〈渔翁〉诗》中提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具有思辨意味的创造方法，从哲学的角度看，“反常”是矛盾对立的，而“合道”则是和谐统一的，苏轼既希望在“反常”与“合道”之间划出一个界限，而又努力试图找到其中的共性，他倡导人们应该在合乎规律以及思维逻辑的基础之上，挖掘到创新的源泉^{[9]25}。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念无疑是受到了“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5]120}的影响。有些事物看似与常规背道而驰，而事实却恰恰符合了事物的发展规律。苏轼提出了“反常合道”的方法以此来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这也体现了他巧辩善思的为文魅力与技巧。

（三）天工自美，真性本如；融情于理，形神并存

《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47}《庄子》亦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10]、“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10]，短短几字体现了天地万物自然无为的真性情之美，这是一种顺应世事万物、无是非差异的和谐境界。而在苏轼的文学创作中，也不乏这种清新质朴之气息。在《南行前集叙》中，他提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又“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3]323}在他看来，写文章时，如果心中空无所有，光凭技巧，是不会写出好的文章的。就像山川草木一样，它们的秀美即是其本性能量的释放。他曾赞美辩才的文章：“如风吹水，自成文理。”^{[3]2144}可见，为文仅仅凭借技巧与欲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内心真正有所感悟与积累，方能不吐不快。

除此之外，苏轼对天地万物的形成变化也颇有自己的见解，深受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5]80}的影响，他认为真正平淡和谐的自然之美，是符合“道”的标准的，他曾说过：“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有无之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老子识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虽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

而非道也。”^[11]而对于他自己的文章，他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3]2069}同样，金代的王若虚也曾这样评价过苏轼的文字：“东坡自言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滔滔汨汨，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当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论者或讥其太夸，予谓惟坡可以当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势，随物赋形之能，而理尽辄止，未尝以驰骋自喜，此其横放超迈，而不失为精纯也邪。”^[12]由此可见，苏轼的文章可谓是纵横恣肆，其如万斛泉流一样，不择地而出。创作中只有做到随物赋形，顺应天道，方可以达到真正发的之上之美。

四、结论

纵观苏轼的一生，无论是他的政治生涯，还是文学作品，道教对其影响不仅渗透了苏轼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成就了他一幅宠辱不惊、随缘自如的旷世情怀。正如他自己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注释

[1]高纯林：《汇入浩浩大江的清溪——谈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28期。

[2]陈德武：《苏轼的仙气》，《中国道教》，2005年第6期。

[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4]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栟城后集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清宁子：《老子道德经通解》，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

[6]刘文刚：《苏轼与道》，《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7]刘乃昌：《苏轼选集》，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8]高云鹏：《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9]宋皓琨：《试论苏轼的辩证诗学思想》，《阴山学刊》，2008年第6期。

[10]王夫之：《庄子解》，清同治四年湘乡曾氏金陵节署重刊船山遗书本。

[11]苏轼：《东坡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九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2]王若虚：《浮南遗老集》卷三十七，《四部丛刊》旧抄本。

（陆雪卉，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书名：苏轼书法研究

作者：曹士东

出版：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

版

开本：16开

页数：149页

定价：32元

苏东坡与泡菜

刘清泉

内容提要 东坡美食广为人知，可苏东坡在泡菜方面有故事、有作为吗？搜索苏东坡的诗文可知，他有与泡菜相关的诗文，但却没有我们所期待的经典语句或者有趣故事。

关键词 苏东坡 泡菜 菹 酢

为了长时间贮存蔬菜，古人用盐水等浸泡、发酵蔬菜，制品称之为泡菜或者酸菜。都说苏东坡天才全能、涉猎广泛，无事不可入诗，他与泡菜之间有故事吗？有人拿“三白饭”说事，我以为太牵强，因为在一碗白饭、一碟白萝卜和一碟盐之中，如果那一碟白萝卜是泡菜的话，那一碟盐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以现代手段搜索苏东坡诗文中的“菹”、“酢”，有什么收获呢？下边，我将对搜索结果进行分类、分析和比较，以就教于方家。

一、与泡菜有关的几个词语

泡菜古称“菹”，这是一个会意字，“且”为象形的泡菜坛，在泡菜坛里盛上盐水，放入草本植物，不就是泡菜吗？关于“菹”字出现的最早文献，当首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小雅·信南山》^{[1] 205}是一首祭祀的乐歌兼及农业生产，诗云：“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意思是田中搭着窝棚，田边种了瓜果。削瓜泡成酸菜，用以祭祀先祖。愿我们得以长寿，接受上天的福佑。“中田”，田中；“场”（yì），田界；“菹”，酢菜也；“祜”（hù），福也。

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它用“酢”解释“菹”，又用“醢”解释“酢”，对“菹”^{[2] 25}、“酢”^{[2] 438}、“醢”^{[2] 438}的解释如下：

菹 zū 酢菜也。从艸，沮声。侧鱼切。

酢 cù 醢也。从酉，乍声。仓故切。臣

铉等曰：“今俗作在各切。”

醢 yàn 酢浆也。从酉，僉声。臣铉等曰：“今俗作酖，非是。”鱼寔切。

《康熙字典》解释“菹”^{[3] 1040}曰：

《唐韵》：“侧鱼切，音齿廬。”《说文》：“酢菜也。”《释名》：“菹，阻也。生酿之，遂使阻于寒温之间，不得烂也。”《诗·小雅》：“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礼祭统》：“木草之菹。[注]芹茹之属。”《侯靖录》：“细切曰齏，全物曰菹。今中国皆言齏，江南皆曰菹。”又《集韵》：“子邪切，音嗟。泽生草曰菹。”《孟子》：“驱龙蛇而放之菹。”又地名，《穆天子传》：“南征至于菹。”

《康熙字典》引用了《说文解字》的解释，与《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菹”^{[4] 1818}的第二义项“酸菜”相同。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条解释：一是“泽生草曰菹”，以《孟子》“驱龙蛇而放之菹”为例句，与《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一义项“多水草的沼泽地带”相同。二是“地名”，以《穆天子传》“南征至于菹”为例句，《现代汉语词典》无此义项。《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菹”还有第三义项“切碎（肉、菜）”。

二、苏东坡有关“菹”的诗文

在《苏轼全集校注》中，直接出现“菹”字的苏轼诗文，有《李西平画赞》^{[5] 2321}，文曰：

以吾观，西平王。提孤军，自北方。赴行在，走怀光。斩朱泚，如反掌。及其后，帅凤翔。与陇右，瞰河湟。兵益振，谋既臧。终不能，取寻常。堕贼计，困平凉。卒罢兵，仆三将。谁之咎？在庙堂。斩马剑，诛延赏。为菹醢，不足偿。览遗像，涕泗滂。

此文作年未详。李西平，即唐代名将李晟，字良器。初为边镇裨将，后任右神策军都将。唐德宗时，率军讨藩镇田悦叛乱；建中四年，击败朱泚叛军，收复京师。累官至太尉兼中书令，封西平郡王。新旧《唐书》有传。第1-2句，开门见山；第3-8句，赞孤军靖难；第9-26句，赞忠心报国；第27-28句，涕泗感慨。第19-26句叙述吐蕃之所以能够用反间计罢去名将李晟、马燧和浑瑊的兵权，是因为张延赏当国。李西平用上方宝剑（即斩马剑）诛杀了张延赏。“菹醢”即剁成肉酱，是一种酷刑。“为菹醢，不足偿”意思是即使把张延赏剁成肉酱，亦不足以抵偿他的罪孽。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5]7093}中记叙项羽语言曰：“且汉王亲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数矣，我常易而释之，今乃日东向必欲亡楚而后已，故吾深仇之，欲菹醢其父，聊快于一时，况与之归耶？”这里的“菹醢”与上文同义，而“菹”是切碎（肉、菜）之意。

在《苏轼全集校注》中，间接出现“菹”字的苏轼诗文，有《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6]1476}。熙宁十年（1077）三月汴京，苏轼为鲁元翰知卫州而作此送别诗。其中插叙了他们在杭州时交往之事，生动有情。第15-24句诗云：

忆在钱塘岁，情好均弟兄。

时于冰雪中，笑语作春温。

欲饮径相觅，夜开丛竹轩。

搜寻到筐筍，鮓醢无复存。

每愧烟火中，玉腕亲炮燔。

熙宁中，苏轼与鲁元翰同时为杭州通判，相处融洽，情同兄弟。那时的聚会，即使在冰天雪地之中，欢声笑语亦有春天般的温暖。我想喝酒就径直来找你，于是便在丛竹轩摆开夜宴畅饮。翻箱倒柜地搜寻鮓醢，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每次嫂夫人都亲自下橱，在烟火中烧烤食物，让我心生愧疚。注意这里出现了“鮓醢”一词。鮓（zhǎ），腌鱼、糟鱼之类，《释名·释饮食》：“鮓，菹也。以盐米酿鱼以为菹，熟而食之也。”我们现在可以泡凤爪、泡猪耳朵，当然也可以泡鱼了。醢，肉酱。

苏辙有两首诗中使用了“菹”字，且都是泡菜之意。

苏辙《寄孙朴》^{[7]172}诗云：“羨君不出心自如，北潭秋水多芙蓉。青荷包饭蒲为菹，翛然独往深渊鱼。”苏辙羡慕孙朴隐居不仕，像深渊鱼似的独来独往，而居住的北潭又有很多荷花，可以用荷叶包

饭吃，用蒲瓜做泡菜吃。

苏辙《舜泉诗》^{[7]417}诗云：“匪泉实来，帝实顾余。执其羔豚，苹藻是菹。帝今在堂，泉复如初。”苏辙任职济南时，遇大旱而泉城的泉水都枯竭了，又明年夏，大雨滂沱，泉水复出，因作此诗。诗的大意是说：不是泉水充满了才流出来，而是舜帝眷顾我们啊！泉水像抓手一样抓住小羊羔和小猪仔，像泡菜一样着泡着白蘋和水藻。虞舜外出又回到了他的住宅，所以舜泉又和当初一样喷涌不息了。

三、苏东坡有关“酢”的诗文

尽管把“菹”解释为“酢菜”，但带有“酢”字的诗文却不一定与“泡菜”有关。

（一）“酢”为报答之意，与泡菜无关

首先，“酬”与“酢”组合以“酬酢”一词出现。“酬酢（chóuzuò）”指主客相互敬酒，泛指应酬。主酌以敬宾曰献，宾还答曰酢，主复答敬曰酬。如《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独酌》^{[5]3788}：“翠柏不知秋，空庭失摇落。幽人得嘉荫，露坐方独酌。月华稍澄穆，雾气尤清薄。小儿亦何知，相语翁正乐。铜炉烧柏子，石鼎煮山药。一杯赏月露，万象纷酬酢。此生独何幸，风缆欣初泊。……”苏轼元祐六年（1091）十月十四日作于颍州。言翠柏不随秋至而凋零，所以在我空空的庭院感受不到秋天的到来。但我却得到一块美好的树阴，坐于室外露天之下。在笼罩的薄雾里，月光如水，澄净柔和。小儿哪里知道老夫我的快乐呢？我在铜炉下烧柏枝，在石鼎里煮山药呢。举杯向明月和露珠敬酒，万物纷纷向我敬酒。在充满风险的官场能暂时休假，乃一生的幸事，如风浪中的船只刚刚靠岸停泊。其它诗文还有：

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5]1231}

庆博学通古今，善为诗，至于持律总众，酬酢事物，则师密相之也。——《宝月大师塔铭》^{[5]1606}

使者见其容，未闻其语。其综理庶务，酬酢事物，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德威堂铭并叙》^{[5]2175}

其于酬酢往反，盖尝和矣，而未尝敢倡也。——《答舒尧文二首》^{[5]6180}

其次,“酢”单独出现,但为“酬酢”之义。如苏轼元丰五年(1082)七月作于黄州的《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二)^{[5]2384}云:“敲冰春捣纸,刈苇秋织箔。栢林斩冬炭,竹坞收夏箨。四时俯有取,一饱天所酢。”言敲冰、捣纸、刈苇、织帘、伐木、烧炭、收箨,四季皆有收获,这是上天的回报。攸,长。酢,报答,谓以长寿报答。例如《诗经·小雅·楚茨》:“万寿攸酢。”

再如《祈雪雾猪泉祝文》^{[6]6946}:“噫嘻我民,何辜于天,不水则旱,于今二年。天未悔祸,百日不雨。雪不敛尘,麦不盖土。天子命我,祷于山川。侧闻此山,神龙之渊。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酢。”翻译为:啊!我大宋的黎民,他们哪里得罪了上天?水旱灾害相继而来,至今已有两年。上天丝毫没有悔改之意,接连百日滴雨未下。地上的雪压不住飞尘,麦苗盖不住土壤。如今我受天子之命,向山川之神祈求祷告。我曾听说这座山,乃神龙憩息的地方。我向你鞠躬致礼叩头下拜,向你请求一勺的雨水。如果能降下一尺厚的白雪,我将用三牲美酒来祭奠你。苏轼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作于徐州。酢,报答也。

再如《酒子赋》^{[5]70}云:“顾无以酢二子之勤兮,出妙语为琼瑰。”

(二)“酢”为“醋”本字,与泡菜有关

苏轼《棕笋》之《叙》^{[5]3677}云:“棕笋,状如鱼,剖之得鱼子,味如苦笋而加甘芳。蜀人以饌佛,僧甚贵之,而南方不知也。笋生肤毳中,盖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间可剥取,过此,苦涩不可食矣。取之无害于木,而宜于饮食,法当蒸熟,所施略与笋同,蜜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以饌殊长老。”元祐六年(1091)初作于杭州。棕笋,棕榈之花苞,苞中有细子成列,乃花之孕也,状如鱼腹孕子,谓之棕鱼,亦曰棕笋。棕鱼皆言有毒不可食,而广蜀人蜜煮醋浸,以供佛寄远,乃制去其毒尔。“酢”为“醋”之本字。

再如《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五十三)^{[6]5949}:“轼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近日忽大作,百药不效,虽知不能为甚害,然痛楚无聊两月余,颇亦难当。出于无计,遂欲休粮以清净胜之,则又未能遽尔。但择其近似者,断酒断肉,断盐酢酱菜,凡有味物皆断,又断粳米饭,惟食淡面一味,……”翻译为:我很早就受痔疮之苦,已经二十一年了。

近来忽然猛烈发作,用什么药都不见效,虽然也知道不会有大的危害,但疼痛无奈两个多月,也实在是难忍。出于无奈,于是打算停止吃粮食用腹内清静来克制它,却又不能一下子做到,只能选择近似的做法,先断酒断肉,断盐醋酱菜,凡是有味的食物,全都断掉,又断了粳米饭,只食淡面一种饭食。苏轼绍圣二年(1095)六、七月之间作于惠州。“酢”为“醋”之本字。

再如《海漆录》^{[6]8405}:“……吾久苦小便白胶,近又大腑滑,百药不差。取倒黏子嫩叶酒蒸之,焙燥为末,以酢糊丸,日吞百余,二腑皆平复,然后知其奇药也。因名之曰海漆,而私记之,以贻好事君子。明年子熟,当取子研滤,酒煮为膏以剂之,不复用糊矣。戊寅十一月一日记。”翻译为:我长期苦于小便白浊,最近又患大腑滑,服很多药都没治好。后来把倒粘子的嫩叶用酒蒸过,焙干研成末,加醋制成丸,每天服百余粒,两种病都治好了,我这才知道倒粘子是奇药。于是叫它海漆,我私下记住,以便将来赠送给好事的君子。明年倒粘子成熟后,我就把它的果实研滤,用酒煮制成膏,不再用糊了。戊寅十一月一日记。苏轼元符元年(1098)十一月一日作于昌化军。“酢”为“醋”本字。

通过分析我们可知,苏东坡与泡菜相关的诗文,没有我们所期待的经典语句或者有趣故事,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天才全能。

注释

- [1] 朱熹注:《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 [2] 许慎著,班吉庆、王剑、王华宝点校:《说文解字校订本》,江苏:凤凰出版社,2004年。
- [3] 《康熙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 [5]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6]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7]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16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赠砚亭与还砚亭

陈坚体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雷州半岛上一个村落中的苏轼遗迹——赠砚亭和还砚亭，以及有关的传说故事。

关键词 双村 赠砚亭 还砚亭

双村是雷州半岛上的一个村落，因苏轼遗迹的有关传说而倍受关注。

双村的东坡文化可谓源远流长。赠砚亭与还砚亭，是双村东坡文化的源流、传承的历史见证，彰显着东坡公的圣德高行。赠砚亭建于九百多年前的宋徽宗崇宁年间，是谓“源远”；还砚亭建于民国庚午之岁，已历宋、元、明、清，约八百多年，斯谓“流长”。

赠砚亭

宋哲宗元符三年，66岁的东坡公幸遇恩赦，从九死一生之南荒之地坐船北归。途经北部湾兴廉港（即今之乐民港），风雨载途，船不能行，苏公只好舍舟登岸，投宿在兴廉村净行院。

当时我双村五世祖陈梦英公正在净行院中延席讲学，有缘与苏公萍水相逢，而两公一见如故，两心相印，遂为道义之交。在40天的交往中，苏公先为我五世祖选择了双村这方狮子宝地为聚族开基之所。又在其贫困潦倒之时，倾其所有，置良田7亩赠与我祖，曰“助贤田”。苏公重我祖风节，在临别时将随他宦海沉浮数十年的汉石渠阁瓦砚赠送我祖梦英公。其砚大瓦形，黄褐色，长22.7厘米，宽19厘米，厚2.5厘米。苏公在砚台上镌刻砚铭八句，分为四联。首联介绍瓦砚的质地及其形状特色；颌联介绍瓦砚的出处；颈联说明瓦砚成因；尾联苏公殷切寄语，诚望梦英公世代子孙传承宝砚，勤读书诗，永绍书香。英公喜得墨宝，珍同

拱璧。为仰苏公赠砚大德，梦英公与家族商议，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在兴廉村净行院西边建立赠砚亭，以志其事而告后嗣于无穷。亭中有“福地留仙”、“启迪蒙童”、“助友择居”、“赠宝惜别”四幅石刻画图及其所配诗文，以传苏陈结义之雅事。诗曰：

永仰高贤赠砚亭，
亭观砚宝启文明。
苏公懿德垂洪范，
士子千秋作景行。

梦英公于宋徽宗崇宁三年间卜族双村，垂统益裕。序源流，分六房，蔚为三雷望族。为有瓦砚之灵光宝气，双村之先人在宋、元、明、清历朝科举考试中，笔花似春花竞发，文运与命运同昌。考取进士、举人、秀才的约有八、九十人。

明朝万历年间，双村第十四世祖与第十五世祖父子俩皆中解元，朝赐“父子占魁”金匾，高悬庙堂，光宗耀祖，实为儒林中一大殊荣。

清末，双村陈树勋公、陈树钟公两兄弟同年考中秀才。年仅十三岁的树钟公虽中秀才，但仍偕同伴到水边钓鱼，被称钓鱼秀才。

还砚亭

时至清末，宝砚失传将近百年，族人四处寻找，杳无踪迹。

民国庚午之岁（1930），徐闻县时任广东省公安局长之何萃公，忽在乡间购获此砚，为之大喜。何萃公把双村时任广东省警察局秘书的陈树钟公叫到他家，拿出宝砚对树钟公说：“苏公赠砚之德，衣被百世，我非常敬佩；我与你之交情日笃，所以我不能将宝砚据为己有，今还归君族，希望不再遗失。”（下转第61页）

苏轼书法的“特质”剖析

张 斌

内容提要 苏轼书法在继承中创新，他深得晋韵、唐法的书法精髓，并逐渐形成宋尚意的书法风貌，开一代书风之先河。苏轼书法中“信笔处有情感”、“超迈处有气度”、“尚意处有底蕴”等诸多特质，使他成为“宋四家”之首，中国文人书法的一面旗帜。

关键词 书法特质 信笔 超迈 尚意

中国书法尤其是文人书法，在线条、结体、章法之外，更有情感注入笔墨，形成个人鲜明的“特质”，让学习者、追慕者如醉如痴，沉浸其中。苏轼，便是具有鲜明“特质”的文人书法家中重要代表之一。

苏轼书法取法王羲之、李北海、颜真卿、杨凝式等人。黄庭坚《山谷题跋》：“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其书法作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和小行楷《赤壁赋》。两帖均出自其“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期间，苏轼在经历人生大起大落的洗礼后，在富赡流丽、丰满生动的字里行间，忽然注入一股缠绵悱恻、飘逸灵动的涓涓细流。正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人生际遇，使他的书法变化莫测，出神入化。

苏轼书善则善矣，然千年来学习苏轼书法少有登堂入室者。正如清代书画家钱泳所说：“余年过五十余，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病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因此，他甚至认为：“（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其观点似有偏颇，但苏轼书法确实难学，已是共识。苏轼天资聪颖，随手写来，修短合度，浑然天成。他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他的书法“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得晋之韵、

唐之法，并开创宋之意，其玄妙自不可言，故难以企及。现就苏轼书法的“特质”，谈三点感悟。

一、情倾笔端、意于笔先的“信笔”特质最难把握

众所周知，书法和其他任何艺术一样，都是有法度可循的，可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不可以没有法度的信笔挥洒。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论用笔》里说：“东坡书笔俱重落，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董其昌所说的东坡信笔“特质”，是苏轼书画法度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我书意造”，是“无意于佳”而神采飞扬。

书法，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书法尚意，苏轼滋味犹浓。然韵可追，法可循，意不可学。而“意”往往就存在信笔处。“意”是书者当时的情思勃发，是真性情跃然纸上。如果学习者除了追求形似、神似外，还要把字里行间的“意”写出来，那只有一个路径：了解当时的写作背景，身临其境、心手两忘，“无我”地去临习。字里行间，见情见性，才算临习到家了。以苏轼《黄州寒食诗帖》为例，我们需要了解它是写于宋元丰五年（1082），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生活上的穷困潦倒和政治上的失意，让他感到落寞无比，于是在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写下了《寒食雨二首》，诗云：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书写此卷的时间大约在翌年，或元丰七年离开黄州以后。其诗苍劲沉郁，饱含着生活凄苦，心境悲凉的感伤，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其书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故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之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笔酣墨饱，神充气足，巧妙地将诗情、画意、书境三者融为一体，体现了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创作状态。难怪黄庭坚叹曰：“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苏轼“无意为书家”的书法作品，其信笔处往往是情在胸中，意在笔下，心手相畅的结果。其酣畅淋漓表现出来的“烂漫”，清代书法家包世臣认为“在东坡，病处亦觉其妍，但恐学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故其信笔处，乃难学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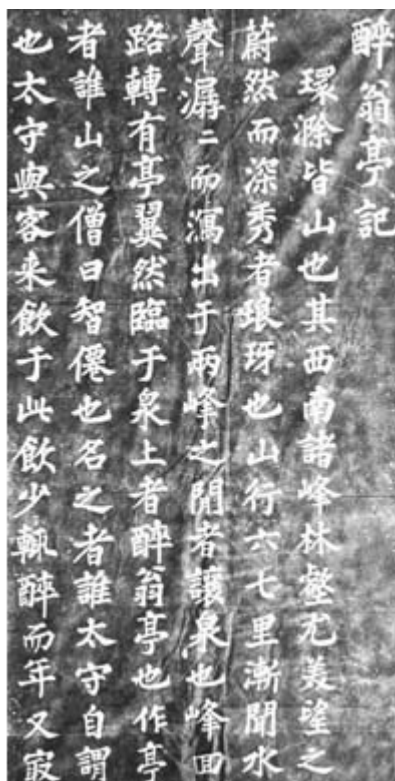
二、文曲下凡、大笔纵横的“超迈”特质最难企及

苏轼书法里还裹挟了其雄文大笔的气魄，故其书法肉丰而骨劲，宽博而秀伟。理学家朱熹说苏轼“笔力雄健，不能居人后，故其临帖，物色牝牡，不复可以形似较量，而其英风逸韵，高视古人”。

正如朱熹所说，后世对东坡书法追慕成风，然其超迈处人们总是无法逾越。雄才伟略的康熙皇帝年轻时便仰慕苏轼，酷爱苏轼书法“以跌宕取势，以雄秀取态”的特质。康熙早年有《御临苏轼中吕满庭芳》，用笔丰满肥腴，结体扁平，笔画舒展，轻重错落，尤其是苏字向右上倾的结体特点，表现极其到位，但终归没有能临出其恢弘气势来。清代书法家吴德旋说自己“余年三十余始留意书学，即好东坡、思白（董其昌）二家。而苦无入处”。他感到“东坡笔力雄放，逸气横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由此可见，苏轼书法的超迈处，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呈现出“虽枯亦润，虽瘦亦肥”

的境界。

我们不妨看看苏轼书写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此碑宋刻在安徽全椒县，四川眉山三苏祠有当代的重刻本。1998年，我到三苏祠考察，见到了眉山重新镌刻的《醉翁亭记》，深深被其神采和气势所震撼。此碑书于欧阳修逝世后近二十年，欧阳修慧眼识金，是苏轼的恩师，二人情同父子。故苏轼蘸着浓浓的感情来书写，用笔厚重，结字缜密，感情充沛，气度非凡。此书法有贴近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潇洒纵横，也有苏轼外柔内刚，绵里裹铁的气脉，二者巧妙地融合为超迈大气的“特质”，堪称“双绝”的艺术精品。其成功在其笔下，更在其思想和境界的深处。



千年一遇的苏轼，其才学和胸襟，将他的书法植根于骨髓，萌芽于幼学便存乎于胸的大义，挺秀于巴山蜀水，成熟于既居庙堂之高又处江湖之远而养成的浩然正气和担当责任，故其“超迈”实难企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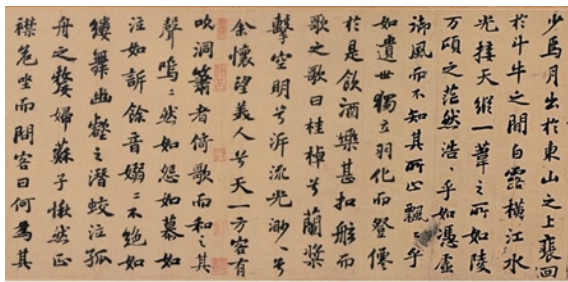
三、博学约取、变革求新的“尚意”特质最值得学习

艺术不是一滩死水，艺术的成功要“为有源头活水来”。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各自时代文化特质的艺术展现，这也是艺术为时代接

受的必然要求。苏东坡的艺术价值取向与创作心态是和积学深至、不断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他在《评草书》中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在《书吴道子画后》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体现出苏轼强烈的变革求新思想。

苏轼从传统中广泛吸收营养，其书法中的许多特点都可以在前辈书家中找到根据。然而苏轼高人之处在于他能食古而化，知法而变，勇于和善于创新，终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学古人轻形求意，在《石苍舒醉墨堂》中明确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极力称扬尚意书风。宋代崇尚的是“亚圣”颜真卿的书法，蔡襄、欧阳修、司马光等，都以颜真卿为宗，他们在继承与创新中，未能摆脱唐代书风。首开宋一代“尚意”书风的，就是苏轼。

苏轼元丰五年（1082）与友人畅游赤壁，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赤壁赋》。此赋用笔锋正力劲，在宽厚丰腴的字形中，笔力凝聚收敛在筋骨中，此谓“纯绵裹铁”。这种力又往往从锋芒、挑踢、转折中闪烁出来，就像宽博的相貌中时有神采奕奕的目光流观顾盼。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苏轼选用行楷表现出一种静穆而深远的气息。明董其昌赞扬此书墨法：“每波画尽处每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传耳。”《赤壁赋》书卷表现出的特点是字形扁阔丰肥，左秀右枯，用墨必浓，成为苏轼有别于前期书法，也有别于前人书法的苏体特点。



当今的书法创作，更注重创新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道的，而很多书法家不注重“字外功夫”，更无法准确把握和选择“尚法”、“尚意”和“尚态”。书法艺术像金字塔一样，塔有多高，根基就要有多大。我记得读中学时，一位学富五车的老师说学习要“文史哲不分家”、“诗书画印不分家”。专家不是大家，大家必是杂家，我觉得十分有道理。

苏轼在《柳氏二外甥求笔迹》里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他告诫学书者：“作字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

终不能尽妙。”字是要下工夫练的，但如果只知埋头写字而不知读书，则只能成为书匠，而不能成为书法家。也就是说，书法的“门槛”绝不仅仅是书法本身。苏轼的书法里，包含了苏轼的诸多修养，学好苏轼书法，除了观其诗书画论，走入他绝妙天下的艺术世界外，还要体味他充满乐观精神的生活态度，充满担当的人生气派，充满真知灼见的人生智慧。

（张斌（珂雪石），栾城县苏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河北）苏东坡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上接第58页）当时树钟公惊喜万分，诚惶诚恐，谢了又谢，才把宝砚抱回。为光何莘公慨然还砚之大义，经族人商议，建还砚亭，以垂纪念。

亭联曰：

还砚永传坡老墨，

望亭常仰祖先型。

双村自民国至今的梦英公后昆，绳其祖武，立志读书，大学毕业的一百多人，仅一家就有十二名。教师有一百多人，仅一家就有十名，故双村是闻名湛江市的教师村。

今日之还砚亭，已成为“河头镇中小学生学习文化教育基地”、“河头镇中小学生学习德育示范基地”。近年，附近不少学校师生，乃至湛江市不少师生，以及上面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名流，都到还砚亭来缅怀东坡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亮节高行，学习东坡公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之达观精神，以及热爱社会、热爱人生的乐观进取精神。

尤其是广州军区盖云龙司令，于2012年8月23日莅临还砚亭，景贤仰圣，为目睹先贤之千年遗宝而大快平生，并感慨人有奇缘，乃至撰文抒怀，资资护宝，传为佳话韵事。

还砚亭将成为湛江市东坡文化旅游景点，进一步弘扬东坡文化。

（陈坚体，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河头镇双村村民）

读《东坡志林》（七）

徐 康

舒徐散淡的潇洒境界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1]寻张怀民^[2]，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3]，水中藻荇交横^[4]，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5]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记承天夜游》^[6]

注释

[1] 承天寺：当时的著名佛寺，在今湖北黄冈市南。

[2] 张怀民：即张梦得，清河（今属河北）人。苏轼的朋友，时亦谪居黄州，寓居承天寺。

[3] 空明：形容水的澄澈。在这里形容月色如水般澄静明亮的样子。

[4] 藻荇交横：藻，水草的总称；荇，指荇菜，一种多年生水草。藻荇交横，指水草、水藻等植物交错生长。

[5] 闲人：苏轼其时谪贬闲居于黄州，故自称“闲人”；此语亦另有所指，见赏析部分。

[6] 本篇系苏轼于元丰六年（1083）十月十二日作于黄州。

赏析

这篇短文，全文仅八十五字，历来被认为是苏东坡的小品杰作，堪称精短美文也。

此文所记为元丰六年（1083）之事。此前三年，即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横遭陷害，获罪下狱，九死一生。后贬官至黄州，担任团练副使。他在黄州贬所，开初是“随僧蔬食”；到

第二年二月，故人马正卿哀苏轼乏食，为他申请到郡中官署故营地数十亩，使之能躬耕其中，这块营地名曰“东坡”。到元丰五年（1082）二月，苏轼于东坡筑雪堂，自书“东坡雪堂”，并向一位住持长老乞得桃树数株栽于该地，从此自号“东坡居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以其潇洒之气质与旷达之心胸，很快在逆境中安定下来，自元丰四年（1081）始，写作了大量诗文，如《东坡八首》、《方山子传》、《论语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赤壁怀古》、《临江仙·夜归临皋》、《赤壁赋》、《后赤壁赋》、《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等，多为传世佳作。

这篇《记承天夜游》，便是作于元丰六年（1083）的一篇美文短章代表作，记他与时亦谪居黄州的朋友张怀民月下夜游承天寺的独特感受。其时苏轼四十八岁，正值创作的成熟期与丰收季。此文更能突出地体现他鲜明的个性色彩，即坎坷境遇中的旷达与潇洒。试想，苏东坡以贬官流放的待罪之身，而能不戚戚于险途，不汲汲乎名利，不心浮气躁，不怨天尤人；于“解衣欲睡”之时，竟然有如此难得的好心情，偶为月色所诱，便突发奇想，欣然起行，寻友于寺中，恰友亦未睡，于是相与信步于闲庭。而且，居然有如此雅兴，尽情发挥想像，将满庭月色“看”作“积水空明”，将竹柏树影“视”为水中“藻荇交横”。这是何等的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又是何等的任性率性，落拓不羁。尤其是文中最末一段的感叹：“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是“闲人”眼中的清朗的月

亮、苍翠的竹柏。这里的“闲人”与平常口语中一般的“闲人”，是具有不同的含义的。一方面苏东坡因“贬官”而闲，是不得已而“闲”，这“闲”字含有东坡对于命运的惋叹和对于时局的讽刺：我原有职有位亦有为，而今何故遭“闲”置？另一方面，苏东坡开朗的性格又使他安命于“闲”，甚至庆幸于“闲”。文人的忙中得闲，确乎难得，也实在值得珍惜。东坡大半生陷于仕宦庶务，官场应酬，人际纷繁，生活羁绊，试问又几时有过真正的“闲”时？所以，作为此文结句的“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也是一种安常顺命、乐观自适的庆幸之叹。古人有“淡泊明志”之说，此处的“闲”，亦带有“淡泊”之意。其实这里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自己与张怀民适逢风华正茂之时，却被迫“闲”居于此，不能为国出力，如此“闲人”，岂能真“闲”？不过从现实的情况出发，正因为苏东坡是学识渊博、教养深厚的大文人，才能由淡泊而淡定，才能在这种特定处境下随遇而安，而且心胸开朗地用独特的眼光，去欣赏“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错，盖竹柏影也”的月下景致。这应当看作苏东坡的旷达心胸，对于月夜风光的一种“闲赏”，一种优美恬淡的诗意折射。

这篇短文写得舒徐散淡、自由随意，但没有苏东坡那样厚实的文学功底与丰富经历，没有他那种处变不惊、动中取静的潇洒心境，是难以运用如此精练之文字而达到这样高超的境界和水平的。

“随遇而安”的豁达与恬适

予尝寓居惠州嘉祐寺^[1]，纵步松风亭^[2]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3]，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4]，当甚么

时也不妨熟歇。——苏轼《记游松风亭》^[5]

注释

[1] 惠州嘉祐寺：据《苏轼诗集》卷四〇《迁居·引》：“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据本文开头“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之句，本文当作于迁出嘉祐寺后。

[2] 松风亭：在今广东惠阳县东。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亭在弥陀院寺后山之颠，始名峻峰，植松二十余株，清风徐来，因称松风亭。”亭今犹在，为后人重修。

[3] 木末：树巅。此喻指亭宇之高。

[4] 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前进（则容易）被敌军打死；后退（则容易）被军法处死。

[5] 本篇系苏轼于绍圣二年（1095）十月二日作于惠州。

赏析

苏东坡晚年曾遭政敌章惇陷害，一贬再贬。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惇为相掌握大权。当月，御史虞策、来之邵联名诬告苏轼“讥讪先帝（神宗），诋斥先朝”，贬苏东坡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县）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东坡当年十月到惠州贬所，初寓合江楼，后移居嘉祐寺。此时东坡年近六十岁，然而凶险的政治陷害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未折损他的生存意志。当他吃上惠州荔枝时，就曾难掩欣喜之情地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他寓居广东惠州嘉祐寺时，还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的短文《记游松风亭》。

百余字的短文，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纵步亭下，足疲欲歇；第二层：望亭兴叹，何时能到？第三层：忽而自叹：“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第四层：“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这四个层次，即文章的起、承、转、合。其中，以第三层“转”与第四层“合”最为重要。第三层自言自语的反问：“这

里有甚么歇不得呢？”是一种自我调适，或曰自我解脱。这也是对“歇不得”思维定势的反诘，其结果是过渡到第四层，豁然开朗——就好像挂在钓钩上的鱼儿，忽然脱离了钓钩，自由自在。这个比喻既生活化，又形象生动，而且十分贴切，让人们体会到东坡“忽得解脱”的轻松逸然之情。

经过这一番自问自答的反思和总结，东坡更深层次地想到的，就不止是对于游程艰辛的思索，而是由此而悟及“兵阵相接”的战场情景了——鼓声急如雷霆，若前进会死于敌人之手，若后退会死于被自己营垒的军法处死，当处于这样的時候，也就不妨好好地歇息一下。

这便是作者所倡导的“随遇而安”、“闲适自处”的旷达思想。

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旷达思想既来自东坡的经历和遭遇，更凸显东坡的精神境界。苏东坡在经历了冤狱、贬官等多种磨难之后，并不是走向消极、颓唐，万念俱灰，而是走向随遇而安的旷达与解脱。这从他此后的一些诗章名句，譬如“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譬如“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譬如“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可以看出，其思想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旷达乐观的非凡胸襟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1]，亦曰螺蛳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2]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3]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4]二里许，有王逸少^[5]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6]，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

暮雨子规啼^[7]。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8]。”是日剧饮而归。——苏轼《游沙湖》^[9]

注释

[1] 沙湖：在黄冈县东南三十里。

[2] 相田：“相”与“相亲”之“相”同义，相田即察看田地的好坏，以决定是否购买。

[3] 庞安常：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蕲（qí）水县人。家为世传之医。安常自幼读书过目不忘，曾熟读《灵枢》、《太素》诸书，著有《伤寒论》等。为人治病，救人无数。元丰五年，苏轼得臂疾，求医于庞，一治而愈，之后常有往还，交情甚笃。

[4] 蕲水郭门外：蕲水，县名，唐天宝年设置，历代因之。宋属淮南西路蕲州，故址在今湖北蕲春，今为湖北浠水县。郭门外，城门之外。

[5] 王逸少：王羲之（303~361），字逸少，晋琅琊（今属山东临沂）人，居会稽山阴。司徒王导从子。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习称王右军。自少即研习诸名家书法，备精诸体，草、隶、楷、行均能博采众长，自成一家。羲之书自六朝以来即为朝野所重，唐太宗酷爱羲之及其子献之书。羲之书艺影响深广，世称“书圣”。

[6] 兰溪：《太平环宇记》卷一二七《蕲州蕲水县》：“兰溪水源出箬竹山，其侧多兰。唐武德初，县指此为名。”又《方輿胜览》卷四九《淮西路·蕲州》：“兰溪，在蕲水县产竹之地。”

[7] 子规：杜鹃鸟，亦称杜宇，相传为蜀王望帝之魂所化，鸣声凄婉，后世多以“子规啼”隐喻思乡怀人心切。

[8] 休将白发唱黄鸡：黄鸡典出唐代诗人白居易《醉歌》：“……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苏轼这句诗中，用了“休将”，对白居易的徒然自伤白发，悲叹人生衰老是持否定态度的，表达了旷达乐观的非凡胸襟。

[9] 本篇系苏轼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中旬作于黄州。

赏析

在历经“乌台诗案”，遭逢九死一生的灾难之后，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被责授为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在他的人生履历中，算得上一次落差较大的境遇。然而他却以“戴罪”之身，依然旷达如常，乐观如故。此等心境，体现在他的若干游记诗文之中。前面谈到的《记承天夜游》算一例，这篇作于黄州贬所的《游沙湖》，则是又一显例。

沙湖，在黄冈县东南约三十里，又名“螺蛳店”。苏轼因去沙湖看所买之地，不慎染病在身，臂肿剧痛。闻听麻桥人庞安常善医，于是前往求治。安常亦名安时，自幼读书即过目不忘，家为世传之医，年少时即熟读《灵枢》、《太素》诸书，为人治病，救人无数。他是个聋子，然聪明而思路敏捷，超过常人，就诊者只需拿一张纸将病情写画一番，写不了多少字，他便能很快地了解人意，对症下药。于是，苏东坡和他开玩笑说：“我以手比画，代替说话；你以眼看字，代替耳听。这都是称绝一时的‘异人’之举啊！”他的病很快就被庞医生就治好了，于是结伴同游清泉寺——这便是这篇游记的起因。

接下来，东坡用极简练的笔法，描写了清泉寺的风景：寺不远，就在蕲水城门外二里多路，那里有著名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洗笔泉”，流水非常甘甜清澈，下临一道清冽的溪水，因其水侧多兰而得名“兰溪”。奇怪的是，这溪水不是往东而是往西流去。他们沿溪饮酒游览，可谓快乐至极也。东坡兴之所至，作《浣溪沙》词咏兰溪曰：“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一作“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此词上阙“子规”，指杜鹃，亦称杜宇，相传为蜀王望帝之魂所化，啼叫声甚为凄婉。后世诗人多以“子规啼”隐喻思乡怀人之心切。下阙“谁道

人生无再少”，本古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反其意而用之；“流水尚能西”亦本古诗“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反其意而用之。“白发黄鸡”，唐白居易《醉歌》及《初见白发感秋》诗，用“白发黄鸡”以喻世事匆迫、光景催年之意，苏轼用“休将白发唱黄鸡”，意即勿以老之将至为悲，其情调是积极乐观的。这里须指出的是，苏轼极喜白（居易）诗，不但耳熟能详，还常能不拘原旨，别出新意，或反其意而用之，这一首著名的《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词，便是显例。

这首“口占”之词，上阙三句写景，下阙三句抒怀，上下契合，可谓天衣无缝。尤其是下阙的三句，抒发了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由兰溪水的由东向西，感叹人生也可能（逆反地）由老年返回到少年时代。作者借用白居易《醉歌》中感叹人生易老的诗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摧年酉时没”），反其意而用之，主张不要徒然自伤白发，悲叹衰老，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非凡胸襟。尾句用“是日剧饮而归”作结，亦反映了东坡的豪放之情。诗中表现的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后人评价甚高。程洪《词话辑评》曰：“坡公韵高，故浅浅语亦觉不凡。”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曰：“愈悲郁，愈豪放，愈忠厚，令我神往。”所见极是也。

（徐康，四川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现名誉副主席，一级文学创作职称）

诗吐苦寒，书抱天真

刘川眉

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自问世 900 多年来，一直为古今中外众多学者、书家和爱好者热捧，研究、赏析、临习者不绝如缕，其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本文不打算重复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只想就诗帖中“诗”和“书”所传递出的当年东坡心境的原始信息，分别作一番粗略的比较解读，试图对其诗、书创作时的不同心境加以辨析，以窥探东坡谪居黄州后痛苦“大转身”的心路历程。

一、幽独苦寒之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未止。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寒食雨二首》^{[1]2341} 写作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三月五日寒食节。时东坡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已是第三个年头了。

先看第一首诗——

此诗共 12 句，按内容前后各 6 句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起首平淡舒缓，如同面对一个老朋友闲话家常。前两句紧扣诗题“寒食”，交代自己来

黄州的时间。紧接着后四句，因寒食节很自然地转到春天的时令。先写年年想留住春天却又无可奈何的惜春之情，“不容惜”三字，既表现出大自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情规律，又道出了自己身不由己的谪居现实。然后，作者从春来春又去的慨叹转换到当下，定格在元丰五年的春天：“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一个“苦”字，道出今年春雨的不同寻常：连续下了两个月，整个天地如同提前进入了萧瑟之秋。第二部分，前四句从天地间转到具像之物——海棠花。借杜甫诗意和庄子语意，以幽独高洁红中透白如燕脂的海棠花自喻。可是，经风吹雨打迅速凋萎的花瓣却身陷泥污，有如被造物主偷偷在夜半背负而去。结尾两句以白头病少年比拟匆匆凋谢的海棠花，惜花伤春是表，借花自怜是实。

这第一首诗不过是一支序曲，还只是第二首诗的一个过渡和铺垫。

再看第二首诗——

起笔两句接前诗的春雨，写自己的风雨栖居所。当时，东坡一家住在长江边上的一个简陋驿站——临皋亭中，他在《与司马温公五首》（其三）^{[2]5371}中说：“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因连月春雨，导致江潦暴涨，波涛汹涌的春江似乎要破门入户。接下来两句以烟雨濛濛中的小舟比喻栖身小屋，极言栖居外部环境的萧索荒凉；后面两句则回到屋内：空荡荡的厨房不外寒菜当家，破旧的灶膛里只有湿苇难烧。“空”“寒”“破”“湿”四个形容词在句中特别刺眼，生活之艰不言而喻。下面两句是一个倒装句式：看见屋外有乌鸦衔着纸钱，才想起今天是不能动烟火的寒食节。接着两句写因谪居而产生的进退两难的感慨，最后两句借阮籍逢末路痛哭而返典故和杜甫“冥心若死灰”诗意，

表明心迹：既已是穷途末路，便心如死灰，不复有他念了。

这两首诗向我们传递出这样一组信息：

谪居黄州两年来，特别是在元丰五年三月这个春天里的秋天，作者形同委地海棠，状如白头少年，栖居风雨飘摇的小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欲忠君报国无门，想回乡尽孝不能，进退维谷，穷途末路，长歌当哭，心如死灰……诗名寒食，苦寒意象叠出：萧瑟、病少年、空庖寒菜、破灶湿苇、乌衔纸、坟墓、途穷……特别是最后出现了“哭”这个似乎有失大丈夫体面尊严的词，还有“死”这个极尽晦暗阴冷的词，这在东坡诗文中是罕见的。显然说明，作者贬谪黄州两年多来虽一直“深自省察”（《黄州安国寺记》^{[2] 1237}），等待君恩布施重返庙堂的那一天，可春来春去望眼欲穿，依然杳无音讯希望渺茫。故此时此地的他，自认不仅跌入了仕宦生涯的最低谷，而且陷入了人生的绝望之境。

二、天真烂漫之书



如果说东坡的《寒食雨二首》是苦寒之诗、幽独之吟的话，那么《黄州寒食诗帖》则是天真烂漫之书、尚意自然之作。

第一首诗总体诗思平和，诗意舒缓，于是作者走笔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前三行落笔沉稳，运笔平和，每排字数相当，大小匀称，点画一丝不苟，只有第一个“年”字有长笔悬针。后四行转入借花抒怀，笔势随诗意有了起伏，“萧瑟”、“海棠”、“暗”、“偷”等字出现膨胀，“花泥”、“暗中”两个字组甚至开始出现游丝，但总体仍如轻波微澜，情绪明显有所按捺抑制。

第二首诗思陡转，不再敛藏，诗情如春江浩荡，似风起云涌。诗人的情感流由徐渐急，叹栖居之陋，诉生活之艰，怨君门之深，怅家乡之遥，效穷途之哭，表死灰之心……于是作书心忘于手，手忘于笔，笔步情走，势随意流，字体或大或小，字势或正或欹，结字或收或放，造型或庄如佛像或险若巉岩，

布局或密不透风或疏可跑马，一气贯下，自然天成。

“破灶”二字的敦实厚重，“衔纸”二字的潇洒摇曳，“哭途穷”三字的凝重豪逸，各有情致，书趣盎然。特别是“死”字，用笔丰腴，左下挑与右上点顾盼生姿，跌宕成趣，可谓把一个僵硬的死字写活了，有血有肉地站了起来。

《黄州寒食诗帖》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信息：

其一，此帖是东坡自己书写自己的诗，从笔意墨趣和篇章布局来看，应该是在诗作完成之后的有意识书写，而非备忘似的简单抄录。至于书写的时间，历来有诗成当日之说，有第二年之说，有元丰七年离开黄州后之说。但从此帖不署名不钤印，也不署书写年月，只署“右黄州寒食二首”的尾题来看，东坡作此书时仍有“多难畏事”^{[3] 167}的戒备，有担心再一次陷入“文字狱”的谨慎。据此判断，此帖在黄州期间书写的可能性较大，但因无实证，这里不作定论。

其二，此书帖与诗作相比，创作心境迥然有异。我们知道，自书自诗的书法作品，由于诗和书都是来自同一个创作主体，可以通过诗情和书意的高度融合，最大化彰显原诗诗意，最大化提升书法作品的品质，让读者产生诗书并茂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荡，享有诗情和书意双重的阅读体验，继而获取尽可能多的作品信息。但是，中国书法本身是一种独特的视觉艺术，有所谓“书为心画”之说，可以通过汉字线条的组合造型、结构章法等，独立地折射出作者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反映作者书法创作时的情感心境，呈现与情感心境相生相成的文本品相。

从《寒食雨二首》来看，诗写得苦雨凄风，萧索悲凉，整个给读者呈现一幅寒雨寒居、寒菜寒鸦的苦寒画卷，分明想告诉我们：诗人已跌入人生命运的绝望深渊，对前途未来已不抱任何幻想。

然而细观寒食书帖，点画线条了无荒率之笔，提按顿挫如闻铿锵之声；字里行间气酣笔健，尚意自然，于稚拙中凸显天真，于平淡中蕴含烂漫；谋篇布局随心所欲，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全卷整体看上去，如夏日繁星璀璨的晴朗夜空，无丝毫苦寒之景，无些微颓唐之相，无丁点悲凉之情。清代书法家王文治诗云：“坡翁奇气本超伦，挥洒纵横欲绝尘。直到晚年师北海，更于平淡见天真。”清代书家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也说：“坡老笔挟风

涛，天真烂漫。”此帖似乎正应了两位书家中肯的评鉴。它分明告诉我们：如果说贬谪黄州两年来，作者一直“杜门思愆”（《到黄州谢表》^[2]²⁵⁸²），幻想有朝一日君恩浩荡重新得到启用的话，作此书时，已大彻大悟，不仅自拔于绝望的泥淖，走出了幽独苦寒的心境，而且如破茧之蛾获得新生，获得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且看，元丰五年的寒食节才刚刚过了两天，三月七日，东坡就在沙湖道上唱出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豪迈之声，一扫往日心中阴霾。没过几天，在蕲水清泉寺又吟出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观旷达之词。到了这一年的七至十月，他短短四个月内三访黄州赤壁，更是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

三、结语

《寒食雨二首》系作者于凄风苦雨中以绝望心境吟诵的幽独苦寒之诗。这两首诗，无疑是作者在元丰五年（1082）三月寒食节的苦寒之吟、孤独之吟、绝望之吟，充分反映了作者当时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对个人政治命运极度绝望的心境。但是，正如古人所言：绝处可以逢生，置之死地可以后生。也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哪里有危险，拯救之力就在哪里生长。而这种拯救的力量，这种绝地反击“向死而生”的强大力量，并非来自外部，而正是来自作者自身，来自作者那种随缘而动、无往不适的自我解脱能力。

《黄州寒食诗帖》是作者豁然省悟后以中正平和心境所作的天真烂漫之书。从书帖中，我们分明窥见作者坦荡的心胸和泰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可以这样理解，从“乌台诗案”中侥幸生还并经过贬谪黄州两年多的痛苦历练后，在度过了元丰五年三月身心双重的极度苦寒之后，在又一次直面死亡超越苦难之后，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的苏东坡，于元丰五年三月寒食节后豁然省悟，豁然解脱，其价值观、人生观和宇宙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仕途进退人生穷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如何实现人的存在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已坚信，自己的人生可以由自己重新设计，自己的命运可以由自己主动掌握。于是，一个旧我“死”去了，一个稚嫩的书生和单纯的才子“死”去了，一位卓越的文学艺术大师和

乐观旷达的生活大师浴火重生，而《黄州寒食诗帖》这幅最能反映作者当时情感心境的书法珍品，便是最有力的佐证之一。

注释

- [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2]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3]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34卷），北京：荣宝斋，1991年。

2014年10月8日于东坡老家眉山

（刘川眉，眉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书 名：古典诗歌研究汇刊（第十六辑 第九册），本册包括李新著的《雄笔映千古——贾至诗歌研究》和《苏轼知定州诗词赋全注及研究论稿》

主 编：龚鹏程

出 版：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4年9月第1版

开 本：16开

页 数：254页

定 价：第十六辑21册（精装）新台币32000元

襟期寥廓，风流辉映

——评徐康《〈东坡志林〉百篇赏析》

张国文

作家徐康生长于三苏故里眉山，对三苏尤其是苏东坡推崇备至。因东坡《赤壁赋》名句“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一苇斋”。“一苇斋”主人徐康，早年居所与纱縠行苏东坡旧宅一墙之隔，三苏之学，用“亲炙”一词以形容，可谓副实；东坡之风骨余韵，于徐康而言，可谓“夺胎换骨”。

徐康年逾古稀，却热情洋溢、痛快酣畅，乃东坡遗风；专擅奖掖后进、不择贤愚，亦东坡性情；老而弥坚，著述不辍，将一杆如椽老笔，舞得沉雄老劲，不遑他让，袭东坡稟赋。由徐康来对《东坡志林》（以下简称《志林》）选文、赏析，正合笔者所谓“专家之评”。

《志林》共五卷，载元丰元年（1078）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廿余年间，收文203篇。其间，东坡屡遭磨难却鸿篇巨制迭出，《志林》多记其出处。

徐康从中精收百篇，予以赏析。其赏析循“三步”：一、注之较详、较确；二、译之尚准、尚精；三、析之益明、益透。

版本选择至要，徐康取明朝赵开美所辑录之《志林》，参以众说，特重河北人民出版社之《苏轼全集校注》（20卷），相互印证，确保版本质量，解决了“注之较详、较确”的问题。

面对东坡作品，赏析需在细节上下功夫，一点点地展开，把量的工作做好之后，再拓展到更大的层面。徐康对《志林》的赏析，符合上述规律性要求。

第271页《盗不劫幸秀才酒》。徐康针对出现的生僻字，配以注音，体现人性化的一面。然后擅其所长，进行翻译。特别是“析”，既体现文中本意，又升华撰写者的理解，他这样“析”：

文章虽短，却颇具完整的故事性，三位人物各擅所长：一是幸秀才的名气。二是被劫官人的运气。三是盗贼的义气。从以上分析的三“气”，便足以见出苏东坡文章的扎实功底。短短的一百五六十十字，居然“塑造”了三种不

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人物，实堪称言简而意赅，文短而味长也。

徐康早年以诗名世，嗣后散文佳作迭出，再后又喜作赋，发诸巧思而俯仰多姿，种种因缘，成为创作赏析《志林》的上选。读其文，觉如相隔千年的两位智者，用眉山软语喁喁而谈，其妙处不一而足。

百篇文章，出自《志林》卷一39篇，其中“记游”12篇；“修养”7篇；“梦寐”6篇；“送别”6篇。卷二32篇，其中“道释”10篇；“异事”11篇。卷三22篇，其中“异事”11篇；“技术”6篇。卷四8篇，其中“人物”4篇。

“记游”最能体现东坡丰神，徐康全部选用。如《记过合浦》中，苏轼碇宿大海之中，茫然四顾而无所依托，毕生著述同历风险，不禁悲从中来，“太息”之后又接一“叹”，因发“吾何数乘此险也”之问，平静之中杂以忧愤、旷达、随缘诸般情愫变化；进而以“天”不欲此来宽解，抒发了穷途之中“必济”的乐观。典型的超越自我心理疗法，东坡凭此独门绝技，渡尽劫波，令人敬佩。徐康称赞说：“读到此篇中的‘桥梁大坏，水无津涯’，我们不妨联想他刚刚经历过的数年患难，将二者连缀而观之，我们体会到一位饱经沧桑、历尽艰险而又乐观自信的长者的旷达情怀，这实际上是东坡一生履险而又坚信‘吾辈必济’的乐观精神的写照。”此种评价，切中肯綮。

还有《记承天寺夜游》。一篇千古妙文如何析出新意？徐康从叙述东坡夜游的背景，介绍其作品开始：

自元丰四年（1081）始，写作了大量诗文，如《东坡八首》《方山子传》《论语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赤壁怀古》《临江仙·夜归临皋》《赤壁赋》《后赤壁赋》《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等，多为传世佳作。梳理很有必要。笔者当年为理清东坡黄州作品的先后，费力甚多而不果，不得已，只好前往黄州查核。

（下转第70页）

《苏轼知定州诗词赋全注及研究论稿》序

刘清泉

认识李新是在黄冈的餐桌上。其时，大家正在谈论苏轼开创了豪放词还是开创了豪放词派。李新的执著，给我深刻的印象。后来知道，他是保定学院教师，文学博士，其时着力研究杜甫。我不禁想到，著名学者张志烈、曾枣庄不正是研究杜甫转而致力于研究苏轼吗？2010年12月，定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成立，拟出定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丛书，以作为苏轼知定州920周年的献礼。定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聘李新为特约研究员，作“苏轼知定州作品笺注”。

苏轼作品的整理研究是苏轼遗址地苏轼研究的基础工程，已取得卓著成果，如凤翔有李文炳辑《苏轼凤翔诗文集》（宝鸡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1990年）和祁念曾著《苏轼凤翔诗赏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海南有范会俊、朱逸辉选注《苏轼海南诗文选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林冠群编注《新编东坡海外集》（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银河出版社2006年版）；黄冈有丁永淮、梅大圣、张社教编注《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和朱靖华、饶学刚、饶晓明、方星移著《苏东坡黄州名篇赏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诸城有李增坡主编《苏轼密州作品赏析》（齐鲁书社1997年版）；徐州有董治祥、刘玉芝著《鹤兮归来——苏东坡在徐州》（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平定山有平顶山市政协主编《苏东坡与平顶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编纂《苏轼知定州诗词赋全注》一书，首先要确定苏轼知定州的六个月期间创作的作品目录；其次要对作品进行编年；最后要对每一首（篇）作品进行校勘、题解、笺注、析义等。这是研究苏轼知定州的基础工作，其成果是定州苏轼研究的基础资料，对于推进定州苏轼文化研究和推进定州地方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是为序。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上接第69页）

东坡的一些经典诗歌“潜伏”在他的游记之中，如《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在《游沙湖》中，《题西林壁》在《记游庐山》中，这种诗文一体、浑然天成的作品非常珍稀，徐康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徐康选《志林》“异事”11篇，突出东坡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而对“异事”的写作也常常别出心裁；选“道释”10篇则呈现东坡与道释的密切关系，不乏幽默智趣。

“修养”主要记述养生内容，不乏趣谈，故徐康选用7篇。

《〈东坡志林〉百篇赏析》的亮点还有三个。

首先，将万历名臣赵用贤小序置于篇首，让人领略东坡“襟期寥廓，风流辉映”的风骨，为赏析定调。

其次，徐康涉猎《志林》版本愈多，妙得亦多，如将“馥甘”坐实为“橄榄”，确定“草露书”为草书的一种，将“骊山之祸”与“咸阳之祸”区别，明确“肉糜”之“糜”非“麋鹿”，以正视听。

再次，附以东坡年谱，又添勘误利器，以严谨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襟期寥廓，风流辉映”力赞明代汤云孙、赵开美编写《东坡先生〈志林〉》普及广化之德；数百年之后，徐康又继踵其后，成此《百篇赏析》，薪火传续，意味深长：

一是从字面意义上看，襟期，指抱负、志向；寥廓，形容高远、宏大、广阔。风流辉映：其风流倜傥的形态，犹如光芒映照。

二是东坡的崇拜者们拾遗校订，代代不绝，可谓隔代知己。

三是东坡之襟期风骨，化育后人，历千年而有回响，风流辉映。

敬佩之余，便借此他山灵石，用做文章的标题。

（张国文，四川辞书出版社编辑）

沉痛哀悼刘乃昌先生

徐玉芹



2015年2月2日21时20分，中国苏轼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85岁的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乃昌因病在医院逝世。

刘乃昌教授，山东省滕州市人。1930年6月24日生于山东省滕县。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后考取浙江师范学院研究生，师从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潜心研治词学与两宋文学。1959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古典文学研究班。1959年到曲阜师范大学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齐鲁学刊》主编、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韵文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山东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等。1989年调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乃昌教授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专于宋代文学。勤于笔耕，发表了一大批富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成为全国宋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先后出版《辛弃疾论丛》《苏轼选集》《苏轼文学论集》《姜夔诗词选注》《宋词三百首新编》《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校注》等专著十余部。并应邀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参与主编《宋代文学史》《宋词广选新注集评》等大型图书多种。筹办并主持多次全国

或国际学术会议，被推举担任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等多种学术职务。所出版著作，两次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以来先后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任多届省政协委员。1984年应邀赴加拿大和美国进行学术交流，1994年再度应邀赴美国讲学。

为人低调，独爱学术研究

刘乃昌教授十分低调。昨天，记者试图在山东大学官网、百度搜索寻找他的信息，但搜到的基本都是老先生的作品，他本人的照片都十分鲜见。山东大学文学院曾与他共事多年的王培元教授说，老先生生前极为低调，所有的心思都在学术研究上，哪怕是后来身患阿兹海默症，惟一的记忆还是他深爱的宋词。

学生：先生治学严谨，有知识分子风骨

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少华是刘乃昌先生在曲阜师范大学时期带过的研究生。得知刘先生去世的消息，王少华十分悲痛。在他的记忆里，刘老师是一位特别有知识分子风骨的先生。“先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身上有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情怀。”

王少华说，刘乃昌先生在宋代文学研究方面造诣很深，治学十分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我们跟他读书的时候，先生要求我们提出任何一个见解

都必须有根据。”王少华说，如果说自己后来在做学问上有点进步的话，也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同事：不讲大道理，用实际行动关心年轻人

刘乃昌先生 1989 年调到山大文学院任教授时，王培元教授是时任教研室主任。后来刘乃昌教授担任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建议王培元教授担任学会秘书长。老先生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为博士生导师，王培元又被老先生指定共同培养研究生，因此与老先生交往密切。

王培元告诉记者，刘乃昌教授平常话不多，不讲大道理，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都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当时我做教研室主任，刘老师来了之后，经常给教研室工作提出很好的建议。”王培元说，先生虽然每次不过是一两句话的点拨，但对他而言受益匪浅。“先生后来建议我做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秘书长，当时我并不是研究这个方向的，有顾虑，先生就跟我说：有事一起做，业务上有些问题随时来问。”

晚年患阿兹海默症，惟一的记忆是宋词

老先生离休后被学院返聘为博士生导师，重招博士生，请年轻教师来帮他，他又找了王培元。王培元回忆说，老先生返聘的时候已经 75 岁了，但他每周坚持亲自给学生上课，每次上课都给学生系统指导，“要求学生看哪些书，去解决哪些问题，指导得非常具体。”王培元说，老先生他还坚持指导学生论文，“学生的论文，我提了建议后，老先生再看，还会很仔细地作出标注。”

王培元说，老先生对学术研究情有独钟。最近四五年时间，老先生患上阿兹海默症，惟一没有忘记的，就是学术研究。“老先生刚患病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但你一跟他提学术问题，比如说到宋词，他立刻就会目光炯炯，跟你聊起来。”王培元说，有一次他去家里看老先生，跟先生聊到宋词，老先生赶紧回自己书房，拿出他出版过的相关书籍，仔细给他解释。“后来师母为了防止先生病情进一步发展，经常请他谈自己过去发表的文章，来调动他的思维活动。”

（徐玉芹，《山东商报》记者，转自 2015 年 2 月 4 日《山东商报》）

乃昌先生千古

张志烈

学仰眉山，松筠茂挺。
传道曲阜，桃李芬芳。

唁 电

刘乃昌先生家属：

惊悉刘乃昌先生与世长辞，我们倍感悲痛。先生是我会前期主要领导之一，历任理事、副会长、名誉会长，先生的《苏轼选集》、《东坡词》、《苏轼散文选集》、《苏轼文学论集》等，在苏轼研究学术领域举足轻重，让后辈学人受益匪浅。一路走好，乃昌先生！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2015 年 2 月 5 日

刘乃昌先生家属：

惊闻噩耗，痛失故友。致书祭奠，涕泗横流。戏笑之言，历历在目。致力学术，累累硕果。驾鹤而去，归安故土。

四川大学张志烈、曾枣庄、邱俊鹏

2015 年 2 月 5 日

韩国苏轼研究述略（一）

洪瑀钦

第九章 “拟把汉江当赤壁”

1999年春天，中国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曾枣庄教授寄给我一封信，说他已经决定撰写《苏轼研究史》，托我写“韩国历代文坛对苏轼的研究”部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简单，可是，我已经搜集有关于苏轼对韩国文学影响的一些资料，故才答应下来。

韩国文学史从古朝鲜到现在的悠久历史期间，有古朝鲜（檀君朝鲜、卫满朝鲜、汉四郡）、三国（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并立期）、统一新罗（669～935）、高丽（918～1392）、近世朝鲜（1392～1910）、现代（1910～现在）共六个时代。韩、中两国，因其国境邻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维持很密切的交流关系。尤其在文学方面，韩民族本来有他们固有的语言，有其独特的精神文化，而发明文字之历史比中国较晚，所以公元1443年近世朝鲜第四代世宗大王发明训民正音（韩文），以前的历代韩国文坛，一面借用中国汉字的“音”、“义”来做所谓的“吏读文字”，以表记一般文件和新罗时代的“乡歌”、高丽时代的“景几体歌”等他们自己固有形式的歌谣；一面接受汉文学的形式、文艺思潮和某种风格等来创作他们自己的汉文艺作品。

汉四郡时代接受汉武帝时流行的乐府形式^[1]；三国时代接受儒佛道三家思想和五言古诗形式^[2]；统一新罗时代接受五七言近体诗和四六骈俪文形式^[3]；高丽前期继承统一新罗时代传入的骈文风潮而极度崇尚以形式为主的文艺思潮（以声律形式为主的科文是其代表）；从高丽中期到近世朝鲜末期接受古文形式而遗留了无数的古文作品^[4]等史实都告知我们韩、中文学交流的紧密性。

在韩、中比较文学史上，韩国文坛开始接受苏轼的声华和文学作品之时期，大概是高丽前期文宗

三十四年（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45岁）左右。从这时起，苏轼文学对韩国文坛之影响好像东山之月，开始明照于韩国文人的脑里。从高丽前期，经过高丽中、后期和近世朝鲜前、中期到公元二十世纪近世朝鲜末期的900多年之间，韩国文人都称苏轼为“苏仙”，羡慕他的生涯和文学之境界。有人憧憬他青少年期鼓动天下的文名，以“轼”名自己儿子；有人学习他豪放旷达之风格，来创作文艺作品；有人模仿他赤壁之游的风流，泛舟漫游，享受浪漫之快乐；有人搜集有关他的资料，写成《东坡源流》。所以，苏轼在韩、中比较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比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文人，更深刻而广大。

下面我们就来考察韩国历代文坛接受苏轼影响的概况。

第一节 高丽前期文坛接受苏轼的声华和文风

高丽，那就是太祖王建继承新罗而建国（935）之后到第三十七代恭让王三年（1392）为止，持续475年的韩国古代王朝。按历史情况，高丽文学史，可以区分前期（太祖元年——第17代仁宗：文臣执政时代）、中期（第18代毅宗——24代元宗：武臣执政时代）和后期（25代忠烈王——34代恭让王：对元从属时代）凡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当中，前期文坛接受苏轼影响的现象，大概如下：

一 高丽文人羡慕弱冠苏轼名动天下

古人说：“有麝自然香。”苏轼对周边国家文坛之影响也跟这个道理一样，他振动天下的声华，比他文学作品的实体，更先广播于边方，使人羡慕无己。

据《苏轼年谱》，苏轼20岁与弟辙侍老苏游成都，谒张安道，安道一见以国士待之。22岁赴礼部试，欧阳修见苏轼试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异人，欲冠多士，及殿试章衡榜中进士乙科，始见

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人，皆以国士待之，欧阳修见苏轼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

“吾当避之”，这真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的美谈。很多朝廷的名人贤士，都对这位从四川峨眉山下那么偏僻的眉山县纱縠行来的弱冠文人，以国士待之的消息，像离弦的弓箭和飞走的驿马一般，不管水陆之险易和国境之彼我，迅速传播于契丹、高丽、日本等邻国文坛，不但鼓动有气概青云的青少年的心胸，而且使天下的父母都希望有这样俊秀的麒麟儿。

高丽人最崇拜苏轼，出身高丽名门望族的金覲，以金富弼、金富辙为其儿子取名，可见他对苏轼兄弟的崇拜。《游宦纪闻》卷六载，宋朝使者徐兢曾在高丽“密访其兄弟取名之意，盖有所慕”。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库全书本）卷八《人物》金富弼条载：“金氏世为高丽大族，自前史已载。其与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孙多以文学进。富弼体貌丰硕，面黑目露，然博学强识，善属文，知古今，其为学士所信服，无能出其右者。其弟富辙亦有时誉。尝密访其兄弟命名之意，盖有所慕云。”

我们看徐兢记下来的“有所慕”这一句象征性的逸话，则可以想想高丽文人金覲，因羡慕苏轼和苏辙兄弟的文名，而将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富弼”、“富辙”。金富弼官至门下侍中，总揽朝政，又是著名的史学家，著有《三国史记》，为文坛巨臂。金富辙官尚书礼部侍郎，宣和时出使来华，能写漂亮的四六文。这篇逸话虽然过于简单，而使我们后人能窥测十一世纪中期，苏轼文学的声华波及于高丽文坛的情况，是如何深刻而且强烈。

按苏轼的年谱算起来，金覲去北宋首都汴京为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苏轼年龄为45岁。据《苏轼年谱》，苏轼44岁至45岁的重要经历为：44岁在徐州，四月自徐州知湖州，是岁言事者，以湖州到任谢表为谤，七月二十八日被逮赴狱，亲戚故人皆惊散。八月十八日，赴台狱中。十二月二十日，闻太皇太后升遐，然吏以罪人不许成服，欲哭则不可，预泣则不敢，作挽诗二首。已而狱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由这一段史事，我们可以推测金覲不可能见苏轼的面。以子名富弼、富辙，只因仰慕其声华而已。

二 朴寅亮、金覲《小华集》与苏轼的《论高丽奉进状》

我们回顾十一世纪东亚细亚的历史状况，以北

宋、契丹（辽）、高丽成为三角关系的国际情势，实为复杂微妙。从高丽的立场来看，为了本国的文化发展，经常希望跟北宋交往而输入宋朝的先进文物。可是，占据韩半岛北方辽东一带的军事强大的契丹国（辽），一面向高丽要求朝贡和割让国土，一面遮断丽、宋交往之陆路而妨害丽、宋两国的善邻关系。

郑麟趾《高丽史·列传·朴寅亮传》条载：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或云平州人，文宗朝登第，多所扬历，辽尝欲过鸭绿江，为界设船桥，越东岸，置保州城，显宗以来屡请罢不听。二十九年遣使请之，寅亮修陈情表曰：“普天地下，其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余，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归汶阳之旧田，抚绥弊邑；回长沙之拙袖，抃舞昌辰。”辽主览之，寝其事。累迁右副承宣，转礼部侍郎。三十四年与户部尚书柳洪奉使如宋，至浙江，遇飓风，几覆舟，至宋计所贡方物失亡殆半。帝勅王忽问，王乃释洪等。有金覲者，亦在是行，宋人见寅亮及覲所著尺牋表状题咏，称叹不置，至刊二人诗文，号《小华集》。

这篇《高丽史·朴寅亮传》，给我们很清楚地启示，十一世纪高丽、北宋、辽三国的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情况。高丽因陆路为辽阻止，有时不得已走海路，派遣使臣出使宋廷，赠送金塔等宝贵的本国特产，同时宋廷送给高丽朝廷的不少回谢品。除回谢品以外，还由正式贸易的方法，购买书籍、绫罗、笔墨、药品、瓷器等贵重物品回到高丽，卖给富裕的高级的人士。

高丽人所作的诗文，表明他们的汉文化水平相当高。《澠水燕谈录》卷九载：“高丽，海外诸夷中最好儒学，祖宗以来，数有宾客贡士登第者。自天圣后，数十年不通中国。熙宁四年始复遣使修贡，因泉州黄慎者为向导，将由四明登岸。比至，为海风飘到通州海门县新港。先以状致通州谢太守云：‘望斗极以乘槎，初离下国；指桃源而迷路，误到仙乡。’词甚切当。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与同行朴寅亮诗尤精，如《泗州龟山寺诗》云‘门前客棹洪涛急，竹下僧棋白日闲’等句，中土士人亦称之。”朴寅亮不仅诗好，而且很有学问。同卷又云：“元丰中，高丽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张中以诗送之，寅亮答诗，序有‘花面吹艳，愧邻妇青唇之敛；桑中陋曲，续郢中白雪之音’之语。有司劾中（国）小官不当外交夷使。（下转第77页）

胡先酉的三苏情缘

孙开中

胡先酉生在眉山、长在眉山，几十年生活在眉山、工作在眉山，作为土生土长的眉山人，从儿时起，就与三苏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的他不了解三苏，也读不懂三苏，但地处眉山城西南隅的三苏公园却是他经常光顾的乐园。那时的三苏公园，不收门票，也没有几个人管理，却竹树成荫，曲径通幽，鸟语花香，亭榭楼殿，依山傍水，星罗棋布。那时的他，置身其间，虽说不出心旷神怡之类的话语，但总觉得里面好看好耍好玩，三苏公园自然成了他小时候常去玩耍的地方。走进公园的大门，那时的胡先酉，对公园里的楹联碑刻不屑一顾（本来就认不到懂不得），总喜欢顺着右边那株大黄葛树身上粗壮的虬根攀爬到那刚刚高过围墙的丫杈上，俯看墙内外的风景；翻过齐腰高的飨殿的门槛，带着好奇的心，仰视高坐在玻璃龛台上三苏父子那庄严肃穆的塑像。他拾过银杏树下的白果，摘过荔枝树上的丹荔；走在柚子林边，那挂在枝头的一个个大柚子让他垂涎欲滴；靠在百坡亭的曲栏上，满池的碧荷与水中的鱼儿令他心驰神往。玩够了跑累了口渴了，用那总是靠在苏宅老井旁那根裂了缝的竹竿从井中汲起清凉井水来喝几口，然后又欢笑着在园子里奔跑。三苏公园的天空，不知回荡着他儿时多少朗朗的笑语，三苏公园的地面，不知留下了他多少小小的脚印。

慢慢地，胡先酉长大了，上学读书，识文断字了。随着一篇篇地阅读三苏父子的诗词文赋，一天天地走进三苏父子的精神世界，他对三苏公园的情感与趣味也起了变化。三苏公园文革后更名为三苏祠，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苏祠在依旧保持着原有典雅幽静风致的同时，更增添了几分三苏文化书卷气息。长大的他，虽然因工作生活不能像儿时那样成为那里的常客，但时不时也要去那里逛逛。漫步在三苏祠幽雅的园林中，除了一边沉浸于过去美好的回忆一边欣赏眼前赏心悦目的美景外，更多的时候是驻足在楹联碑刻文献古籍前阅读理解追思凭吊。伴着他对三苏父子与日俱增的

了解欲，其追思凭吊的脚步也迈出了三苏祠，城西七八十里的三苏乡，去追寻三苏父子在乡下生活的遗踪；广济乡的连鳌山上，去观赏苏轼年轻时书写的每字一丈见方的“连鳌山”三个大字；城东三十多里土地乡的苏坟山前，去凭吊三苏父子及程夫人、王弗的千古墓冢。

随着胡先酉对三苏阅读理解的日渐积累，他的所思所感也日渐增多，一种想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欲望也就油然而生。而他写对三苏的所思所感，从一开始就着眼于三苏在其作品里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对三苏作品的写作风格与技巧基本不涉及。这并非是他不欣赏三苏父子诗词文赋的写作技艺，恰恰相反，他很喜欢三苏作品的古朴文风、优美语言、巧妙构思，尤其是苏轼的诗词文赋，不少作品用“美文”来评价，一点也不过分，读起来是脍炙人口，读了后其语言词句在脑中形成的绝妙意境萦绕终日，甚至令他有一种远超脍炙人口的情感愉悦精神享受。尽管如此，他还是更钟情于三苏作品的精神世界，他第一篇写三苏的文章《雷霆凜霜我不迁》就是谈自己对苏轼“节概”的感受。“雷霆凜霜我不迁”是苏轼《咏怪石》中的一句诗，该诗通过叙写在梦里与家中的一块怪异石头的对话，借称颂其外表看似无用而内在实则“雷霆凜霜我不迁”的坚韧意志，来表达诗人不为外物所左右坚如磐石的“节概”。他之所以写《雷霆凜霜我不迁》这篇文章，其实同他的经历与心情大有关联。他这样年过花甲的人，与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青少年时有理想、有抱负，对国家、对生活、对未来满怀热情，可是，正在十来岁长身体时遇上“粮食关”，每天食不果腹没有饿死已算万幸，又在十七八岁求知欲旺盛时遇上“十年动乱”，书读不成不说，却上山下乡当了知青，二十大几了只觉得前途茫茫。坎坷的经历加上压抑的心情，把青少年时的理想抱负热情几乎消磨殆尽，可偶尔间读到《咏怪石》，诗中“雷霆凜霜我不迁”“子盍节概如我坚”的诗句让他精神为之一振，道路尽管曲折，但意志不可消沉，他之所以在乡

下当知青、当代课教师的八年中，不管有多么艰难，始终没有放弃读书，以至能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考进大学，苏轼诗中的精神思想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1987年，胡先酉把自己的感受写成《震霆凛霜我不迁》一文，在眉山举办的苏东坡诞辰九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并收入由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合编的《苏轼思想探讨》一书中。此后不久，带着对三苏父子的崇敬之情，他参与了由眉山本土苏学专家张忠全先生主编的《三苏咏故乡》这本小书的编注工作，该书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出版。他在书中承担对苏辙歌吟故乡诗文的编注，通过这一工作，他深切地感受到三苏父子对故乡眉山的无限深情，也对苏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为以后他专研苏辙作品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从1988年至2005年十几年的时间，胡先酉没有写过一篇关于三苏的文章，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繁重的教学工作所致，而更主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想多读些三苏的作品，尽可能地对三苏有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后才发表看法。这一期间，除了零零散散地读些三苏（主要是苏轼）的作品外，还读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曾枣庄先生的《苏轼评传》《苏洵评传》等关于三苏生平、作品、成就的书籍，后来购得曾枣庄、舒大刚二位先生主编的《三苏全书》，读三苏作品的原著后，对三苏的了解比较多了，比较完整了，心中的感受便多了起来。

2006年，胡先酉从教学一线退下来，在学院担任督导工作，工作的繁重程度有所减轻，提笔写关于三苏感受的时间也就多了起来。这一年，胡先酉一方面有感于苏轼的民本思想和他几十年朝野为官一心为民的辉煌政绩，一方面目睹当今社会中一些官员对人民群众的利益不管不顾以权谋私的劣迹，他写了《苏轼的民本思想及其体现》一文，梳理了苏轼民本思想的渊源与主张，叙述了苏轼朝野为官实施其民本思想所做出的惠民利民的成就。该文长达一万五六千字，先在2006年的《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分上、下部分刊载，其后又在《苏轼研究》2006年第4期与2007年第1期上分上、下两部分刊载。2007年11月，“苏东坡的民本思想”学术研讨会在眉山召开，胡先酉以《苏轼的民本思想及其体现》一文在会上作了书面交流。其后不久，他应原市政协主席苏灿先生、原市政协副主席张忠全先生相邀，加入了“苏轼为官之道”课题组，承担了“第一章民本理念”“第四章教育理念”“第五章军事理念”的撰写任务。《苏轼为官之道》一书2009年9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出版

发行座谈会上，作为作者中唯一不是官员的胡先酉，以普通民众的身份表达了自己对苏轼为官一心为民的敬佩之情。

2008年，带着对三苏父子的崇敬之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胡先酉把探究的目光投向三苏父子的成才之路上，写了《良好的家教成就了三苏父子》一文，对苏序对苏洵的因材施教、苏洵夫妇对苏轼苏辙兄弟的精心培育作了论述，该文刊载于2008《苏轼研究》第4期上。

2009年，有感于有人认为三苏父子在成名之前，苏洵在蜀中多次拜谒达官贵人并求其写推荐信，因而有失文士品格这点，胡先酉在仔细认真研读了苏洵写给张方平、吴照邻、欧阳修等官员的求见书信后，并结合其他一些资料，写了《辨苏洵求见官员》一文，表明苏洵的求见之举，根本不是钻营走后门，而是磊落光明地为国家社会推荐人才，是“毛遂自荐”、“内举不避亲”的美行。苏洵一生节操自守，绝无阿谀逢迎的奴颜媚骨，“庄栗刻削，凛乎不可犯”的气节令胡先酉肃然起敬。该文在这年4月眉山举行的“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并收入纪念苏洵诞辰1000年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洵研究》一书中。

2010年8月，在参加纪念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周年的活动中，出于对苏轼一生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敬佩，胡先酉提交了《谈谈苏轼的“疑”》一文，该文从谈苏轼《石钟山记》中对酆道元等的“疑”开始，然后历数了苏轼《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东坡手泽》中多篇对传统文献、权威著作质疑的文章，指出苏轼无论是对权威先贤，还是经典著作，能够在认真研读后对其有问题之处提出怀疑，疑得有据，疑得有理，并或通过引经据典，或亲自调查实践来解决疑问，这种敢疑、会疑、解疑体现出了严谨治学的态度，他在文中还对支撑苏轼在这种态度的独立思考是怎样形成的作了探究。该文收入纪念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周年《“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汇编》中，并刊载于2010《苏轼研究》第3期上。

2011年，有感于在参与撰写《苏轼为官之道》一书涉及到众多的官职名称这点，胡先酉写了《三苏为官的职能及相关情况》一文，对三苏父子的官职职能及其相关情况作了粗浅的介绍，该文刊载于2011《苏轼研究》第1期。

2012年，胡先酉开始把注意力较多地转向苏辙。作为苏轼的弟弟，人们大都从苏洵的《名二子说》开始，一直以来，认为苏辙是个循规蹈矩跟在哥哥后面人。其实不然，在苏辙冲淡谦和的表象下面，潜藏的是敢说敢为、刚直不阿的性格，这从他年轻时嘉祐五年（1060）应

制举写的尖锐批评仁宗皇帝的《御试制策》中可以看出。而苏辙在多年的艰苦贬谪流放生涯中淡然处之、豁达乐观并潜心于著述的生活态度犹让胡先西感慨不已。这一年，胡先西反复阅读了苏辙花了近二十年写作最后在谪居地龙川定稿的《春秋集解》，深为苏辙严谨治学、直书己见的精神所感，写了《〈春秋集解〉初探》一文，探究了苏辙撰写《春秋集解》的缘由，对他在书中对《春秋》这本儒家经典的所作的不同于诸如著名的“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的解说作了分析阐述。该文在2012年10月眉山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上交流，收入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的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轼研究》一书中。

2013年，胡先西又写了《〈春秋集解〉对“春秋笔法”的认识与揭示》一文，结合《春秋集解》的具体内容，对该书表达的对“春秋笔法”的认识与揭示作了梳理和分析。该文刊载于2013《苏轼研究》第2期上。之后，他又对年老体衰、老眼昏花、手不能执笔的苏辙在龙川以口述而由幼子苏逊记录的方式撰写的《龙川略志》一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本书带有明显的回忆特征，苏辙在讲述自己所见所闻的逸闻趣事和间接追论朝政之中，或委婉含蓄，或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政见看法。身处逆境、暮年体衰的苏辙其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与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让他震撼，遂产生了完整介绍这本书的冲动，他准备以对全书作译评的形式来写。这一年，他完成了《龙川略志引》与《龙川略志第一》的译评，该文刊载于2014《苏轼研究》第1期上。

近七八年来，胡先西被三苏文化研究院聘为特约研究员，加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为学会理事，因而除了自己读三苏写三苏外，宣传三苏也成了责无旁贷的任务。2012年，他与眉山苏学专家孙开中、赖正和、刘清泉一道，参与了由三苏文化研究院与眉山市人口计生委联合编撰的《苏东坡与人口文化》，他承担了“苏东坡与人口素质文化”中的“教育文化”的撰写工作，为宣传三苏的人口文化尽了一点绵薄之力。今年胡先西又同孙、赖、刘三位先生一起，参加了眉山市方志办的“眉山两宋进士群体研究”课题组，他在承担的“眉山教育、科举”部分中，宣传了苏轼兄弟在眉山良好的家庭教育与发达的学校教育培养下同科及第的事迹。前不久，在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的道德大讲堂上，他以“苏轼的清廉及其启示”为题，向学院的数百师生宣讲了苏轼清廉的思想与事

迹。

如今，胡先西已年过花甲，他这样总结自己的三苏情缘：“看来这辈子从幼年开始与三苏结下的情缘将伴我终身，我也愿意在自己晚年的日子里，与三苏不离不弃，从先贤的身上读取人生修养的精华，以怡然于我的夕阳岁月。”

（孙开中，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上接第74页）奏上，神宗顾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对，乃以问赵元老，元老奏：‘不经之语，不敢以闻。’神宗再论之，元老诵《太平广记》云：有睹邻夫见其妇吹火，赠诗云：‘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其妇告其夫曰：‘君岂不能学也？’夫曰：‘汝当吹火，吾亦效之。’夫乃为诗云：‘吹火青唇动，添薪黑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鸪盘茶。’元老之强记如此，虽怪癖小说，无不该览。”但令人佩服的是还是朴寅亮，一个外国人不仅对中国的“怪癖小说”很熟悉，而且以之入骈句，十分贴切。

注释

[1] 晋代崔豹著《古今注》所载白首狂夫妻丽玉作《箜篌引》是其代表的作品：“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

[2] 高句丽将军乙支文德写给隋将于仲文的五言古诗《与隋将于仲文》是其代表的作品：“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

[3] 朴仁范、崔致远等所作的近体诗和四六骈俪文是其代表的作品。

[4] 高丽前期接受文以贯道的词章为主的古文，从高丽末期到近世朝鲜一代接受文以载道的道学为主的古文而发展。

（未完待续）

（洪瑀钦，韩国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我与苏东坡的“第二次握手”（四）

——河南卫视《成语英雄》拍摄记

李 新

我在河南卫视《成语英雄》第二季复赛第一场（12强之战）夺冠，取得“成语樽”之后，同时获得了复赛第二场（11强之战）免试的权利，直接入围第三场Pk（10强之战）。抽签开始，李绅选定熊汝疆，雷丰图调中赵雪雅，我第三轮抽中了幸运签，记得第一场pk赛是王铁军老师挑选的我，这一次我便“投我以李，报之以桃”，选了他……上场访谈时，王老师不无幽默地说：“李新老师是居家过日子的好男人，这个年头好柿子不多了，软柿子是最环保的。”言外之意，以“软柿子”自承，其实是故意示弱，麻痹对手，窦文涛老师也说：“也许，咱这软柿子就能克制苏东坡，请上成语桥。”

大屏幕开题了，第一道“水火不容”，我和他双方都猜对了，再写“以卵击石”、“鱼目混珠”、“钻木求火”，双方都猜对了，窦老师说：“看来，这俩人是咬上了。”第五题，画面上有一人倚树而卧，梦中南面而坐，画面有四字“大槐安国”，哦，这是典故题，是“南柯一梦”！而王老师写的“想入非非”，明显错误，我顺利拿下一分，“李新，请横行！”成语桥向中央移动，我便左手一弯，右手向后一伸，左腿弓，右腿绷，摆了个“向前进”的造型，窦老师接着说：“李新哪会儿都是海军陆战队的架势……”接下来，“栴风沐雨”、“树倒猢猻散”、“危如累卵”，又都全对，但我有意识地加快书写速度，每一题都抢先写，第九题又是典故题，画面是“溜须拍马”，我刚好看过《宋史》中寇准传记里这个出典，便立时写下，而王老师直到读秒才写了“国士无双”，答案揭晓，我又得

一分，窦老师让我解释了一下典故本事：北宋参知政事丁渭在宴席上为宰相寇准斟酒，不小心在其胡须上沾上一点，便小心翼翼地为之擦拭……继续前进！下一题“白山黑水”，我提笔就写，王蒙老师赞许地说：“画面还没出完，人家早就写出来了。”下面“旗鼓相当”，我始终书写在先，窦文涛老师也说：“这是一场慢热型选手和快热型选手的对决。”第十二题，画面一人蜷缩在富家门外，屋内人杯酒言欢，屋外的篱笆用红色标出，哦，“寄人篱下”！而王老师交了白卷，成语先生们宣布，我3：0获胜！成功进军九强！

之后的成语pk比赛，改变了赛制，不再使用“看图猜成语”形式了，因此，可以说，在《成语英雄》“看图猜成语”环节的全部赛程中，我是全胜的，非常欣慰！赛程还要继续，成语pk的形式无论怎样改变，“腹有诗书气自华”，“胸有成语神自若”，来吧！

（李新，保定学院副教授、河北大学文学博士、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会长办公扩大会在眉山召开

本刊讯（一流）2015年2月11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办公扩大会在眉山召开。与会者张志烈、曾枣庄、邱俊鹏、苏灿、宋明刚、方永江、刘清泉、张忠全、孙开中、胡先酉等。会议内容：一、尊重王希龙同志辞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职务的决定；二、同意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今年10月承办“全国第十九届苏轼研究学术会议”的申请；三、发展会员王琴、徐立昕、王斌等。与缺席会议的周裕锴、杨胜宽、涂普生副会长进行了电话沟通。

“眉山西湖”课题开题论证会近日举行

本刊讯（熊莉）1月26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与乐山师范院校地合作重点社科研究课题“眉山西湖人文建设研究”开题论证会在“眉山西湖”规划所在地东坡区白马镇举行。

眉山市委经济工作会明确提出“文化立市”攻坚战，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立足自身实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结合“千湖之城”、生活品质

之城建设，早谋划早介入，组织专家、学者调研、座谈，从而初步确立了该课题。开题会充分论证了眉山西湖的人文定位、课题性质和集中体现东坡文化在眉山唯一性、独特性的展示主题，按计划该课题今年底结题。它将为眉山西湖人文建设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转自2015年1月29日《眉山日报》）

“东坡文化进校园公益课程”启动

本刊讯（王家隆）12月27日上午，儋州市300多位班主任和教育系统相关人员在儋州市一中参加了“东坡文化进校园系列公益课程——心理培训课程及督导活动”启动仪式。

出席本次启动仪式领导有儋州市教育局局长周春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常务副会长韩国强，华夏苏东坡文化传播中心理事长尧军，儋州市一中校长丁勇。

周春声局长在启动仪式上指出，晚年的苏轼在儋州生活三年，这是儋州人的精神财富，是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东坡文化进校园系列公益课程是我市大力宣传和推广东坡文化一项活动，是文化强

市，发展城市内涵的一项举措，作为教育工作者要肩负起弘扬东坡文化的重任，扎扎实实为推广东坡文化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此次，东坡文化进校园系列公益课程——心理培训课程及督导活动，对心理教师和班主任进行心理辅导，有助于他们对教育规律的理解和把握，全面了解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促进德育教育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

启动仪式上，韩国强副会长、尧军理事长分别做了发言。启动仪式结束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郑雪和王玲作了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讲座。

第十九届苏轼研究学术会议 征文启事

经 2015 年 2 月 11 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办公扩大会议研究决定：

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和西华大学主办，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西华大学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蜀学研究中心和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全国第十九届苏轼研究学术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6～18 日在四川成都举行（具体地点以正式邀请函为准），热忱欢迎您届时携大作光临。

为此面向国内外学者征集论文。

一、征文范围

国内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文博单位、新闻出版部门、苏轼遗址地从事苏轼文化研究的学者、爱好者，以及国外从事苏轼文化研究的学者、爱好者。

二、征文内容

会议主题：

苏轼与地域文化

参考题目：

1. 苏轼与巴蜀文化
2. 苏轼与中原文化
3. 苏轼与三秦文化
4. 苏轼与吴越文化
5. 苏轼与齐鲁文化
6. 苏轼与荆楚文化
7. 苏轼与江淮文化
8. 苏轼与燕赵文化
9. 苏轼与岭南文化
10. 苏轼对地域文化的传承
11. 苏轼对地域文化的发展
12. 苏轼对地域文化的影响
13. 苏轼文化遗迹考察
14. 遗址地苏轼文化的概况

15. 遗址地苏轼文化的特色

16. 遗址地苏轼文化的传承

17. 其他有关苏轼研究

三、征文时间

征文时间从征文启事刊出之日起到 2015 年 9 月 20 日止。稿件请发送到：西华大学联系人王燕飞电子邮箱：wangyanfei1020@163.com，或者《苏轼研究》编辑部电子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四、征文说明

论文要求：内容提要 50～100 字，关键词 3～5 个，注释采用尾注；页面设置：A4 纸，题目 2 号黑体，正文 5 号宋体。在稿件左上角注明“应征稿件”字样，在稿件末尾注明真实姓名、单位名称、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或者 QQ，以便联系。主办者将在征文截止前一个月根据论文质量和作者情况，发正式邀请函。参会论文将推荐至《地方文化研究辑刊》、《蜀学》集刊、《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苏轼研究》等刊物发表。

五、会务联系

西华大学：王燕飞电话 18208117021 喻芳电话 13684063965 办公室电话 028-87723062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处办公电话：028-3829 9092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周路 999 号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邮政编码：610039。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2015 年 3 月